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前言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中共党史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正是以纪实笔法反映中共早期领导层的重要情况，主要是写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中共几代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间在工作上的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同时，也写到他们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是如何为救国救民，寻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号，以及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以大量史实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怎样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怎样独创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为核心制定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又怎样从实际出发分别抵制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在局部地区把“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是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军事上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几次大“围剿”的辉煌胜利。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一开始就推行错误路线，而且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根本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一大批干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个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断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惨败之后，亲身经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广大指战员已经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排斥毛泽东军事领导的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以挽救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毛泽东顺应广大指战员的殷切期望，逐步地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并且团结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得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对中共早期的几代领袖也作过客观的结论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瞿秋白也有功劳。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对于王明，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说过：“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

助犯错误的同志改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显然，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一生，都是一分为二的。但长期以来，很多同志一提起这几位中共早期领袖，总是立即想到他们的路线错误，往往忽视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确的一面。这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力求写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们成为领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写出他们犯错误的一面。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革命家，既总结了他们的正面经验，又总结了他们的反面经验。毛泽东正是在正确总结他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端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胜利。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史实，记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较强的可读性。如“匏瓜与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不怕艰苦、开小花而结硕果与王明怕艰苦、需要园丁培植、只开大花而不结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总之，这本书以翔实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

编者 1996年11月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第一部分：唐宝林

第二部分：沈学明

第三部分：陈铭康

第四部分与前言：黄允升

全书由黄允升负责统稿并定稿，由吴正裕审阅。

##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 毛泽东与陈独秀

毛泽东与陈独秀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并且连任五届，是中共历史上连任届数最多的总书记。从建党开始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其失败，毛泽东一直在陈独秀领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成绩卓著，却是一种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在大革命后期，诚然毛泽东有很多正确的重要意见，然而因处于被领导地位，对革命全局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陈独秀是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既有长时间成功的经验，也有大革命后期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和后来开辟中国革命道路、领导革命取得伟大成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都与陈独秀的启迪培养和经验教训密不可分。这部分就是探讨这个主题的。

## 耐人寻味的青少年时代

### 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陈独秀生于 1879 年，二人相差 14 岁，但他们形成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都处在中国被西方殖民者疯狂侵略、晚清和北洋军阀腐败统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苦难急剧加深的时代。尤其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毛泽东与陈独秀生长在这个时代，都较早地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崇高志向。

陈独秀在 1904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于是，早在 1897 年 19 岁时，受了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御外侮。书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同时，陈独秀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在他 6 岁时，老家淶水乡农村发大水，族长到城里来借钱，陈独秀母亲因对族长的为人有看法，没有借钱给他去救济灾民。陈独秀表示不满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

1902 年，在得到两位信仰维新主张的战友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作诗哀悼时即明志曰：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第二年，陈独秀终于抛弃“勤王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投入到推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而不计成败与生死。他在 1903 年写的一首侍中表示：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平。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毛泽东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毛泽东的母亲在韶山一带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而著称。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

---

《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实庵自传》。

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为人处事受母亲很大的影响。

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下来后在场地上晾晒，忽然下起雨来，毛泽东不收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父亲生气地责怪他。他回答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又有一年旧历年底，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收到的钱统统散给了他们。相反，他的父亲却是个十分吝啬的人，有一年，韶山地区因严重粮荒而发生穷人“吃大户”的事情，他父亲是个米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为此，毛泽东对父亲十分不满。

毛泽东从17岁进入省立师范读书开始，就关心政治。他从表兄文运昌处看到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等书后，就激发起强烈的富国强兵爱国主义思想。后来，他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受到很大的刺激。其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终身不忘。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而树立起“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并在平时与朋友谈话、通信和自己的日记与读书笔记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1915年5月也借追悼一位亲密朋友的去世，写了一首五言古体诗，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抱负：“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东边隔海相望的是日本鬼子，北边山水相连的是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怪？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国救民的重任。）特别在1917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他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学会宗旨，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人生和国家大事。当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因此，朋友们都尊敬而打趣地形容他：“身无半分，心忧天下。”如当时他与同学常去玩的岳麓山云麓宫内一付对联所云：“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1925年，他在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家乡养病时，写了一首《沁园春》的词，更充分表达了他在青少年时期这种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时与陈独秀、毛泽东处于同一时代的青少年，虽然也感受到了民族危亡和人民的苦难，但很多人却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或“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不问政治；有的伤感时事者，也只会消极、悲观与绝望中消磨时光。因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革命的领袖，不是偶然的。

### 农村与城市的不同成长环境

毛泽东与陈独秀虽然较早就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共同的志向与抱负，但由于两人从小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和影响所奠定的知识结构与养成的性格作风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两人不同的思想发展轨迹与政治归宿。

陈独秀出生在当时长江中游繁华的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与怀宁县治的大城市安庆，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后来也一直生活在东京、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所以，他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更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斗争，自然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使他在革命中处理农民问题时，难免发生错误。191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义和团运动时，还夸大并着重批判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和排外的一面，称义和团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说这“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的国耻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毛泽东则不然，他出生在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而且他从6岁开始就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了解农民的艰辛。他还不仅以此为满足，一有机会就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期，他与萧子升曾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调查。第二年春天，他又与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月，了解社会情况，毛泽东称这为“游学”，读“无字书”。这年5月，他送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到北京去欧洲勤工俭学，行至河南鄆城时，正遇沙河涨水，冲断铁轨，火车无法通行，大家一时没有主意。毛泽东建议把行李集中起来，派人看管，利用等车的时间，大家轮流去看看北方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重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作风，在后来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中，一直保持着。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经历了多次农民斗争事件。

1910年4月，湖南发生粮荒时，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糶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来，饥民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不久以后，韶山又发生哥老会起义，反抗地主和政府。义军曾撤到浏山山里，建立了一个山寨。最后，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领袖彭铁匠等被杀。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毛泽东所在的乡里发生粮荒，又掀起“吃大户”运动，并冲击到他家：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父亲准备运到城里去的粮食。

---

《克林德碑》。

《西行漫记》第110—111页。

毛泽东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对于中国农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斗争“造反”精神，毛泽东还从中国旧小说中受到特别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他从小爱看《水浒》、《精忠传》、《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小说（他读这些小说极其用心，也像“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当时私塾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所以他和同学们只能偷着看。对于这些农民造反的故事，他们还热烈讨论了许多次，“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谈到这些旧小说对他人生观的影响时，他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由于以上种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了解他们的愿望、要求。特别从反映农民起义的旧小说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具有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和革命积极性，了解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解他们的阶级局限：另外也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剧。后来他以这种认识正确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陈独秀是无可相比的。而后来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奋斗道路与成败结局。

### 知识结构 with 思想历程的区别

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两人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两人不同的思想历程。

陈独秀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在他3岁时去世，因此从6岁开始，他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虽然他不喜欢这些经书，爱读《昭明文选》，自称“选学妖孽”。但经书在当时是通向科举的唯一途径，再加上祖父极其严厉的管教与母亲用眼泪的劝说下，他对旧学还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8岁时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竟得了第一名，成为秀才。然后，由于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校的出现，他受到一段新式教育，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等，一度信仰改良主义；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乡里督儒辩论，为受到攻击的“康先生辩护”，自称“康梁派”。接着，由于受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于是，从1901年开始，他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大量阅读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报，特别研究使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成为他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

1902年春陈独秀即回国，在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不久因被政府通缉，再次赴日，并联络张继等人成立“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陈独秀从此转变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这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经成立，黄兴等人的华兴会与蔡元培等人的光复会正在酝酿，同盟会还未组成。陈独秀在建立起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后，参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1903年，发起并领导了安徽的“拒俄运动”；1905年，参与策划了吴抛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光复浙江、安徽的斗争；1913年，又参加反袁斗争等等。同时，除了“青年会”外，他又参加了暗杀团（光复会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等的编辑工作。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了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报刊，和“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反帝反清团体。他任会长的岳王会，以芜湖为总会，在安庆，南京设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历时数年，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受教育的情况、知识结构与思想轨迹，与陈独秀不一样。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比较长比较深。虽然他与陈独秀一样，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从9岁进私塾开始很系统很用心地熟读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旧学经书。青年时期又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可贵的是，他读这些旧书时，能够做到口诵心解，深刻领悟；既不囫圇吞枣，不求甚解，也不崇信受害。在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后，他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使新旧结合，中西合璧。

已如上述，在学习这些“旧学”的同时，毛泽东还认真读了《水浒》等许多旧小说，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7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著）、《新民丛报》以及宣扬“大同”思想（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康有为、谭嗣同和明末清初湖南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著作。深受影响，在接触陈独秀之前，他把康梁当作自己人生的“楷模”。同时又崇拜非暴力主义的“大哲学革命家”托尔斯泰和谭嗣同。

1912年19岁那年，毛泽东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于是，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两年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开始接受一批具有西方进步思想的教员的教育，特别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学方面，政治上依然信仰康梁，也分不清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区别。有一次，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上刊登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和同盟会纲领，非常感动，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主张从日本召回孙中山来作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作内阁总

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接着，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立即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于是毛泽东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开始突出出来。两颗巨星的思想与运行轨迹开始接近。

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新青年》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突出地表现在1917年写的读《伦理学原理》的长篇批注中。《新青年》和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而其内容又以西方的“人权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宣传“个人独立主义”，即人人都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猛烈抨击抹杀个人独立人格的儒家伦理纲常学说，鼓吹“解放”和“竞争”的观念；与此相适应，他提倡人生“实利主义”与教育上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批注中，突出强调个人的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他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同时，他也开始推崇竞争的作用：“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这里他第一次改变原先推崇的“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他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此外，毛泽东还受到过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实为无政府主义的江亢虎、朱谦之的影响，参加过上海工读互助团、长沙新村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活动。

以上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与陈独秀相比，除了上述农民问题上的差异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同的思想状况。与陈独秀从一个否定走向一个否定、独尊一说不同，毛泽东对受到的各种影响往往能兼容并包、糅和杂合在一起。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这是造成以上不同思想状况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寻找救国方案时，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为什么富强。于是从1901年开始。他就多次东渡日本，“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接着，他就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来救国。参加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主张“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一面看得较重。陈独秀虽然并不主张全盘西化，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在猛烈抨击儒家纲常伦理的同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保守面看得较重，有否定过多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他后来领导中共和在进行革命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是走向极端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则不然，他比较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因此，他认为对中外文化都应采取“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斟酌国情，两无所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在寻找中国落后和拯救

的药方时，首先应“在国内研究”中国，然后再到外国研究西洋，对中外进行对比研究：“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甚至主张东西方思想同时改造：“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种见解，在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崇拜西方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的情况下，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应作实地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所以1918年，中国再度掀起以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心的出国留学热潮时，他虽然支持大家“出洋”，并亲自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但他自己不去。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化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相比之下，毛泽东比陈独秀更加注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了解、学习和研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陈独秀表现为偏激，毛泽东则表现为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中外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这是毛泽东一生坚持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实行是十分艰难的，掌握得好，能创造出辉煌，如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受民主主义思想的不同影响。与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熏陶和中国激烈的旧民主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不同，毛泽东在1919年以前基本上是个学生，主要的活动是读书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参加过新军，半年时间他又退伍，恢复学生生活。而他受到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如上所述只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而且是十分浅薄的，并没有成为他唯一的或主要的人生指导。这种情况，使他在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能较好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没有发生如陈独秀那样的绝对民主化和自由主义，从而脱离群众、脱离革命以致被开除出党。

## 不同的气质与性格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儿童启蒙时代，都有一个粗暴而严厉的教育长者——毛泽东的父亲、陈独秀的祖父。两人都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反映出两人都有反抗强暴的坚强性格，但是，在斗争的方式上，两人有很大的差别。

陈独秀出生书香门第，但他家前辈的功名从未显赫过。祖父是候补知县，但无实缺。父亲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中秀才后，屡困考场，终身不得志，一直在外做塾师。这样的家庭唯一崇尚的是科举，读书做官就是他们的训子之道。从6岁起，陈独秀就由祖父教读。由于他智商不凡，老人对他期望甚高，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可是聪明者往往个性强，陈独秀不喜欢这些经书，尤怕背《左传》。于是，每当背书背不出来时，祖父就生气，而使他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是，孙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也不讨饶。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

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背后又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很苛刻。毛泽东 6 岁时，就开始干农活，8 岁开始上学，但早晚还要下地劳动。毛泽东刚认识几个字，父亲就要他开始记账。13 岁，他终于离开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他说：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同时，当时的国文老师也是“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对此，毛泽东先是采取“罢课”的办法，表示抗议。10 岁时，有一次，他逃学了，但不敢回家，怕挨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结果得到了胜利。回来后，“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还以“跳水”相威胁，反抗父亲的压迫。13 岁时，有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父子两人在客人面前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父亲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后来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原则的最初源头。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很会运用策略的人，他说，我家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与父亲斗争时尽量利用这个“统一战线”，节节胜利。“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后来，他还发现一个同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以上表明，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人，懂得运用策略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而陈独秀在这方面逊色得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处理。

毛泽东能识别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正确与错误，正确的执行，错误的坚决抵制，而且，在抵制和批判错误时，不采取公开直接打击的方法，而采取间接打击的策略，即只批评中国党内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这是为了在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同时党中央又认为：“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党中央还说：“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我们采取

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毋庸讳言，也是因为国际共运的历史造成了苏共和斯大林的特殊地位，即他们与各国兄弟党的不平等地位，为了保护我们中国党免遭如南斯拉夫那样因触犯斯大林“老子党”的“尊严”而受到的那种制裁。如毛泽东在 1957 年参加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会议时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卡德尔所说：“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则要么不能识别或忠实执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如在 1924 至 1927 年的大革命运动中；要么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不管这条路线中是否有正确的成分，如 1929 年后进行的托派运动。

通过以上对比，就可明白为什么两人后来同为中共领袖，而陈独秀始终是个“书生”，虽然他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不能引导它到胜利，而且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最后是悲剧下场。毛泽东则是一个政治家，他懂得什么叫政治，知道怎样运用策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既能引导革命航船驶向胜利，又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12 日。

《卡德尔回忆录》第 173 页，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

## 学生与老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工作方针时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所以可以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是从学生与老师关系开始的。

两人的关系开始于神交，神交开始于何时？有案可查的是1915年秋杨昌济介绍他阅读《新青年》后，毛泽东不仅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特别爱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他们产生了神交的感情。

###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1918年夏季师范毕业以前，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学生，对于有学问的前辈，他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如对身边直接教育他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阅读了《新民丛报》等维新派的书籍，曾把康梁视为“楷模”，称崇舍身取义的谭嗣同和俄国的托尔斯泰为“大哲学革命家”。但是，阅读了《新青年》，感受到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把最大的崇敬移到了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到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秀。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还常与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康似略有本领（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把陈独秀当作“楷模”，就按照他的思想和作风去行动。于是，毛泽东就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寄给心中敬仰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陈立即将其发表，表示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在1917年4月，在当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而享有崇高声誉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这样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

早在1902年，陈独秀在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谈话中，就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反对只重德、智而忽视体育的传统教育思想。1904年，他在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明确指出体弱是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看重在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

1915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后，更把“体育兴国”作为重要的新思想竭力鼓吹。他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而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又说“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力，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

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对当时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他利用暑假，走访过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的父亲）。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他在实践中锻炼，随后写成《体育之研究》。其中接受陈独秀的思想，甚至有的文字也是相同的。文章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并重。文章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与陈独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肯定清初颜元、李塉“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这实际否定了陈独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的说法——从这里也可看出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

更可贵的是，毛泽东还身体力行，积极摸索体育锻炼的规律，研究创造出的一套通过体育锻炼有效地增强体质的方法。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就介绍了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由于他的提倡和榜样作用，当时第一师范的体育锻炼搞得较好，在1917年的全省运动会中，该校选手得奖60多人。毛泽东自己在该校开展的考察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物互选”活动中，得票最多。

另外在体育锻炼的方法上，杨昌济先生提倡静坐法，以锻炼身心。当时许多学生如蔡和森、张昆弟等（毛泽东的好朋友）都受影响，纷纷静坐锻炼。毛泽东却不予苟同。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说：“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他认为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

间久了，就可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果随意自斫，也会变弱的。这点说明，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即使是他最崇敬的人，也不迷信。

### 第一次见面留下最深影响

如前所述，开始时，毛泽东崇敬的人物较多，即使是在接读《新青年》以后，被他视为楷模的，也不止陈独秀一人。他在与斯诺谈话中明确点了的，还有胡适，实际上还有被他称为组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如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写《狂人日记》等反封建小说的急先锋鲁迅，“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等。但是逐渐地，陈独秀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突出出来，成为“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大社会哲学家”和“思想界的明星”。

这首先是因为《新青年》当时由陈独秀主编，所刊重要文章都是署名“陈独秀”。陈独秀几乎成了《新青年》的代名词，二者密不可分。其次，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他的主张着重在思想方面，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教育革命，等等，固然在当时影响很大，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但是，对比起来，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着力批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提出以新思想培养一代新青年所进行的伦理革命，对整个社会和毛泽东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

所以，《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一周年之际，即1918年4月，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他与几个朋友发起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青年”。为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说，当时武汉、上海、杭州、天津也出现了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激进团体，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大量活动和工作，后来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团体，会员曾发展到七八十人。毛泽东后来骄傲地对斯诺说：“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毛泽东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的改造中国、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革命思想。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日记记述当天下午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的一段谈话，表达了他们已决心把陈独秀当作当代“大哲学革命家”崇敬，投身革命运动的心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

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是完全相符的。第二年毛泽东到北京与陈独秀接触后，这个思想就更加坚定了。

1918年10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初步传到中国的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但是零星的，而且是不准确的）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写的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在北京因生活问题，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与李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图书馆，他阅读到介绍各种思潮的书报；他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眼界大开。同时，从过去的神交——远距离敬仰，变为直接接触，对比之下，毛泽东在这些过去崇敬的人中，终于产生出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并且，随着在1918年底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中陈独秀的表现，给了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印象。而这导致毛泽东在结束学生生活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领导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

正是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形势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斗争十分激烈。首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是战胜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次可以而且应该收回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因此而得到提高。其次，由于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此对陈独秀几年来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普遍高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儒家纲常学说的猛烈批判，使封建卫道士们极端的恐慌，对陈独秀《新青年》无比仇恨，用造谣诬蔑和利用当权的北洋军阀势力等各种手段，进行疯狂反扑，并集中攻击陈独秀和《新青年》。

对此，陈独秀绝不妥协与让步。他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封建顽固派进行反击，坚定地表示：要拥护“德赛”（即民主与科学——引者）二先生，便不得不主张“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这种为了真理坚决斗争、不惜断头流血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使他对陈独秀的崇敬更上一层楼。

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方针，创办了一份直接迅速干涉政治的战斗性极强的周刊《每周评论》，对在这“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政治，发表自己的明确主张，并且把报道和评论的重点，放在当时世人与国人瞩目的舆论焦点——巴黎和会和中国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上。于是，除了《新青年》之外，陈独

秀又多了一面影响和引导收回国权的群众运动（后来发展成五四运动）的旗帜。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又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

### 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与旗手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在1945年还这样以崇敬的口吻，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界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伟大而进步的转折时期。一切阶级、阶层、党派和个人，都在这个时期中受到严峻的考验。如上节所述，从《新青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追随陈独秀的足迹，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更是步步紧跟，领导起湖南的斗争。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那么，毛泽东则是先锋。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定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月内，“救国十人团”迅速发展到了四百多个。

14日，毛泽东仿效《每周评论》，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总方针是“民众直接行动”，并且受了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和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次民众行动夺取革命胜利的鼓舞，对本国这次斗争获得胜利颇为乐观。例如，5月4日，即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第一天，陈独秀发出“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号召。他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中说：“上海的和会，两方面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6月9日，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深入推动五四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北洋政府暴力机关的五条“最低要求”后宣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陈独秀当天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反动的北洋政府逮捕。他在被捕后，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如他在被捕前一天写的题为《研究室与监狱》文章中所表示的，他要把监狱变成“世界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坚决为真理而斗争，为“创造世界文明”而斗争。他教导青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毛泽东遵循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

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也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权，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的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对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发挥到了更高的境界。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前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愈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最后他甚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入唯其独尊的“思想界的明星”的程度。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当时在中国在毛泽东心中威信是非常之高的，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及革命精神的理解与推崇也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即在陈独秀后来犯了严重错误，甚至与当时被视为反革命的托派相结合，被开除党籍，党内大多数同志揪住他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特地为他辩护，对他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可见，虽然经过了26年的巨大变迁，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没有改变。

接着，在第二期至第四期《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又连载重要文章《民众大联合》，发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歌颂了俄国“劳农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等群众运动，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方法进行革命。同时，文章又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在总结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问题上，两人所以在观点上达到了一致，可以明显看出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前者。而在论述上，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深刻，这是因为他

亲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则只参加了辛亥革命新军半年。

《民众大联合》和《湘江评论》上的其他文章还表明，与去北京前相比，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他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现在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等各个领域里的强权，并统统用民主和科学来改变和打倒这些强权。这些文章的思路与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有的语言也相同。

正因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观点一致，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了他们的思想，所以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北京的注意。当时陈独秀正在狱中，《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胡则在《每周评论》“介绍新出版物”栏内撰文介绍，说《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些情况，陈独秀在9月出狱后，当然是注意到了。所以他接着主编的第七期《新青年》中，收登一篇文章《长沙社会面面观》，在介绍长沙五四运动中出现了十多种白话新思潮周刊时说：“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评论》。”

特别是陈独秀出狱时，《湘江评论》出了五期后被查封，毛泽东接着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新湖南》杂志，他一改该杂志原来保守的风格，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开始作正面的攻击，并宣称：“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共力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这年12月出版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立即予以介绍，全文刊登上述宗旨，并介绍第七期的内容，评论说：“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上述毛泽东写的办该杂志的“信条”其精神与语气，与陈独秀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时受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之深，还表现在他发表在与《湘江评论》第二期同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健学会也是当时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产生的进步组织，由湖南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学校教职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这年6月。该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毛泽东的文章借介绍“健学会”为名，发挥上期《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思想和陈独秀批判孔子之道“扼杀自主自由之人格”，使人人沦为“奴隶”，因此“不适用于现代生活”的论断，宣传民主与科学，集中批判孔子和迷信。文章借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为名，指出中国思想界存在着自大、空虚、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这

种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特别是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因此，文章大力提倡“研究”和“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就会做人的奴隶。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紧随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刻意模仿《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而陈独秀又反过来提携和支持毛泽东。南与北互相照应。这时的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来模仿，当作“明星”和“大哲学革命家”来崇敬，是他思想的最大特点。

## 携手转向马克思主义

“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这样评价自己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客观地考察当时二人的关系，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1919、1920年，继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也紧接着实现了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继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行动是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张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与他一样荒淫无耻，专横残暴，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中，这个怒潮的酝酿最为迅速。1919年7月7日，湖南学联曾发动过一次大举焚烧日货运动。之后，张敬尧对各校的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训话，竟粗鲁地说：“你们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否则，本帅就要办人。”引起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正确地估量了当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月6日，长沙主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的宣传，争取外省力量的支持。毛泽东负责赴北京代表团的工作，不料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了向总统府、国务院递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外，他与正在向社会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

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有油印稿。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甚至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如上所述，原来的思想如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他没有意识到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等，也并未肃清。正如他在当时即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自述的：“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而且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并不完全正确，夹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是陈独秀。他甚至说是陈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以支持毛泽东等的驱张运动。文章一开头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里，在湖南造孽的“安徽人”就是指张敬尧。接着，文章在歌颂了湖南历史上著名人物王船山、黄克强、蔡松坡等的奋斗精神后，写道：“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这段话显然是指他在出狱前后对于湖南斗争情况的认识。文章最后，以蝗虫自杀堆尸成桥让后者过河的寓言，盛赞这些湖南青年为了后人和未来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

在上述多种思想“大杂烩”的状况下，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5月5日来到上海。一方面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的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直、皖两系的矛盾打击张敬尧取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深入发展到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办的讨论。毛泽东在各种驱张文件和书信中，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

---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并且广泛进行宣传，实际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

在此期间，毛泽东再次拜访陈独秀，两人进行了一次对毛泽东的一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交谈。他在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又说：“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原来，从巴黎和会召开开始，陈独秀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思考，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激烈、复杂、痛苦的思想斗争，大约在1920年初，终于抛弃了他曾热烈信仰、鼓吹过的“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在政治上，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陈独秀接受了俄国革命后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同时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发表的这些言论来看，他对毛泽东“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就是这些内容。这些思想，对于陈独秀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几十年奋斗后思想重大转折的产物。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起了“茅塞顿开”，“画龙点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评价。

接着，毛泽东就读了三本书，在这年夏天，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冬天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三本书也是与陈独秀有关系的。

毛泽东自己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据查，第一本书是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并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第二本书是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的，第三本书也是陈独秀请李季翻译的。而且这三本书都是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在这年夏天出版的。毛泽东说看了这三本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是这年7月初离开上海的，而这三本书是8月开始陆续出版的。可以想象毛泽东读这三本书与陈独秀的关系了。因为在当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中，除了陈独秀，没有任何人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更深切了。如果给毛泽东寄这三本书，只可能是陈独秀或是陈独秀所吩咐的人。据当时毛泽东最亲近的朋友张文亮的日记记载，9月10日晚上，即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两个月，也是这三本书出版的时候，毛泽东与张在第一师范谈话，次日，张就给陈独秀发信，要求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实际上，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关系，不限于寄书报和思想影响，还在于组织上的联系。因为这时陈独秀已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毛泽东即使不开口，

陈独秀和他为首的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也会主动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寄给他。关于这一点，下节将具体叙述。

毛泽东与陈独秀交谈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思想行动发生重大转折，首先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湖南改造运动中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谈湖南改造问题内容是什么？从当时他的书信和文章来看，是这样的：6月，即在他与陈独秀交谈的这月23日，他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时，提出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20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信中向继张敬尧倒台后打着“湘事湘人自治”的谭延闿、赵恒惕省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显然这是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纲领。但是，从上海回长沙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明显升华，从改良走向革命，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当时，他发现湖南舆论界对湖南的自治运动的认识十分混乱，有的被谭、赵的“湘人治湘”的旗号所迷惑，盲目乐观，并且认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事，要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资格谈；草拟“自治法”更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腐败，自治任务艰巨，没有信心，等等。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从9月3日至10月3日，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十篇文章，评论湖南的自治运动，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自治运动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湖南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自治运动？他认为这种自治运动，必须是由人民——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以及殷勤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的；否则，自治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不能持久的。

第二，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以前，他对自己的湖南自治计划也不满意，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的工作，不能作改良派，“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到底如何“根本解决”？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偶然的。现在，他从陈独秀那儿得到启发，从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罗斯得到了方向。他说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主要由于：一是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的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二是有真正可靠的广大群众的拥护，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工人、农民都一呼而起。

第三，革命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成功。毛泽东认为像俄国革命成功那样的条件，中国还没有具备。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命力量应努力推动当地一般的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争取到群众多数，壮大革命力量。这就需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于是，他把现实的湖南改造运动与将来中国“根本解决”的远大目标结合了起来，使当前的运动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

话虽如此说，在当时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湖南的自治运动毕竟是搞不下去了。而毛泽东等人既然已经找到了根本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的道路——十月革命之路，再加上陈独秀委托他在湖南建党，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把奋斗

的重点移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中国革命上来。

## 实干家与总书记

### 受命在湖南建党

毛泽东与陈独秀上海交谈后最重大的行动是，不再满足新民学会的组织，开始受陈的委托，筹备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两人同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两人之间关系，在师生的基础上，又加上一层革命工作中的同志关系和党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

正是从毛泽东到上海的5月起，陈独秀在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发起筹备中国共产党，并且不久便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他们决定，通过派人、通信等方法，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东京、巴黎等地的社会主义者联系，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与毛泽东及湖南的情况一样，由于几年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和教育，各地都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且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还成立了相应的团体。“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因此特别强调：“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这段话表明，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包括各地党组织是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影响下建立的，湖南的党组织也不例外。

但是，与各地不同的是，湖南党组织的筹备，是在陈独秀亲自关怀与帮助下进行的。在毛泽东7月初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等人酝酿共产党的筹备已有近两个月。毛泽东在此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交谈，而且深谈到信仰与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他离沪时，极有可能陈独秀委托他筹备湖南党组织。由于中共发起组在8月才正式成立，也不能排除是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陈独秀函约进行这项工作。

陈独秀在上海组党经过了召集社会主义者座谈，讨论，分化，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历程；在工作上，则采取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团，组织和训练干部到俄国去学习，开展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措施。在陈独秀的指导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榜样的影响下，这些历程和措施，在毛泽东湖南建党的过程中，得到重演。由此表明：上海交谈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后才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传到中国，真正了解它的人还不多，大多数先进分子还在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迷惘之中，因此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在群众中，特别在先进分子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为此，《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文稿；同时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通俗读

---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物。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刊，特别是上述三本书就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运用新民学会的力量，利用这些书刊，也在湖南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筹备文化书社。8月1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实际营业时，如书社的一个敬告所说：销售的书报杂志，“曾经严格的选择，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8月2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毛泽东就向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求助。后者立即响应。在与书社正式约定进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为它作“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文化书社营业范围有图书、杂志、日报等。据毛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的书刊杂志中，陈独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二千册和五千册。这样大的销售量，在当时全国是少有的。这表明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个资料还表明，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东与他组织的机构、团体。

第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了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过程中，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组织，以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在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研究会的书记干事。参加研究会的都是新民学会骨干。由于陈独秀已在上海建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毛泽东领导的这个“俄罗斯研究会”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便由毛泽东派往上海，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苏进东方大学深造。

第三，成立青年团。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同时，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进步青年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来培训（任弼时和萧劲光等到上海后就加入了青年团）。然后，就向北京、长沙等地寄发团章，指导各地建团。但是，由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始收团员较松，不少如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进来，结果造成无穷的纷争，到1921年不得不重组。毛泽东在陈独秀的直接指导下，对湖南的建团工作一开始就取十分慎重的方针，强调要“找真同志”。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关心至深，曾计划要从上海到长沙亲自参加团的成立大会。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在长沙第一师范进行建团工作的学生张文亮的日记，生动地记载了1920年11、12月

---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新民学会资料》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亲密关系：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要到广州任职，并征得李大钊和上海党内同志的意见，加强广州这个重要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工作，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这年春天，他在广州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四，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决裂。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时，曾把当时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各派系的人物邀在一起，进行座谈讨论，协商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革命党。但是，在讨论中，很快就发生分歧、分化，最后沉淀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自然，有些人后来又不断分化出去）。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长沙建党过程中，也主动进行了这项工作，在清理自身受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引导周围同志学习讨论，加速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化，以纯洁党的队伍。

首先是清除“工读主义”影响。1918、1919年，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毛泽东也一度深受影响，曾在湖南、北京、上海试行。1920年5月第二次到上海时，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邀请，与另一会员张文亮，一起参加了该互助团的活动——“试验工读生活”。但是，一个月后，终于难以维持，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交谈之后，就彻底抛弃了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其次是抛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当时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曾带领上海发起组成员花很大力气批判它，把无政府主义者清理出党的队伍。毛泽东自述，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很感兴趣。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当时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者）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也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920年秋，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清除湖南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教育争取了两个工运领袖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即黄爱、庞人铨。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教育争取，后来二人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在领导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斗争中，二人被赵恒惕的军队逮捕，英勇牺牲。他们牺牲后，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印发纪念特刊。

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的战友蔡和森也在此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毛泽东在完成这个转变后，与蔡合作引导新民学会会员们分清各种思想界线，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湖南建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激烈动荡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民学会内部也早已发生分化。因此，毛泽东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展开思想斗争。他在当时给会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等人在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政治机关报、也是具体指导各地建党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该刊内容主要介绍俄国共产党历史，登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以及报道共产国际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等，还有批判无政府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实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文章。创刊号发刊词《短言》，实际是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这个刊物创刊后，立即寄往长沙。张文亮12月27日日记写道：“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集在长沙的会员召开了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旅法会友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与会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多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1920年10月，英国人罗素由张东荪陪同，到长沙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实为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度使其成为无政府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在先进分子中影响很大的思潮，因此陈独秀等人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毛泽东也在新民学会集会及通信中，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

---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集，1920年12月出版。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参见《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1921年1月31日出版。

同样的过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又是“人为的革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

### 区委书记与中央局书记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一行人到上海，了解中共筹备情况后，催促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李达写信与陈独秀商量后，邀请正在筹备党组织的各地各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一大。毛泽东即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参加了7月23日至8月初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在广州忙于教育改革，没有参加大会，但大家仍选举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9月，陈辞去广东的职务，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11月，他起草向各地发出第一个中央“通告”，布置明年7月以前党在发展组织、青年团、工人运动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四方面的任务。从此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长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的轨道，贯彻执行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毛泽东湖南党组织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也就建立起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并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泽东则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高质量地完成一切任务，并积极争取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帮助。例如：

10月下旬，中央指示各地派代表参加明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即派共产党员夏曦、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

12月中旬，马林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会谈途经长沙时，毛泽东与支委易礼容等热情接待，并请他向工人和青年介绍俄国革命情况。

12月2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

1922年5月5日，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二千余人，毛泽东在会

上作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

自然，双方彼此最大的合作和支持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

根据中央“通告”，毛泽东把当时湖南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执行委员会的任务。

上述中央“通告”规定，上海、长沙等五区，明年7月以前，必须各发展30位同志，成立区委，“以便开大会（即二大——引者）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就努力突破新民学会的范围，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较好的单位，积极发展党员。例如，他们先在由毛泽东创办的带有“党校”性质的自修大学和第一师范等发展了一批党员，接着便在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工人及泥木、印刷等行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终于在1922年5月底，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到1923年初，达到40多名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长沙区执行委员会的机构，为党的二大的召开与及时建立中央委员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本来是要参加党的二大的，但因忘记了开会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在党的二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则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

同时，在上述湖南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党中央也给了毛泽东必要的帮助。如为了帮助解决缺少有理论有经验的党的干部问题，1921年，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时，陈独秀在中央干部也感奇缺的情况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泽东对李特别倚重，立即派他到当时最重要的工运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到那里后建立起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紧接着就发动起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湘区区委建立时，李立三当选为委员，同时也是长沙青年团区委三位领导人之一。

衡阳县立第三师范是湘南五四运动的中心，校内有蒋先云等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心社”，早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21年10月就在该校发展党员。第二年5月，该校教师屈子健带领一些教员和实习生去江浙一带考察教育，并聘请一名英语教师。毛泽东即写介绍信让屈在上海拜见陈独秀，请陈给以帮助，并以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名义，要求陈派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来湘工作。陈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到湘后，毛泽东即派他到三师，表面上为英语教员，实际上，按区委的要求，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区党的组织，加强了该地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23年春，终于发动起震动全省的“三师学潮”。

在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关心支持和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共湘区区委在当时全国五大区委中，思想最纯正，队伍最整齐，工作最出色。

二、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工作的一面旗帜。由于1920年8月陈独秀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混进了一些思想备异的分子，党的一大后，中央决定改组青年团。上述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即向各地通报了这个决定。1922年5月5日，陈独秀指导召开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团的章程和纲领，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同时鉴于团的群众性，“通告”又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团员。毛泽东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并在湖南积极贯彻。

早在 1922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到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参加黄爱、庞人铨的追悼大会时，陈独秀刚刚与专程来华考察青年工作的少共国际代表林及筹备团的“一大”的张太雷、刘仁静等商量落实好团的“一大”议程。4 月中，毛泽东一回长沙，就派易札容、陈子博去广州参加了这次大会。接着，就趁热打铁集中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和任务。6 月 7 日至 15 日，毛泽东三次致信团中央，汇报情况：长沙团的改组，两周内可办妥：衡阳团员“现有 50 余人，都是好的”；团“一大”议决的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团中央机关报）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子，“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等等。中央“通告”要求全国团员在 7 月份达到 2000 人。而小小的衡阳已有 50 余人，而且“都是好的”；仅仅长沙一区，索要团章就达“千份”。可见他们当时工作之优秀。终于，17 日，青年团长沙改组大会召开，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长沙 S.Y 执行委员会细则》，推选了由毛泽东（书记）、李立三、罗君强三人组成的团区委。接着，衡阳、常德、萍乡、醴陵等各县分团相继成立。

鉴于此，陈独秀和党中央十分赞赏长沙区委的团的工作，曾决定 1923 年召开的团的“二大”拟在长沙举行。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大会改在该年 8 月南京召开。

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模范。鉴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党成立后，把革命活动方面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1921 年 8 月 11 日，即党的一大后，立即成立了专门领导全国工运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斗争也由无组织向有组织转化的阶段。党在工人中的活动也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组织工会。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的要求是：大力开展劳动运动。但是，工人群众只有看到与自身的解放有利时，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才会组织工会。所以在工人中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必须与发动他们向资本家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提出反映他们利益的要求，并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掀起持续高涨达一年多的工人运动。在国际工运史上实属罕见。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的运动，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从 1921 年 11 月至第二年 5 月，在《劳动界》、《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他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阐明这次工运的目标、政策策略、注意事项等。5 月，他又指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统一步伐，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 年全国罢工一百多次，罢工工人达 21 万。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初次面临这种局势，一时未找到对策，工人罢工多数胜利。所以这年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的这一章工运史中，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是重要的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然后，根据中央部署，首先抓各地各业工人的工会组织。他说开完一大，回到湖南就“猛烈地推动工会工作”。他亲自指导改组了湖南最大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并被邀担任该工会的会务助理；他亲自指导成立了长沙的泥木工会、铅字活版工会、理发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岳州铁路工会、新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等等。

由于这时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组织影响全局的全国铁道工会，所以毛泽东在粤汉铁路上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

中，化了较多的精力。早在1921年10月，他就到粤汉铁路工人中了解生活情况，然后，就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毛泽东又到安源煤矿考察，然后，他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重要干部到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性质的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出任安源俱乐部主任。毛泽东还派郭亮等党的干部，组织了岳州、新河等铁路工会，并任领导。1922年11月1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5日，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工团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

如此，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涨，湖南的工运有了极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当时的中央“通告”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这样，湘区就大大超额完成了中央布置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湘区区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人运动。最著名的有1922年9月举行的安源煤矿工人1.7万多人的大罢工，毛泽东为这次罢工提出了正确的策略和口号；10月，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2000多泥木工人21日的请愿大会和23日的请愿游行；11月，长沙笔业工人大罢工、长沙印刷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大罢工，等等。

这些罢工，与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其特点是，由于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区委的正确领导，提出了有理有利的罢工口号和工人要求，使用了巧妙的有节制的斗争策略，防止右的或“左”的干扰，团结了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粉碎了反动派的一切破坏阴谋，因此都取得了胜利。而且，由于在胜利的基础上注意巩固成果，一般都派党的得力干部担任各个工会的领导，又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一般都开办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在普及文化知识同时，利用党中央提供的《劳动界》、《新青年》等书报，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还亲自担任几个工会的秘书，经常到工人中演讲，有时甚至当罢工工人的代表，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所以，在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反动、各地工运成果丧失时，湖南的工运红旗却安然不动。安源工人俱乐部曾被誉为“小莫斯科”。这种情况，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工运的模范。

1922年1月，黄爱、庞人揅在第一纱厂的罢工斗争中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后，毛泽东除在长沙开展大规模的追悼活动，以示抗议外，同时派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陈独秀和党中央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决定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广州等地也开这两位烈士的追悼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分别为此事件发表宣言。3月26日，上海的追悼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开，并由原先毛泽东派往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最早加入青年团，继之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开辟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劳动界》编辑李启汉主持，陈独秀亲自参加，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追悼死者应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再次赞扬了湖南人“最富于革命的反抗精神”。接着，陈独秀向毛泽东布置了5月初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毛泽东回湘后，立即派易礼容、陈子博、

张理全参加“劳大”。陈独秀指导并参加的这次大会特别关照湖南的运动，通过了“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纪念日。

毛泽东湘区区委上述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党中央的特别注意。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 中央秘书与委员长

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于是，陈独秀拟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当时由于全国工作的开展，干部缺少的矛盾尖锐起来。再加上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引起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坚决反对，有的还退党，陈独秀觉得身边能做团结工作的干部的稀少问题更加严重起来，补充刻不容缓。所以他一方面在1922年11月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时，要求在国内外的同志尽快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则在国内从基层上调干部。这时赴法的李维汉正好回国，年底加入共产党。1923年1月，中央作出决定，派李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

显然，除了湖南工作出色之外，陈独秀所以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还因为二人在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思想一致。

当时在党内引起重大分歧的是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并拜见孙中山后，于3月到达上海，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没有为中共领导所理解。所以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反对这个建议的第六条理由是：“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另外又认为国民党不纯，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军事投机，成分复杂等。

接着，在7月份马林亲自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上，把中共加入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硬要中共接受再次来华的马林指导贯彻。8月22日，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等中央多数委员表示服从。然后，陈独秀就在行动上积极加以贯彻，写文章，作报告，热情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亲自参加国民党的改组行列，做了大量工作。西湖会议没有形成文字决议，会后，陈独秀派张国焘到长沙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和区委接受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并在行动上表示拥护。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文章，提出国内有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文章主张“最急进的共

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中共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6月上旬，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离沪到广州，参加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起草各项决议案和新的中央人选问题。6月12—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议还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妇等各项决议案，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但是，对于委员长来说，毛泽东毕竟是秘书，是陈独秀的助手。尤其在当时，由于存在小党领导大国的矛盾，中央领导干部经常分散在各地，有四名中委常驻京、粤、鄂、湘，蔡和森因对国共合作政策持保留态度，只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瞿秋白除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耽搁一个长时期，又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毛泽东也由于做国民党的工作，奔走于沪湘之间，多半时间不在中央，因此中枢往往是陈独秀一人驻守，许多事不经过会议便由他直接决策。为此，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三届三次会议上，他也曾表示：三大后中央决策多取决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会议予以检讨。这种情况，决定了毛泽东这个秘书，主要是协助陈独秀的工作，而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思想是与陈独秀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陈独秀对他也是信任的。

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两人在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看，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两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致信共产国际报告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两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

自从接受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后，陈独秀的思想

又走向另一极端。当时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从而在它的远东边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的邻邦，使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他们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的观点，甚至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中国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三大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毛泽东同意陈独秀反对孙中山历来只依靠南方军阀军事北伐的方针，主张应依靠民众、搞民众运动的方针。三大后的第五天（6月25日），他们两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因此，在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对方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共产国际是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

但是，在革命方式上，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群众，最后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竭力反对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一度掀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的旧政权，认为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而是支持北伐战争的。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个空白。在9月中旬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他以当初筹建湖南共产党那样的满腔热情工作，到10月初，就建立起国民党长沙支部，进而在长沙、宁乡、安源建立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毛泽东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

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胜兼理）。所有这些，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他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发展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关于坚决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斗争。自从1922年孙中山确立容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态度，进行种种破坏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公开进行分裂活动，11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进行反苏反共活动。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者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执行国际指示领导全党对右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上述右派言论。毛泽东与陈独秀保持完全一致。在国民党一大上，他配合李大钊等人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错误后，指示“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这个“通告”表明，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与陈独秀执行的是“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陈独秀后来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违背了这个方针，导致了他自己犯错误和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则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个方针，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遵照这个方针，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指出戴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正在成为蒋介石智囊的戴季陶以及叶楚枪、孙科等人，与西山会议派者右派思想上一致，策略上有分歧。因为他们在反帝反北洋军阀以争夺权利上，还需要苏联和共产党的支援，只想控制中共，还不想公开反苏反共。而陈独秀当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企图以妥协拉拢这个中派式的新右派。用斯大林的话说，利用他们的反帝积极性。为此，他在

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的赞助下，与蔡和森、张国焘一起，在当时上海苏联领事馆内，与孙科、叶楚伦等人谈判，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并“保驾”对方回粤工作。所以，主张拉住“中派”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是一致的，但出发点可能有区别，毛泽东是为了领导他们，陈独秀是为了向他们让步。从这里，毛泽东开始与陈独秀有分歧了。

## 分歧的产生、发展与分道扬镳

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促进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毛泽东为所长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接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建立了统一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在我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解放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也就是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产生、发展以致分道扬镳了。

### 对中国社会的两种分析

由于中共中央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繁重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陈独秀同意，回湘疗养。但是，他是一个革命责任心很强而又闲不住的人，回到家乡韶山后，他一面帮助加强当地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配合陈独秀党中央领导的“五卅”运动，发动领导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还化了很多精力，进行农村调查，在1925年8月青黄不接又遭大旱时，发动韶山农民开展“平崇阻禁”谷米斗争。从此外起，毛泽东开始了领导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实践。

为了安全，陈独秀在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一直在城市里过着隐居的生活，同时他也没有亲自到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却又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脱离革命的实际，带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色彩。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本来就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因素，再经过陈独秀的理解和推行，问题就更多了。而毛泽东则不一样，他从湖南建党开始，一直在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如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韶山农民运动，在上海、广州工作时期与国民党中、上层干部的合作与斗争等，深切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于是，随着阅历和经验的生长，毛泽东逐渐成熟起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与陈独秀发生分歧。

首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在1923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两年后的同一天即1925年12月1日，两人分别写了一篇主题相同的文章，前者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者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三个阶级的分析，两人的文章有明显的差别。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

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这个主张遭到国际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即使其“颇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

由此看到，两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估计和革命结局，完全是对立的。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而陈独秀在国际的指导下往往比较自觉地执行妥协让步的政策。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则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因此，他虽然承认它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进的先锋”，但又凭想当然认为：“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了。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因经济落后，数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数在

外资产业之下，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因此他们有两点优点：第一，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从他在这前后发表的文章看，“主力”与“领导力量”是同一个意思。

关于农民，陈独秀只是笼统地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由于这样的认识，后来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当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起来时，陈独秀也感到鼓舞，在1926年10月17日曾致函各级党部，谈到怎样大力发展党组织，使党早日走出小团体，成为“群众的政党”时指出：“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后来的中央局报告称：仲甫同志的“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但是，当国民党起来攻击农民运动时，他为了执行国际维护国共合作的路线，又来限制农民运动，从而与毛泽东那样全力支持农民运动的党内同志发生冲突。

毛泽东则以他对农民特有的了解与感情，在党的三大讨论时，就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指出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对农民的各个阶层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析：他把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半自耕农（下中农）、半益农和贫农归为一类——“半无产阶级”，说“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由于受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都“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尤其是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 对待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

中共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一时也无暇去做。1924年12月，毛泽东离上海回湖南养病。第二年春夏，在老家湘潭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平粜阻禁”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并调查了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毛泽东的活动，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在群众的保护下，毛泽东到了广州，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经

过调查和斗争，毛泽东于12月1日在《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即进入1926年。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激化，特别是北伐战争的开展，和南方工农运动的蓬勃掀起，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也就逐渐尖锐起来。

1926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与广东区委准备削弱右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排挤右派。但陈独秀与国际代表执行莫斯科关于联合新右派反帝的路线，否定了毛泽东等人的计划。结果，在选举出的国民党中央委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左派14名，右派和中派却有15名。在中央监委中，共产党员只有一名，右派占了绝对优势，使国民党中央委和监委联席会议时，造成左派孤立，右派势大，中派壮胆的局面。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打击参加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共产党员。毛泽东与当时在广州的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主张联合当时尚未附蒋的其他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反击，被在华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否定，满足了蒋的要求。陈独秀在上海得知消息后，起先束手无策，尔后面根据党内群众广泛的要求，准备反蒋，一面请示莫斯科，再次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指示在京准备回国述职的鲍罗廷返回广州，执行向蒋妥协的方针，并批评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提议。陈独秀退而积极执行妥协政策，写了给蒋的信和文章，表示拥蒋，引起毛泽东及广东区委的不满。但毛泽东等也不得不表示服从国际和中央的方针。

由于毛泽东在研究和从事农民运动上的杰出贡献，1926年2月5日，他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1月上旬，他又成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他的指导下，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突破减租减息，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阶段。因此，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在12月中旬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支持湖南区委提出的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掌握会议的陈独秀、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对形势的估计落后于实际，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并提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革命的标准。会议最后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决议，强调为了改善国共关系，中共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只能“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规定党在农民问题的策略是：限制农民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是想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以牺牲工农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要求。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同陈独秀第一次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求国民党“军事领袖帮助农民斗争”，只能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次会议后，他没有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错误路线所束缚。12月17日，他从汉口到长沙，仍按他的思想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工大会。大

---

参见《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89、401页。

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宣言和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并指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惧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但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又不得不执行中共中央12月会议的决议。他在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

为了回答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责备和刁难，同时也是为了说服党中央纠正右倾错误，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一个多月之后，写报告给陈独秀，主张中央“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路线”，指出“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紧接着，他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题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两节，以明确而尖锐的观点，歌颂农运“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贫农是“革命先锋”，不是“痞子”，并论述了农民运动在完成这次伟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矫枉必须过正”，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农民的行动“过分一点也是对的”。18日，此报告即送给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紧接着又送了报告的其余部分，即14件大事。3月12日，《向导》即刊出报告的主题部分，而14件大事没有继续刊登出来。4月份，中央主管宣传的瞿秋白为毛泽东的全部报告出了单行本，并为此书写序，表示很赞赏。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瞿秋白要彭述之将《考察报告》全部登完，彭不同意，才在瞿的主持下出了单行本。五六月份，共产国际俄、英两种文字机关报《共产国际》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这个报告。应该说，共产国际是十分重视这个报告的。

接着，中共中央就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农委书记，给了他领导全国特别是南方数省农民运动的权力和机会，使他很快成为全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但是，陈独秀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必须执行国际的维持国共合作的路线，却处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和像毛泽东这样的农运干部要求彻底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地主家庭出身或与土豪劣绅有联系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北伐军官因被冲击而反对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既要求支持土地革命，又要求不使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受到两面夹击，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于4月2日被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为土地问题委员会成员。在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后，19日又出席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听取湖南、广东和北方等代表关于农民运动状况和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报告。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三）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五）征收地税问题。在翌日举行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没收土地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解放农民不仅包括现在耕种受痛苦的农民，也包括士兵在内。会议采纳毛泽东所提的意见，

---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408—409页。  
《湖南工农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2月21日。

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苏联顾问）和湖南、湖北两省农协代表各一人组成五人专门委员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22日，毛泽东出席第三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谭延闿等也出席。邓演达代表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他说：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为适应农民迫切要求使联合战线不受危害，在步骤上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政治的没收”，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毛泽东对草案作补充说明：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于全国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此为经济没收。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专就湖南的状况来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毛泽东还说，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参加会议的汪精卫表示反对“决议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以政治没收为名，行经济没收之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24日的第四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土地没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发言只得同意全部（包括湖南）用政治没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指出，须再加以限制，说明界限，没收土豪劣绅军阀反革命派的土地是无人反对的。

然而，在26日举行的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应邀出席的陈独秀和鲍罗廷只表示原则上赞成这个政治没收的办法，却提出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需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这就等于连政治没收也取消了。因为国民党掌握的国民政府是不准备解决土地问题的。汪精卫则在第六次土地会议上表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在全国统一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是，未被采纳，甚至未予讨论。毛泽东后来归罪于陈独秀支配下的党中央。其实，陈独秀在五大上虽然与鲍罗廷共同主张“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即先北伐打到北京，再进行土地革命。但当时因国际准备撤换陈独秀，掌握五大领导权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国际代表罗易等人。因此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定了陈独秀的主张，确认了政治没收的方针，但又强调实行这个方针必须通过国民党。结果，因国民党反对而落空。

就这样，在土地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情况下，中共五大因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代替陈独秀，仍然选举他为总书记，毛泽东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两人虽然在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和农民问题上有分歧，但因都得服从国际的路线而没有决裂。

大革命面临失败危机，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毛泽东列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以利用国民军招兵机会加入，但要保存与农会的联系以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毛泽东发言则说：关于省农协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紧接着，共产国际虽然采取新方法，也无法挽回大革命的失败。此后，毛泽东与陈独秀也终于分道扬镳了。

## 分道扬镳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终于失败。共产国际被迫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并寻找失败的替罪羊，派来代表罗明纳兹。在8月7日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而陈独秀被阻止参加。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不指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正式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这里道出了他过去虽然与陈独秀有分歧却总是服从中央的思想原因。国际的新路线符合他一贯主张的，他自然完全拥护，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传达会议精神，并劝他接受国际决定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对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拒绝去苏，同时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后来，他进一步论证革命在“往下落”，进入“低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稳固，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四不”（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为口号。接着，他在9月10日，由武汉秘密返回他熟悉的上海，利用华洋杂处的复杂环境，隐居起来，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由此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陈独秀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南农村“邮路图”。这图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

就这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上海大城市隐居起来，后来主张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毛泽东则到农村领导武装斗争。由于农村武装斗争是以后20多年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场，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实际上是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而陈独秀则远离革命斗争的实践。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而且，由于陈独秀那样的处境，他只能凭主观想象或书本上的教条来理解革命，因此一错再错；毛泽东则能在革命生动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这就决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局和命运。

大革命失败时，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陈独秀在当时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

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29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活动发展到高峰。一方面是由于在7月发生了国民党为适应帝国主义“反苏”要求而制造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根据国际要求错误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方针。陈独秀多次写信批评中央失策，要求中央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但这个意见却引起国际和中央的强烈不满。同时，陈独秀在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上述托派路线，要求党改变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在全党公开讨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来说也是不现实的，自然遭到中央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终于在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

这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命经验。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接读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至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接着，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小组织。1930年3月1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月13日，他又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说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哄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

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年5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

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

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当 1931 年底至 1932 年初，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他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但是，当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 客观地评价陈独秀

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严厉打击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中共党内连续数年的“左”倾路线与“左”倾思想的统治，中共对陈独秀问题一直持十分严厉的态度。陈独秀去世时，在共产党的档案里，他还戴着“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等一系列帽子。因此，如何公正地评价陈独秀，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学术领域里的一个重大问题。

历史公正地裁决了大革命失败后同时存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三条路线的是非与成败。以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路线、以陈独秀托派为代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即议会斗争）路线都是错误的，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是正确的。历史终于选择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改变了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干部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对陈独秀等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正确评价是一贯的。毛泽东因为比陈小14岁，而且在他的探索救国道路中，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调到中共中央工作，等等，主要受陈的指导和提携，相对说来，他受陈的影响较大，因此也很了解陈独秀。可以说，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最高最正确。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毛泽东曾参与营救活动，发表文章，称陈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随后，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在与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通信时，称赞陈在上海的建党活动和陈在《共产党》月刊上写的发刊词“旗帜鲜明”。1936年，陈独秀因进行抗日反蒋活动而被捕，关在狱中。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回忆自己成长的历史时，说自己受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一度把陈视为“楷模”，后来到北京拜访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他说陈“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到上海再与他见面时，“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讲话中，给陈独秀以很高的评价：“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自然，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也是批评最多的。几乎每次提到右的历史错误，都会点陈独秀的名，但都

是从总结革命经验出发的，没有丝毫如王明那样“着重个人责任”、故意夸大和人身攻击的因素。特别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等一系列重大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都极端珍视陈独秀提供的正、反两种经验；事实上，这些经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经验大部分是反面的经验，但人的认识如果只有正面的经验而没有反面的经验，是不完善不深刻的。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革命的利益，出于党的利益。

关于陈独秀后期转向托派的错误，除了王明、康生把陈视为“反革命”、“汉奸”之外，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过“反革命”这个词，但实际上仍视他为犯错误的干部，因此在抗战初期有与陈独秀派合作抗日的响应，有后来把陈接到延安养起来的考虑，并且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党内对待陈独秀等历史上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时明确指出：反对错误路线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为此，党制定了以后处理历史问题的方针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吾爱吾师，亦爱真理。而王明等人对于陈独秀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最高的，也是一贯的。

毛泽东所以能够比较公正地评价陈独秀，一是他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是从自己成长和共同战斗中，深切了解陈独秀的是非功过，三是出于公心，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有了这三条，毛泽东就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绩。

## 毛泽东与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中山公园。

一位身材瘦高，面容清癯，文质彬彬的青年男子，被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押解至公园的凉亭前。这里摆好了刑餐：菜四碟，酒一瓮，青年坐下自斟自饮，神态自若，边吃边对站在一旁的兵士说道：“人之公余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酒毕起身，让长汀艺园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下最后一张照片，缓步走出中山公园。他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来到西门外侧养济院的草坪中央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言罢饮弹三发，从容就义，时年36岁。这位青年男子，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

1950年12月31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毛泽东读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请他为瞿秋白遗集题词的来信陷入沉思。良久，他提笔展纸，写下如下一段话：瞿秋白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这是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这一评价虽然是在46年前作出的，但是依今日眼光读来，仍能感到它包含的亲切、信任和公允。

毛泽东了解瞿秋白。

在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也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经历最为坎坷、生前身后都颇受非议的一个人物，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先后多次为他的问题作结论。他在世36年，洋洋洒洒写下500万字涉及革命理论、文学艺术、经史百家、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述，是党内少有的、极富才华的文人政治家。在党的幼年时期，他为挽救中国革命率先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临危受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将中国革命继续推进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但缺乏经验的他，一度将革命航船导向“左”的航道。尽管他的错误在党内存在不到半年，尽管他勇于修正错误，不改初衷地坚持革命，却始终未能摆脱王明路线的残酷迫害和打击。从某种角度说，瞿秋白是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领导者，他是不成功的。

然而，认真探索一下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活动轨迹，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都曾达到共识。瞿秋白之所以能够位居领袖地位，并非完全出于偶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见，使他被推举到领导岗位。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指示有独到见解和独立思考的人。他对毛泽东的真诚扶植，对毛泽东成为全党的领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均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诚然，在广大共产党员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工农的革命义愤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

下，他主持的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毛泽东有过“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瞿秋白思想，便没有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没有瞿秋白的不成熟领导，就没有成熟的毛泽东。毛泽东正是在借鉴党的早期领袖右的或“左”的经验教训后，才将革命导向成功的。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领袖的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一结晶是在漫长的艰难历程中磨炼而成的。

## 并肩站在国共合作的潮头

1924年至1927年，是中国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然而它所蕴含的丰富历史经验，令无数史家及炎黄子孙流连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国民革命迅猛发展，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局面，彻底扫荡了封建军阀割据势力。在这场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为捍卫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 共同促进国共合作

毛泽东与瞿秋白结识于1923年5月。

1923年4月底，29岁的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毛泽东接到调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命令。他离开湖南之前，中央通知他即去广州参加筹备中共三大。那时粤汉路不通车，毛泽东只好绕道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同行赴粤。

在参加筹备中共三大的一行共产党人中，有一位毛泽东以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这便是瞿秋白。

这位出生于江苏常州的青年，虽然年仅24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才学。他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底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他曾以酣畅、激情的文笔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50余篇约20万字的通讯报道和专访，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4本报告文学专集，是向中国读者详尽描述苏俄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更重要的是，这位文思敏捷的青年，在苏俄系统地阅读、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毅然选择了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志向，于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两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像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共群体中，无疑是对马列主义及苏维埃革命最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最有发言权的人。因此，当1922年11月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给他担任翻译的瞿秋白颇为赞赏与器重，商请他立即回国工作。就这样，会议结束后，瞿秋白随陈独秀等人登程回国。1923年4月，瞿秋白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这次随中央到广州筹备三大，他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党纲草案，并兼任马林的翻译。

广东区委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小楼——春园（今广州新河浦路24号），安置马林、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中共三大筹备者。春园北面一百多米处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名恤孤院后街，这条街上的31号住宅（今恤孤院路3号），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街面，楼下南间是会议室，室内正中摆着一张已褪色的红漆长桌，两边各摆放一列长条凳，长桌两端是小方凳。屋子由于多年失修，显得十分陈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就是在这狭小而简陋的屋子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人，都是中共党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项英、林育南、刘仁静……这些从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浙江、山东、满洲等地日夜兼程赶至广州的人，代表着当时全国仅有的432名共产党员，来商讨一件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行国共

合作。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出席中共三大的唯一的外国人，而国共合作的重大议题正是他最先提出的。1921年冬至1922年春，马林曾奔走于中国的华南、上海和北京之间，他考察了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寻找合作对象。这位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荷兰人，曾于1913年被派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工作，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成功地帮助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当地的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合作，使爪哇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工运日益发展。在中国，他经过考查认定只有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但是马林的建议，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拒绝。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正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策略原则。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心中，国民党是一个“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只不过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客集团，对这样一个大而无当的国民党，并不是什么可靠的联合对象，更不要说党内合作了。马林一时难以说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便于1922年4月乘日轮鹿岛丸离开上海，绕道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回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看法也开始有了变化，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这以后，党的策略有了显著的变化，初步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这期间，马林的赴苏请命，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党内合作的指示又返回中国。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根据马林的提议，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上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马林7人扮作西湖游客，于湖光山色之中酝酿着一场风雷激荡的大革命运动。经过马林的说服和热烈的讨论，除张国焘、蔡和森外，多数人基本接受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到中共三大召开时，“二七”惨案中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工人的阴影仍笼罩在代表心头，许多人领悟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单凭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这以血换来的认识，并不是所有参加三大的代表的共识。尽管国共合作问题已酝酿了一年，但会议期间讨论这一问题时，仍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而陈独秀则提出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他同马林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在中共三大代表中，只有陈独秀和张国焘是连任两届的中央委员，然而他们两人的主张竟大相径庭，由此引起更热烈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与瞿秋白坚持了共同的意见，一致赞成国共合作。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

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瞿秋白则从理论角度思考的更多。他既反对和批评了张国焘的意见，亦不同意陈独秀的主张。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认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这一点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需要上，都是绝无疑义的。瞿秋白在批评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反对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不赞成将民族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削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起草党纲草案时曾明确写道：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应竭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但这段文字后来遭到陈独秀的删改。

中共三大的气氛是民主的，虽然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最终还是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三大结束后，在春园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被推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担当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开始步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开始参与党的核心决策工作。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但他独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及政治优势，使他一回国便崭露头角，迅速被推上党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党中央的一支笔。甚至他那娴熟的俄文功底，也促使他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交往的首席联络员，他的才能得以很快被双方发现并倚重，这是瞿秋白迅速接触并步入中央领导层的主要原因。

中共三大是毛泽东与瞿秋白交往的起点。这两位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很快担负起党交给他们的一系列革命重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去了。

### 同是跨党的实干家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后，毛泽东与瞿秋白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此时的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真诚地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在改组国民党的实施进程中，毛泽东和瞿秋白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堪称是两位出色的跨党实干家。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当时他的妻子杨开慧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岸青即将出生，生活负担很重。加上毛泽东曾遭赵恒惕通缉，常有敌特监视和兵警搜扰，使她苦情难诉。但是毛泽东回湘后，却无暇顾及妻儿老少，他此次回湘，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中共三大时，他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会后曾捎信给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提请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这次，毛泽东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名义来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总支部的。在他的周密策划下，仅用半个

月，国民党长沙支部便宣告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奔走下，宁乡、衡阳、安源、常德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地方分部，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也应运而生。在国民党史上，湖南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里有着毛泽东的一份功劳。历史的巧合是，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都是在毛泽东的发起和努力下创建的，这绝非是历史的偶然，它恰恰表明国共合作是联系各种社会力量，推动国民革命的最佳方式，而毛泽东正是率先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才能自觉地站到这场革命洪流的源头。

那时的瞿秋白，尽管刚刚回国半年，已成为党内不可缺少的一员干将。三大以后，他受李大钊之托，除了继续主编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外，又担负起创办国共合作的学校——上海大学的重任。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一所新型学校。其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过去由于师资匮乏，学校办得毫无生气，甚至校长也让学生赶走了。继任的校长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者，拥护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一次他听说李大钊到了上海，立即请他到福州路（前四马路）同兴楼京津菜馆进餐，向他征询办学意见。李大钊首先强调应办好大学社会学系，并推荐邓中夏出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已收到胡适的推荐信。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这是一个薪俸稳定且环境安宁的职务，对于体质孱弱的瞿秋白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去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到条件很差、薪水不高的上海大学，担任了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国共合作建立后，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学有专长的进步人士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陈望道、沈雁冰、田汉、丰子恺等到校任教。这些人的“加盟”，给上海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办好学校，瞿秋白倾注极大的精力于校务的改革，1923年8月，他满腔热忱地写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的长文，对上大教学规划、办学方针、学校体制、各系所设的必修课程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瞿秋白的社会学系是办得最出色的，他除了当主任，还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培养、提高学生观察社会和认识社会的能力。瞿秋白学识渊博，对欧洲哲学流派了如指掌，对马列主义研究的功底深厚，他讲艰深的哲学课，一扫以往教学的沉闷空气，每每旁征博引，信手举出古今中外许多事例，深入浅出地分析、解释，把理论和实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生眼中，瞿秋白那学贯中西的丰富知识，从容安逸的讲课神态，及至西装革履的翩翩风度，构成了一种和谐的美，使学生感到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因此，每逢瞿秋白上课，大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不仅社会学系的学生去听，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甚至教师都愿意去听。这样，无形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教育、培养了一代新人。

在瞿秋白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获得很大发展。国共合作时期是上海大学的全盛期，这里人才济济，群贤相聚一堂，无论是教学还是社会活动都充满生机。上大师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站在广东革命政府一边，成为大革命时期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场所。后来有许多优秀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切，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上大”的中流砥柱。其中瞿秋白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在当时的中共群体中，同那些在全国各地为改组国民党而奔走的共产党人相比，瞿秋白还承担着更为特殊的重要使命。他自1923年9月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后，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广州与上海之间，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直接参与改组国民党的核心决策。

1923年10月，苏联政府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鲍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可能的人，孙中山十分高兴地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协助自己进行这次改革。瞿秋白作为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参加起草改组国民党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关于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内容等问题，他曾与鲍罗廷一道，多次同孙中山商谈，他们的建议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采纳。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瞿秋白参加起草的重要文件之一。当时负责起草这一纲领性文献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瞿秋白。为了这份宣言的出台，瞿秋白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往返于上海和广州，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多次商讨。

在孙中山矢志不渝的努力和共产党人的密切配合下，改组工作得以顺利推行。1924年1月，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与瞿秋白以双重身份一道出席了这次大会。这两位跨党实干家一同被孙中山遴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段经历，在毛泽东脑海中留有很深的印象。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回顾了这段往事：

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

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讲这段话时，距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已过去21年，正是由于他的亲身经历和为之奔走，使毛泽东记忆犹新。他在追述这段历史时，首先提到鲍罗廷和瞿秋白，也表明他对瞿秋白在筹备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的。

## 携手反击国民党右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帷幕。然而，孙中山倡导的三大革命政策，在实施中却不断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干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反击右派势力的斗争始终未断。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与瞿秋白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为加强地方党务，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上海执行部管辖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执行部系国共合作机构，上海执行部里的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于右任、张人杰等，共产党人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罗章龙、王荷波等，每个部门都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事。当时上海社会将这里称之为“国共群英会”。然而，就是在这国共人才荟聚之地，斗争却异常激烈。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涣散，不少党员只是挂名。为了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后首先进行旧党员的重新登记。毛泽东在执行部里担任组织部秘书，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导各区各基层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和区分部。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不仅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反对组织纪律的约束，对重新登记百般刁难。一天，国民党元老谢持怒冲冲地跑来质问毛泽东：“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并拍着桌子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有人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不来登记，就丧失国民党党籍。我们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倚老卖老的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个个乖乖地填了表。由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积极开展活动，帮助建立或改进各地国民党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内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息。1924年3月至6月，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分别向孙中山“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等人联合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所谓对共产党的“弹劾书”，其他地方的右派也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借口共产党人及党团刊物批评了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逆流。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张继、覃振等先后发言，重述所谓“弹劾”意见，公然主张分裂，掀起轰动一时的所谓“弹劾案”。参加会议的瞿秋白当即作长篇发言予以驳斥，他的发言据理以争，得到左派的赞同，而使右派无从辩解。会议终于挫败了右派的分裂阴谋，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继续。

在这次反击右派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战斗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草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中，针对张继等人的“弹劾书”，指示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表示不能隐忍其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破坏联俄联共的罪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这与瞿秋白致信鲍罗廷指出要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几乎出自同一时间，这表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及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配合得十分默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开始四处活动，集结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首推戴季陶。六七月间，戴季陶接连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活动的信号，是为资产阶级右翼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舆论。在戴季陶影响下，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瞿秋白当时在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时刻关注着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动向。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他就敏锐地洞察到它的反动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必须予以反击。为了写驳斥文章，他反复研究戴季陶的言论，收集、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据他的夫人杨之华回忆：“我们当时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秋白就在这个小房间的空地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咬着笔端（他用的每支笔

端都是咬得粉碎的)。这是他考虑写文章时常有的神情。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像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随后，瞿秋白又陆续写成《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是配合很紧密的。1925年10月，毛泽东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戴季陶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的正确性。

戴季陶主义一波未平，西山会议派一波又起。1925年11月至次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覃振、邹鲁、叶楚傖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称西山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资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共产党人及左派通电各级党部，严厉驳斥西山会议派。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创办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在《政治周报》上专门开辟了《反攻》专栏，并用“润”、“子任”等笔名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痛斥新老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谬论。《政治周报》前后共发行14期，每期4万份。它的影响十分广泛，读者颇多，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国共分裂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力反击下，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得以充分揭露，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使猖獗一时的国民党右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自1925年秋至1926年，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瞿秋白是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的主持人，他们互相支持，密切合作，把国共的宣传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十分有战斗力。共同的斗争也加深了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友谊与了解。瞿秋白十分赞赏和钦佩毛泽东的才干，这种钦佩之情是建立在两人所共同具有的马列主义素养和革命胆识基础上的。据瞿秋白的好友羊牧之回忆，瞿秋白曾告诉他：“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组织发动群众，重实干而不多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那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都领教过同毛泽东打交道的滋味，毛泽东既讲原则，又有策略，使右派分子连连败下阵来，连戴季陶都说：“今后少和湖南辣子辩。”瞿秋白不止一次向亲朋好友说过：“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国共合作的大潮急流猛进，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联手站在潮头，成为冲浪的猛士，无畏的弄潮儿。两人也在急流中显出了英雄本色，一步一步被推上了领导岗位。

## 农民运动的开拓者

“红旗卷起农奴戟”，这是毛泽东对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礼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一条已由实践验证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毛泽东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党内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然而，他的成功融会着许多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努力，这其中瞿秋白是最突出的一个。在探索农民问题上，瞿秋白最推崇两个人，一是彭湃，一是毛泽东，他曾赞誉这两位农民运动领袖是“农民运动的王”，这六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泽东、彭湃的功绩，也反映出瞿秋白在农民问题上与他们相一致的观点和立场。

## 农运的实践家与理论探索者

毛泽东与瞿秋白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曾集中全力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尚无足够认识。当时虽有 1921 年 9 月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农民协会及其抗租斗争；有 1922 年 6 月以后彭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的总农会，但并未形成一种风潮，党内对此也未引起十分的注意。毛泽东首先提醒中央关注农民，并从此将农民问题推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这种转变始发于中共三大前后。根据张国焘的回忆，1923 年 6 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的一段发言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也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毛泽东强调，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出身于“士宦之家”的瞿秋白对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及潜在的革命威力虽不及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有设身处地的了解，但由于他是最早看到列宁故乡农民变化的人，对农民的作用亦感触良深。早在 1922 年旅居莫斯科时，瞿秋白就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他在为中共三大起草党纲草案时，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鲜明地写道：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并且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特别指出农村自治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这个思想，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党的第一把手陈独秀就不赞成，他片面地夸大农民的某些弱点，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在审定党纲草案时，他将瞿秋白写的那句旗帜鲜明的话“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修改成“革命也很难成功”，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性和尖锐性。

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共三大第一次涉及农民问题时，毛泽东、瞿秋白当属于共产党人中最先醒悟者，尽管他们醒悟的根基不完全一致，瞿秋白主要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毛泽东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他对农民的切

身了解。但他们都已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投入是断然不能成功的。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全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产生了一个飞跃。在工人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封闭、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直隶等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抗税抗租，减租减税斗争风起云涌，动摇着农村封建地主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瞿秋白以兴奋的心情关注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对农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及时提出了反映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他率先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并清醒认识到三大党纲草案存在的缺陷是没有切实地、勇敢地解决农地问题，他对此作自我批评说，他那时虽然赞成耕地农有，但起草党纲时，“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农民以整体的形象跨入国民革命行列。1926年7月飓风般的誓师北伐，使国民革命释放出巨大热量，唤起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年8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国民党由于忙于北伐，联席会议暂不举行。瞿秋白利用这一时机，在广州与毛泽东、彭湃一起参加了广东省农协执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演讲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及其所具备的革命性，明确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瞿秋白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这一认识，在北伐初起之时，是极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及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瞿秋白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一）实行耕地农有；（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政权归农民；（四）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这篇演讲，集中反映了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乏真知的见，代表着中共早期对农民问题探索的最高水准，毛泽东思想所包容的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大多可以从瞿秋白的有关论述中寻找它的雏形。从理论贡献来说，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无疑起着开拓和奠基的作用。当然，瞿秋白同当时党内许多领导者一样，他的思想理论还处在形成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的某些思想尚不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偏颇和错误，例如《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中有中国民主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导致他后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有“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理论因素。然而，瞿秋白当时年仅26岁，我党尚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也刚刚开始。这诸多因素的制约，使瞿秋白的论述存在各种弱点与缺陷是不足为奇的。瞿秋白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27年2月，他在自选集《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说：“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

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要因此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用革命的实践的，而非想‘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这是何等的襟怀坦白和光明磊落，读罢不能不令人人为他追求真理，不计私利的精神所感动。

在探索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瞿秋白有着很大的不同，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基本是从理论和宣传视角出发而进行的研究，而毛泽东本身就是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农民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的理论来源于斗争实践，他的根基是深深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之中的。

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理主任。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农民问题。上海执行部内复杂的斗争局势和国民党右派的非难和干扰，使毛泽东疲惫不堪，积劳成疾。1924年底，他偕妻带子离沪回湘养病。

1925年2月春节时分，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毛泽东回到农民中间，如鱼得水，他利用农闲时节，抓紧一切机会与农民们一起话家常，讲时事，进行调查研究。与他常在一起叙谈的农民中，有从安源煤矿回乡的共产党员毛福轩，穷郎中毛新枚，小学教员李耿侯与庞叔侃，还有被乡里人称作“硬汉”，敢于同当地恶霸成胥生斗争的农民钟志申。毛泽东很善于启发和教育农民，他说，大家可以扳着指头算一算，天下是穷苦人多，还是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多？穷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穷人多，依我看，推不推得倒土豪劣绅，就看穷人齐心不齐心。毛泽东动员大家组织起来。他的宣传，拨亮了穷苦农民的心，渐渐聚拢了一批农民中的骨干。二三月间，韶山第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诞生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吸取在长沙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军阀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教识字，教珠算，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讲打倒“洋财东”，讲“手”、“脚”两字，就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不停地劳作，却缺衣少吃，而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坐轿子，吃鱼肉，穿绸缎。这样一讲，农民便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经过严格考察，吸收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并创建了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毛泽东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依靠这些组织，领导韶山人民开展了声援五卅惨案、平粵阻禁、争取教育权等一系列斗争。

1925年7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成胥生等人把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与中共韶山支部发动群众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在数百农民的阻止下，使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粵。这是韶山农民一次成功的“阻禁平粵”斗争。

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引起豪绅的恐慌和忌恨，他们串通省长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在开明绅士郭麓宾暗中通报下，毛泽东才得以及时脱身，离开韶山前往广州。

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为毛泽东分析认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在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是他将亲身实践及大量调查研究升华为理论的代表作。他所具备的这种优势是

当时党内许多人无法企及的，因此，这一优势，使他对农民的认识站到了至高点上。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此时却看得很清楚，他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使他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佼佼者，无论党内党外，纷纷推举他出任指导农民运动的职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1926年初，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先后主办了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时，出于授课的需要，毛泽东系统、深入地研究并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强调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都是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从农民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重、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革命力量、革命胜败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详尽透彻地阐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高涨，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已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许多人所公认，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他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他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已是一篇很成熟的、全面阐述农民问题的代表作。这些理论著作，武装了大批农讲所学员，推动了农民运动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迅猛发展。正如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评价所说：“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过程中显示出卓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显示出他所具备的领袖素质。可以说，毛泽东的领袖生涯是以此为起点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农民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途径，主要在于，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他十分重视实践，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在研究农民问题过程中，吸收了当时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等人的精辟见解，吸收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内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

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所处的社会氛围，在探索农民问题方面，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瞿秋白等我党早期的一些杰出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所起的开拓作用。

### “农运王”与坚定支持者

1926年11月，毛泽东离开广州，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受任此命，与革命形势的高涨不无关系，此时正是北伐军锐不可挡之时。10万国民革命军敢于意气风发地指向70万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主要借助了空前高涨的工农革命浪潮。从1926年夏至1927年春，农民运动犹如急风暴雨迅猛发展，迅速席卷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全国已有各级农协五千多个，会员逾千万人，仅湖南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就有五十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达136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600万以上。凡农协建立之处，无不对当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封建势力，动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引起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极大恐慌，“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就立刻跟着大哗”。他们攻击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一些中间派分子也表现出极大的困惑，感到农村发生的事情“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指责也反映到党内，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毛病，对正在勃兴的农民运动画了框框，限制农协“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于陈独秀的主张，党内议论纷纷。那时，毛泽东尚未调到上海，他正忙于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与陈独秀的调子极不合拍。在党内，与陈独秀唱反调者，还有瞿秋白。一次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向瞿秋白谈起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时，认为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大右，瞿秋白听罢当即让夫人杨之华从抽屉中把他的文件夹取出来，从中抽出一份材料递给羊牧之说：“你看看这篇文章。”羊牧之一看，是毛泽东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瞿秋白特意叮嘱道：“要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

1926年12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上，陈独秀进一步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渐向“左”，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恐惧民众运动而日渐向右，“左”右距离发展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

陈独秀的主张，虽然遭到广东区委和湖南区委一些同志的反对，但由于获得鲍罗廷的支持，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使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朗化，而且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虽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他曾特别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然而，这些极有预见性的重要发言并未引起中央的警觉。毛泽东不满意陈独秀的右倾政策，但此时他对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尚无十分透彻的了解，也没有拿到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反驳陈独秀的主张。恰好这时他收到一封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发来的邀请电，电文说：“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为了更好地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决定乘机回湖南作一次实地考察，看一看农村这场革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究竟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在长沙，毛泽东受到工农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发出的通告就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逆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

欢迎大会举行时，会场座无虚席。除了300名正式代表外，许多人自动赶来旁听，把会场拥挤得满满的。当时农民运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都想聆听这位农运专家的见解。毛泽东侃侃而谈，分析并肯定了湖南及全国的农运形势，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大会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通过了建立民主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等决议案。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戴晓云的陪同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他视察农村随身携带三件宝：一是黑皮包，内装文件材料，白天黑夜形影不离；二是白布包，内放换洗衣服，晚上当枕头用；三是一把雨伞，三件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在湘潭银田寺，毛泽东召集30多名农协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毛泽东拿出事先拟好的调查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同大家讨论。当他问到区乡农协组织在乡村中威望怎样时，区农协副委员长郭应棋告诉他，过去土豪劣绅在乡里作威作福，团防局长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如今乖乖地把枪交给了农会，见了农会干部就点头哈腰说，我非常拥护农会。现在农村里的事，只有农会才能说了算，许多农民都叫“农民协会万岁”。毛泽东听了大为赞赏：“好！一切权力归农民，黑脚杆子的农民也被称了万岁，真了不起。”赶来开会的宁乡县高露乡农协干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党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毛泽东不解其意，忙问：“什么叫二民主义？”农协

干部解释说，他们取消平糶米，还将带头要求恢复平糶米的贫苦鞋匠抓了起来，这就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剩了二民主义吗！毛泽东深表赞同地说：“你讲的这个‘二民主义’区党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政策也丢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使我想全国已经出现的反对农运过火的逆流，我们必须坚决打击破坏农运的拦路虎，我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

银田寺座谈后，毛泽东风尘仆仆直奔韶山，他受到数百名农会乡亲敲锣打鼓的欢迎。乡亲们扬眉吐气地告诉他，如今即便是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敢踏上去打滚，看到这样大好的形势，毛泽东十分欣慰，他风趣地对农会干部说：过去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过去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地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倒了台，难道几个月光景，大家的八字变好，坟地贯气了吗？是信神呀还是信农会？一席话，使农会干部更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在衡山白果乡，毛泽东了解到，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打破宗族老例，放脚、剪把把头，成群结队拥入祠堂，与男子一道打土豪。

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一路上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认真听取了党的地方组织、国民党县与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农民及农会干部座谈，访问了开明绅士。毛泽东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甚至处决恶霸；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农会为维护已获得的权益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标队，农会还采取了禁赌、办夜校、修桥补路、义仓积谷等措施。这一切都是过去农村贫苦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农民一组织起来，便生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农民真正的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使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为农民运动的勃兴感到兴奋，为社会上及党内出现的攻击诽谤农运的逆流感到愤慨和忧虑。考察结束后，2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

从2月17日起，毛泽东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撰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两万多字的报告，明确表述了与陈独秀截然相反的意见，文中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肯定其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呼吁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好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3月5日至4月3日出版的第35、36期和第38、39期合刊连载了全文。这篇报告旗帜鲜明地回答了社会上及党内对农民运动产生的怀疑与困惑，为农民运动击掌叫好并指出了其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它受到党内外干部

群众特别是农运骨干的热烈欢迎，但却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冷遇。《向导》周刊原定刊载报告全文，但却只在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面占全部篇幅三分之二的农村变革十四件大事，则未被连载下去。在这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热情支持毛泽东的，正是瞿秋白。

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适应形势的需要由上海迁往武汉，3月中旬，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先期抵达汉口。中宣部设在旧英租界辅义里27号。当时陈独秀、彭述之尚在上海，中宣部的工作暂由瞿秋白负责。当他读了毛泽东的这篇调查报告后，不禁击节叫好，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压制文章发表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毅然决定将这篇报告交给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发行单行本，扩大对它的宣传。瞿秋白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称赞毛泽东对农运的贡献。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中旬，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夫妻一见面，瞿秋白就送给她一本《湖南农民革命》，告诉她：“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寥寥数语，生动、真切地表达了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革命檄文的赞赏之情。毛泽东此时正抱病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忙于主办武昌农讲所，他收到这本小册子并读了瞿秋白热情洋溢的序言，对瞿秋白所做的一切十分感动。

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试金石，对农民运动的共识，使毛泽东与瞿秋白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党内外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局势面前逐步成为正确势力的代表，肩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

##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在中国大地上营造了异常浓烈的革命氛围，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如火如荼的历史画卷。然而，在迅猛的革命大潮中，却涌动着一股逆流，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潜伏着深深的危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味妥协退让，终于使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岌岌可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与组合关头，毛泽东、瞿秋白等一批颇有眼光和奉献精神年轻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挽救危局，不仅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也奠定了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 相继洞察危机

毛泽东是最早觉察蒋介石野心的人。

1926年3月17日，从广州黄埔军校传出一阵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驻广州城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王柏龄部也盛传着这一谣言，王柏龄非但不禁止，反而特意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他的训话，又由士兵传向社会，广州市民一时议论纷纷。

3月18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感到事情十分蹊跷，他问海军局长李之龙，李之龙回答：这是蒋校长的命令。毛泽东又询问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告诉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毛泽东预感到可能要出大事，他皱着眉，忧心忡忡地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沈雁冰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19日深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工友，慌慌张张跑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的住所，告诉他：海军局长李之龙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抓走了。毛泽东说：“现在查有实据了。”他听说街上已戒严，更感到事态的严重，决定立即到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季山嘉住地商量对策。毛泽东赶到季山嘉处时，适逢陈延年在场，从他那里得知，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软禁，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不要共产党员，并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此刻，毛泽东心中已很清楚，蒋介石挑起此番事件是在搞探测、投机。他知道蒋介石本是上海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但多年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与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穿的是连裆裤。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必须强硬，决不能示弱。

为了反击蒋介石，毛泽东向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那里驻防的是叶挺独立团，蒋介石的武力虽然在广州占有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他的这点兵力还不足以问鼎。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的谭延闿，第三军的朱培德，第四军的李济深，第五军的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和蒋介石还有宿怨。

国民党“二大”以后，新的中央执委会又推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了一个管制他们的人，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可以利用矛盾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后，即可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军事首领李宗仁素与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以为我利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介石便无能为力了。

毛泽东的建议，考虑周详，分析透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然而，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表示反对。他们从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 10 倍，即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力，对付独立团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军火，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再三与他们辩论，毫无结果，只好决定请示党中央。毛泽东忧虑地预料，如果中央决定对蒋介石让步，最好的结果是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走，更重要的还不在此，而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共产党人挑衅。

事态的发展不幸被毛泽东所言中。

远在上海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完全持妥协退让态度，他确定的总方针是“中共中央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陈独秀在给广东区委的指示电中，要求中共继续忍让，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主张反击，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他们又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等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其实，蒋介石玩弄的这个阴谋完全是一种试探，他深知立即与中共摊牌还力量不够，即便他直接掌握的第一军中，共产党也有很大的影响，更何况在广州附近还有叶挺独立团，有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 10 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因此，他采取突然袭击方法造成紧张局面后，又假惺惺地检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然而，蒋介石通过这一计谋，获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次试探中也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此着着进逼地加紧了反共活动。192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委的人数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随即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随着蒋介石手中权力的膨胀，他仇视和压迫工农运动的反动面目日益公开化。对于这一趋势，瞿秋白亦十分清醒地看到并指了出来。1926 年 8 月，

他同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从上海赴广州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广州期间，瞿秋白对广东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各派人物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回到上海后，他马上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提出联合左派代替蒋介石的主张。他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为江浙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1927年3月，瞿秋白在武汉主管宣传工作时，对报纸舆论导向强调了三条方针：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对办报的同志说：“蒋介石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这些意见，是多么及时，多么有预见性啊！可是，党内的这些真知灼见，被陈独秀压制了。陈独秀是个素以“家长”自居的人，在他看来，党内能够与他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眼里。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将党内的反蒋主张视为极大危险，幻想以退让求团结。他们的这一右倾错误，终于导致时局的陡然逆转——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四一二”大屠杀的发生，使党内对中央领导的不满情绪急剧上升，瞿秋白曾主动约集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和张国焘谈话，愤怒地指出，武汉同志积极反蒋，广东同志主张土地革命，中央都不赞成，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因而才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重大危机。他还沉痛地对宣传部工作人员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的工人阶级，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瞿秋白是中共中央理论战线上的负责人，他早已感到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歧见越来越深，“四一二”血腥事件，使他难以按捺悲愤的心情，每天夜晚，伏案疾书，在一两周的时间内，写成一篇76000多字的长文，准备将党内许多原则问题的争论，提交给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了。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后，即迁到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开会。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主席台正中墙上悬挂着马恩列斯的像，中国共产党党旗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两边墙上分别挂着群众团体送的锦旗和“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教，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大幅标语，场内排列着长长的条凳和条桌，参加会议的约100多人，其中代表80名。

大会宣布陈独秀做工作报告时，会场一片肃静。代表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些日子，革命形势日益危急，蒋介石已在上海举起屠刀，武汉虽仍处于革命高潮，但聚集在汪精卫周围的将领、政客的反共倾向在迅速滋长，形势不容乐观，大家渴望党中央总结过去的教训，对形势及今后的方针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指导。可是，陈独秀冗长的报告仍贯穿他所坚持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他反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政权。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毫无承担责任、除旧布新的表示，代表们流露出深深的失望情绪。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叶挺询问宣传部的同志：“报告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会场气氛很沉闷。

第二天，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

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标题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阅着，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坐在杨之华旁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翻书，一边笑着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这本小册子就是瞿秋白经过反复酝酿、思考写的那篇长文。文中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书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

“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揭开了系统地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他的主张和观点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在五大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尽管碍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大会通过的决议只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很不彻底，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总书记；尽管党史界一般对中共五大评价不高，认为这次大会未能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的错误，从而未能挽救局势的恶化。但是应当看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冲破了共产国际神圣化和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较之党成立以来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为彻底结束陈独秀右倾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 临危受命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形势迅速逆转。5月13日，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公然叛乱。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突然袭击省工会、农会，释放在押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

武汉三镇危机四伏。

此时的瞿秋白，由于日夜操劳，身体极坏，经常发烧、咳嗽、吐血，但他依旧坚持起草中央文件，处理日常工作。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又在酝酿制造新的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以为用这种一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国民党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中共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作出种种让步表示，决定共产党的部长离开国民政府，将工农群众组织置于国民政府监督之下等等。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这自然如作茧自缚，只能助长反革命势力的有恃无恐。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越来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然而，这一组织上的应急措施已无法扭回革命的逆转之势了。瞿秋白凭政治家的敏感已看到武汉潜在的

杀机，他叮嘱宣传部同志：“我们极可能被逼上梁山，同志们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纪，一切听从党的决定。”7月的一天傍晚，他与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去登黄鹤楼。他们乘一只划子过江，瞿秋白望着涌动的江流心潮难平，他问羊牧之：“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我们当前的心境？”不等对方答话，他沉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多少同志在牺牲啊……”登上黄鹤楼，面对烟水苍茫的武汉三镇和白浪滚滚的江水，瞿秋白十分感慨地说：“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雅士、英雄豪杰都似江流一去不复返。安知几十年后，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但是去要去得有价值。”

从黄鹤楼归来没几天，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终于打出“分共”的旗帜，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大屠杀、大逮捕。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所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了。

这种风云突变的形势来得如此之快，使许多在大革命期间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就连党中央的领导层也发生了思想混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回忆：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此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已不再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在决策层中，蔡和森因旧病复发而住进了医院，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于7月中下旬先后赴南昌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后又随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地区。李维汉、张太雷都是刚刚从湖南、湖北省委负责人的岗位上步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无论是领导资历、理论水平，还是党内的威望，都不及瞿秋白。李维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瞿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抵制。……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接替陈独秀，并非为瞿秋白所愿，他曾详细地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态：“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然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

这里，瞿秋白流露出明显的不情愿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是对他与陈独秀过去的师生般的关系的一种顾虑，而不是出自自身安危的考虑。当时，面对险象环生的恶劣形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在国民党残酷屠杀与党内思想组织混乱的双重压力下，瞿秋白是冒着杀身之祸临危受命的。他虽然有上述的顾虑，但没有推辞，没有退缩，而是毅然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隐蔽在武昌。他是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的“要犯”之一，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但毛泽东要求回到自己十分熟悉，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策划秋收起义。8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装扮成商人，从武昌搭船过江，来到湖南会馆等待接头。8月5日，中央地下交通员来到湖南会馆，与毛泽东接上关系，把他带进汉口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今鄱阳街139号）。

“怡和新房”是座西式公寓，位于旧俄租界，三层楼，十分庄重雅致。会场设在二楼原武汉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洛蜀莫夫家里。洛蜀莫夫已回国，家中只有他夫人洛蜀莫娃，会场由前后相通的两间正房组成。

毛泽东走进会场，正在内外忙碌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告诉他，会议原定7月28日举行，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交通受阻，外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省代表都无法按期赴会，会期已推迟到8月7日。邓小平还告诉他，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彻底清算党在过去的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当局注意，代表们进入“怡和新房”后不能随便外出，开会、吃饭、睡觉都在会场内。

在毛泽东前后到达会场的代表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罗亦农，任弼时、蔡和森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20人。

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了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强调：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正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毛泽东在会上率先发言，他从前座第二排站起，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首先是国民党问题。毛泽东说，国民党问题实质是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中共对此一直存在模糊认识，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开始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个大错误。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辛辣的讽刺，使闷热难耐的会场犹如吹入一股清风，大家顿时活跃起来。

其次是农民问题。毛泽东讲到陈独秀压制农民革命，对群众运动的种种责难，讲到他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递交中央后所遭到的冷遇。毛泽东几近愤怒地说道：“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军事问题是毛泽东发言的重点。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早已预见到没有武装的恶果。在7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他更加明确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善后的建议，他认为农民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以保存力量，“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当时陈独秀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把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到夺取政权高度的精辟论断，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最后，毛泽东谈到组织决策问题，提出党的上级机关要集思广益，尽心听取下级的意见。他的发言，不仅切中要

害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颇具独到见解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抓到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会议从上午到晚上整整开了一天。代表们散坐在会场内，时值武汉盛夏，骄阳似火。为了保密，门窗不能打开，整个会场像一个火炉。代表们不能走出会场，伙食是白开水就干馒头。尽管如此，代表们的情绪已一扫前些时的彷徨、沉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推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关，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聚了受到重创的队伍，扭转了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没有正确估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一些地区的盲动主义错误。

八七会议结束后，8月9日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这样，毛泽东与瞿秋白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瞿秋白很器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毛泽东，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但是毛泽东婉言谢绝了瞿秋白，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只好尊重毛泽东的意愿，同意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不久，毛泽东便秘密离开武汉，开始了创立革命武装的伟大实践。

## 毛泽东开创性的选择

8月中旬，毛泽东日夜兼程赶回长沙。自从投身革命后，毛泽东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过去他连想都没想过要去打仗，现在革命需要他去开辟新的道路，毛泽东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

马日事变后，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尽管环境恶劣，毛泽东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依旧未放弃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他利用安置杨开慧母子回板仓老家的机会，在杨开慧家里邀请农民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要求，了解国民党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实地调查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八七会议确定的秋收起义方针，有些地方是与客观实际不相符的。比如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而毛泽东已看到“国民党左派”在群众中已丧失号召力，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子，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湖南省委会议，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根据从群众中获得的新

认识，对组织秋收暴动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一，秋收暴动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打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第二，发动秋收暴动不能单凭工农力量，要借助军事的帮助。毛泽东一再强调“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不是依照八七会议规定仅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同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采取妥善的安置办法。

第四，暴动区域要缩小范围，集中使用力量。八七会议确定的暴动方针是在湖南全省四个区域内同时暴动，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西南以宝庆为中心。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全面铺开，分散使用力量的做法，力主集中力量于一个地区。他还指出，暴动首先不应该在长沙，而应该在农村，因为长沙的敌人力量强，如果首先在长沙，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因此，应首先在反动统治较薄弱、经过大革命洗礼，群众基础好，且保存有革命武装的农村发动。

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绝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区组织武装暴动。

党的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多不曾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决策问题上，不是盲从，不是照搬苏联现有的经验，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与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不同的意见，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求实精神和远见卓识。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然而，共产国际的权威意见是不容冒犯的。临时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后，一一驳回了他们的主张，有人还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与中央不一致，批评湖南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也不赞成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和没收大中小地主土地。

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湖南实际情况的，要使中央马上采纳毛泽东来自实践的意见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组织暴动又迫在眉睫，不尊重实际必定会毁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显示出一位政治领袖所具有的果断和魄力，一方面再次向中央写信，据理陈词；另一方面毅然改变了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等县的湘中暴动。

1927年8月下旬，湖南省委常委会最后审定“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计划，决定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前往湘赣边界领导武装暴动。出征前，毛泽东把这消息告诉了杨开慧。杨开慧十分担心地说：“你不能干点别的工作，非玩枪杆子不行？”毛泽东耐心地向她解释，杨开慧说，“这些道理我赞成，可打仗你不是行家里手啊！”毛泽东说：“行家不敢说，也并非一点不懂，我毕竟当过半年兵，缴过军阀败兵的枪，动枪动刀多少懂得一点。”杨开慧知道毛泽东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便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毛泽东送杨开慧离开长沙回板仓老家。毛泽东叮嘱妻子照顾好自己的老母和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要毛泽东学

会自己照顾自己，并将身上仅有的 10 多元钱塞给毛泽东。这次分手，不想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9 月 9 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爆发了。

9 月 11 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阻击，群众缺乏作战经验，加上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从背后袭击，使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工农革命军已由起义时的 5000 人锐减至 1500 人。9 月 14 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这是一次决定起义军生死命运的重要会议。会上就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部分人，力主“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主张。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为当时农民起义并未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设防坚固的长沙，应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是对共产国际乃至临时中央战略部署的否定，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决定部队退往湘南。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长沙不可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的决议，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立即爆发长沙暴动。只是这一决议传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使其变成了一纸空文。

工农革命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当时，革命军中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部队弹药缺乏，给养不足，指战员伤病残很多，在江西萍乡芦溪又遭敌伏击，23 岁的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此时，起义军只有千余人，部队情绪十分低落，开小差离队者屡见不鲜。

9 月 29 日，部队抵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毛泽东决定将保留下来的队伍重新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同时建立连以上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的这一变革，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使濒于溃散的队伍重新凝聚起来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在率军南下途中，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选定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脚点，决定争取该地区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0 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终于到达井冈山麓的茅坪。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及时、果断地避免盲动，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这一开拓性的创造，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

## 瞿秋白犯“左”倾盲动的错误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他注重实践，善于调查研究，在坚持实事求是上无所畏惧，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因此，他的洞察力和独立见解总是先人一步。对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是非常看重的，他也十分注意吸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彻底摈弃了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这一决定的做出，不能不视作是对毛泽东意见的认同。对毛泽东执掌全局工作的能力，瞿秋白一直予以十分的肯定。192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管辖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安徽、陕西七省工作。9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人选问题时，瞿秋白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有人提出毛泽东已率起义部队上山，实际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对他领导长江局持异议。瞿秋白仍坚持道：“泽东不能来，任旭（任弼时）加入也可以”，“或者，任旭加入，泽东还是加入”。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

1927年10月初，瞿秋白乘江轮离开武汉，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当时，瞿秋白年仅28岁，而他所面临的，是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纷扰复杂的政治斗争。作为理论家、宣传家，瞿秋白才智横溢，胜任有余，但作为政治领袖，他则十分缺乏实践经验，在决策一系列从未处理过的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主张不能不左右他的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约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卓越的革命家都先后慷慨就义。中共党员从5万多人减至1万人左右。党内蕴藏着的一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在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迅速爆发出来，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由复仇心理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满而逐渐滋长生成的革命急性病，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瞿秋白终于无法驾驭这种局势，犯了“左”倾盲动错误。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挺、贺龙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继续斗争的策略。会议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在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仍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方针是进行全国总暴动。这就大大助长了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使“左”倾盲动的指导思想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11月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实施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先后部署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计划；

部署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等，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如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在这种“左”倾情绪下，湖南省委一些人甚至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给党内带来的兴奋也是那么短暂。12月11日，当缀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在广州市公安局楼顶高高飘扬，成千上万市民走上街头欢庆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之时，起义军领导人叶挺、叶剑英等人就已看到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力主将六千余人的队伍撤出广州，转移到农村去，但却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纽曼的反对。结果两天后，起义军在同张发奎部的激烈巷战中失败，仅一千多人撤出了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壮烈牺牲。张太雷之死，使瞿秋白受到很大刺激。张太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他们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由于志同道合而交往颇深。张太雷是在汽车里被敌人子弹射中胸膛而死的，如果早一天撤离广州，那将是另外一种革命的局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醒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应该看到，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一直没有停止对挽救革命、再创革命高潮的探索和努力，他渴望挽回大革命的那种情景，他的努力尝试虽因矫枉过正的蛮干而未能成功，可又怎能全盘否定探索出路的全部意义呢！毛泽东在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方面的开拓性伟大功绩已永载史册，不会有人再持异议；而同样为之努力，在走了弯路之后，回到这个理论起点上的瞿秋白也不应一笔抹煞。瞿秋白是失败者，但他在失败中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按照既定方针在全国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工农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不断给党中央以新的启迪。1927年10月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政权。同年11月，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工作策略时，也提到“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赣东北与赣东联络一块亦形成一个割据局面”。12月，湖北省委和鄂东特委也提出“使革命势力很快的发展，造成割据局面”。地方党组织开辟农村割据局面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很快引起瞿秋白的注意，并对这些经验和认识予以理论的总结和提。1927年12月，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使豪绅买办地主阶级没有组成全国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中国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首先，在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实际生活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其次，要使工农游击武装长期生存下去和发展起来，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第三，游击战争必须进入革命地域之建立，全党都要明显地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这就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结合了起来。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瞿秋白称之为“农民割据”。他在引导党将工作重点转到实行武装割据方面来作了许多努力。1927年12月，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指示朱德

部与驻扎在茶陵、酃县的毛泽东部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并强调“暴动的局面，须看当地的环境，如便利在乡村发动，便应在乡村中力求深入和扩大，而不亟于攻城；如确有把握而影响又大，群众或更因此而扩大，则攻城也所必需。”这种立足于创造农村割据局面，攻城应看是否有把握而为之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这毕竟是大革命失败后寻求中国革命最佳方式的有益探索。毛泽东、瞿秋白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最初都是受城市中心论思想支配的。他们的区别在于，毛泽东较早地意识到盲动的危害，自觉地抵制了它，而瞿秋白是看到它的严重后果后才予以自觉纠正的。

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左”倾盲动错误，是以瞿秋白的名字认定的，但是，对于中共党史上出现的这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错误指导，是形成这次盲动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1927年7月，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来到中国。这位29岁的俄国人，尽管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却拥有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在决策中共中央的工作上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观点主要来自他的报告，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也是出自罗明纳兹的手笔，他在起草决议案中提出许多“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革命性质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不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从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后，还需经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到历次挫折，但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地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关于中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说来处于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现时总策略”上，罗明纳兹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总方针：“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由此可见，这个总策略的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城市加农村暴动的汇合。罗明纳兹并不认识在中国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而是强行按照俄国模式搞城市中心论。

罗明纳兹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仅提出“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 and 策略，而且还提出了为政治上“左”倾盲动主义服务的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他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特意提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参加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李维汉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在党内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什么‘政治纪律’，当罗明纳兹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周恩来也说：“11月

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罗明纳兹给以惩办的，首当其冲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没有盲目攻打长沙，而是带部队奔向了井冈山。罗明纳兹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却指责秋收起义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特别指责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因此，11月扩大会议不但给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而且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会上也给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对于毛泽东的处分决定曾被湖南特委代表周鲁上井冈山误传为“开除党籍”，使得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革命意志坚如磐石，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一直到次年3月，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才传到井冈山地区，毛泽东虽然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然是中央委员，而此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已基本被纠正了。

对于瞿秋白在“左”倾盲动错误中的责任，李维汉有过公允的评价，他说：“像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28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中央临时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著书立说，文思泉涌，在中共群体中没有几人能超过他。但作为政治家，则大嫌不足，他缺乏临危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尤其缺乏深入民众，植根于民众的实际锻炼，他的书卷气，在他那充满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未能克服掉，这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大不同之处。

## 同处逆境的岁月

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第44号通告发出后，匆忙化装来到码头登轮启程。中央第44号通告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正式以中央名义纠正“左”倾盲动政策的文件。它的下发，标志着这次为时四个月的盲动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瞿秋白乘船至大连后，又赶乘南满铁路火车秘密抵达莫斯科。他此行目的，是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与周恩来等到苏联筹备中共六大事宜的。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其中一重要决策，即6月4日中央发出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指出红四军应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以朱德为书记组成红四军军委。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红军及根据地，起了重大指导性作用。

中共六大是6月18日至7月10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的。这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地主庄园，名“银色别墅”，这里林木繁茂，河流萦绕，一派田园风光。从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来到这样恬静安适的环境里，本该彻底松弛一下，但瞿秋白难得有闲暇时间。他拖着病弱身躯，承担了大会的主要领导工作。他在一个月内起草了六大的政治决议案，向大会提交了7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并作了《政治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瞿秋白对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运动进行了认真反省、思索和研究，他在政治报告中对盲动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和认真的自我批评，痛感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了损害。他说，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他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又说，吾党缺少理论，革命的党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和瞿秋白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瞿秋白由于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当选的票数较少，虽然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却未能进入常委会。

中共六大闭幕后，共产国际吸取以往的教训，决定不再选派代表去中国，而是通过在莫斯科设置常驻中共代表团来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从1928年7月至1930年8月，瞿秋白留在苏联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这期间，令瞿秋白始料不及的是，来自党内的一股宗派活动的阴风向他袭来，对他开始了一连串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而且，这种置人于死地的迫害整整紧随了他8年，也使毛泽东等一大批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中共党人身陷逆境。炮制这种阴谋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制定者王明。

## 与王明的初次交锋

党的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派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参加

会议筹备工作。米夫带来的翻译人员中，有一个 24 岁的安徽籍青年，操一口流畅的俄语，巧于辞令，讲起马克思列宁的经典，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此人便是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对于王明，瞿秋白不是初次相识。1927 年春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赶上米夫率领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被邀请列席会议，王明当时作为米夫的翻译也列席了五大。那时，米夫曾向陈独秀极力推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把这个陌生的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又不便拒绝，便让王明在中宣部当了一个多月的秘书兼编辑。7 月初王明又随米夫返回苏联。由于接触时间短，瞿秋白对王明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王明却很注意观察了中共的领导人，常将自己与他们相比。六大前夕，斯大林会见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王明担任翻译。谈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时，李立三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朵浪花。意思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将浪花视为高潮。在王明看来，党中央领导人连这些道理都不懂，真是可笑，由此更加自命不凡。米夫也散布对中国党的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语，吹嘘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王明对米夫的苦心心领神会，积极配合，在各种场合卖弄自己的“理论水平”。当时，王明在理论上从四个方面同瞿秋白展开争论：第一，在农民问题上，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是联合中农、贫农反对地主和富农？第二，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在中国是两个营垒还是三个营垒？是联合中间势力还是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第三，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是取消还是坚持赤色工会？第四，在关于党内倾向的问题上，主要危险是“左”倾还是右倾？瞿秋白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王明的观点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但是，米夫支持他。王明洋洋大篇地发言，不仅未获取人心，没想到适得其反，许多代表对王明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不以为然，甚至厌恶反感，王明终究未能挤入中央委员会。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专为培养中国革命青年而设立的。王明自 1925 年入学后，紧紧追随米夫，极受米夫赞赏。但是由于他没有实践斗争经验，在同学中的威望远不及参加革命多年的江浙籍学

生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王明是个心胸狭窄、气量很小的人，他不甘心居人之下，为了整垮对方，不择手段地炮制了“江浙同乡会”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江苏、浙江籍同学中，孙冶方因为做翻译工作，每月可收入近百卢布，手头比较宽裕。每逢周末、假期，江浙同学便到他的宿舍来“揩油”，买菜做饭热闹一番。一天，中山大学学生会主任王长熙从孙冶方宿舍窗外经过，听到屋内说话都是江浙方言，便向王明把持的支部局汇报说：“他们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学习，因祖籍浙江奉化，与江浙同学也十分熟悉，常常凑份子请大家吃饭。1927 年秋蒋经国从中山大学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一天中大江浙籍留学生又开玩笑地通知蒋经国掏钱会餐，蒋回信说：“我现在的会费还没有着落，等有了再寄来。”这封信落到别人手里，大家分析“会费”是什么，信既然是写给江浙留学生的，可见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

这两件事被王明汇报到米夫那里，他们马上抓住大作文章，扬言抓反革命分子，请苏联政治保卫局人员调查，尽管没有发现什么证据，王明仍坚持

俞秀松等有小组织活动。不仅如此，他还把反对他的李剑如（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骨干）、余笃三（武汉工运积极分子）等工人学员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斗争。六大闭幕后，王明别有用心地向米夫建议请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企图借助这位新当选的总书记，给“中大风潮”定性，向同学施加压力。向忠发是武汉的码头工人，曾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是个敢说敢干但头脑简单的人。他是在共产国际再三强调加强干部工人成分的情况下当上总书记的。向忠发接受邀请后偏听偏信，不作调查，仅根据王明提供的材料，就在讲演中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并扬言要枪毙一批人，事后，便有4名学生被捕，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此事在学生中闹得沸沸扬扬，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学习已无法正常进行。

许多学生出于义愤，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自然十分关心这一严重事件，他派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去中大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王明、米夫等居然不许他们过问中大事情。中共代表团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到政治保卫局去查阅材料，也遭拒绝。无奈，瞿秋白只好亲自出马调查，他不仅找被指控为“江浙同乡会”的人谈话，而且要王明等对揭发材料提出证据，以证实指控的真实性。王明哪里拿得出有力的证据呢！瞿秋白经过深入细致的查证，于1928年8月5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就中山大学对“江浙同乡会”及“工人反对派”的错误处理提出与王明、米夫截然不同的看法。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联合审查委员会的审理，终于作出公正结论，并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中大的工农学生还是好同志，王明等打击陷害别人的目的未能达到。

与此同时，瞿秋白与米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瞿秋白虽然知道米夫是斯大林宠信的所谓“中国通”，但他从不趋炎附势，常常批评米夫不了解中国国情。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征求瞿秋白对米夫的意见时，瞿秋白曾直言不讳地主张撤换米夫，让熟悉中国的鲍罗廷接替。此事被圆滑的张国焘透露给了米夫，米夫十分恼怒，进一步加深了对瞿秋白的忌恨。1929年6月，东方部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坚决反对，两人再次发生激烈论战，相持不下。后来在张国焘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的提法。有关富农的争辩虽结束了，但影响很大，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瞿秋白变成了王明、米夫的“眼中钉”。王明也意识到瞿秋白有理论知识，有工作经验，有群众威信，是他夺取党内主要领导权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他们在1929年夏秋，借苏联开展清党运动之机，集中发起了对瞿秋白和中国代表团的攻击与迫害。

在清党之初，王明小宗派有计划、有准备地多方收集瞿秋白等人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逐字逐句翻阅，从中找出可攻击之处，还四处收集他们“幕后活动材料”。准备一番后，便在大会上公开攻击瞿秋白既犯“左”倾错误又犯右倾错误，米夫特邀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联共区委等部门代表参加会议，为发言人鼓掌助威，以示支持，使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处于很不利的境地。这还不算，王明还使用造谣、谩骂等卑劣手段来中伤瞿秋白。当时中山大学墙报把持在王明小宗派手中，几乎每期都有丑化、批判秋白的文章。瞿秋白喜欢吸烟，他们在墙报上将秋白画成吸烟的猴子，而反对王明这种做法的文

章从不采用。杨之华曾对这种人身攻击忍无可忍，愤然将墙报撕了下来，由此，她也受到攻击和批判，并被下放工厂去劳动。

这种宗派活动从夏天持续到秋天，逐步升级，更沉重的打击降临到瞿秋白头上。1929年10月，瞿秋白的三弟、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突然“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谁也说不清楚。景白比秋白小6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上海、汉口做过党、团工作，是个热情活跃，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的失踪，使秋白在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他对朋友说：“景白肯定被捕了，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然而王明却诬说瞿景白是“疯子”，跳进莫斯科河自杀了。

1930年春，中山大学清党结束时，米夫将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余飞召到办公室，他摆出一副得胜者的骄傲神态，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派别活动。由于张国焘在这场斗争中见风使舵，投向了米夫、王明一边，共产国际表示将他区别对待。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1930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但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已没有任何协商和挽回的余地了。其实所谓“商定”，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

这场与王明、米夫的初次交锋，以瞿秋白被解职而告结束。瞿秋白的莫斯科遭遇，绝不是人际关系上的恩恩怨怨，而是以共产国际粗暴干涉中国党的事务为背景的。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的目的，旨在排斥日愈不听指挥的中国党现任领导人，以进一步控制中国党，把中国革命纳入苏联的棋盘。对于这一点，陆定一生前曾作过深刻评价，不妨照录如下：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中国党同大国主义的“老子党”进行较量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斗争并没有因瞿秋白回国而结束，“老子党”代言人米夫、王明集团仍在寻机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 王明宗派主义的明枪暗箭

在党的六大上，米夫曾绞尽脑汁想把王明举荐到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上，但毕竟未能如愿。为了达到控制中共的目的，他又采取了新的步骤。1928年底，米夫让自己一手提携起来的总书记向忠发回国执掌全局。1929年3月，他又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派王明回国，目的是通过王明改造中国党，以逐步接班。但是，令米夫失望的是，向忠发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尽管他以“中国工人阶级代表”自诩，但一接触实际工作，其领导水平之低便暴露

无遗，只会附和他人，没有领导能力，其结果是让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牵着鼻子走。同时王明的回国，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特殊安置，而是按照惯例派他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基层宣传工作。1930年1月，王明在出席工联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巡捕逮捕。他为求早日获释，以14元大洋的酬劳费贿赂巡捕，让其送信给党的秘密机关请求营救。严重违反了党纪。所幸中央机关迅速转移，未造成损失。为此，王明获释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之后，李立三与王明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上发生争论，王明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上批驳李立三，李一怒之下，以反中央路线为名给王明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王明在苏联时，依仗米夫权势，已习惯凌驾于别人头上，岂料回国后接连碰壁，这口气自然无法吞咽。他曾对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罗章龙发牢骚：“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无奈中共中央不允许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去施展他的“改造”之志。就在王明怀才不遇，急于出人头地时，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三方投入兵力达100万人，后方顿时空虚起来。此时中国红军的力量正在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这种有利于革命的时机令李立三头脑发热起来，忘乎所以地认为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提出，立即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并下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三军团进攻武汉，红七、八军攻占广州，红十军进攻九江……当李立三将他的计划报告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形势的盲目乐观分析，7月下旬召开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要李立三停止暴动计划，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7月决议的调子是比较温和的，没有点名，更没有说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而是采取针对错误正面阐述的方法，这成为秋白、恩来回国纠正立三错误的指导原则。谁知，就在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启程后，共产国际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于红三军团一度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欣喜若狂，发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他已听不进党内任何反对意见，更不顾共产国际的三番五次阻止，坚持成立了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并口出“狂言”：“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这种拒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做法，是国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李立三的错误很快被升级为“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路线”，是“进行反国际斗争”，必须“给这种反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这种致命回击后来竟被米夫迁怒到了瞿秋白头上。这一切，是旅途中的瞿秋白、周恩来毫无所知的。他们回国后，仍是按照共产国际7月决议精神，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错误。在周恩来、瞿秋白耐心帮助下，李立三承认错误并做了自我批评。全会尽管未能在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但总的说，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得以纠正，城市暴动计划被取消，主要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这一重大举措，直到遵义会议与王明错误路线决一胜负的紧要关头，才能深刻领会毛泽东当初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深远意义。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功不可没。

可是，10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7月决议原则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是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更有甚者，当中共中央还没有收到这封信，对国际的尖锐批评还蒙在鼓里时，米夫就将这一信息抢先传递给了王明。这信息对王明来说无疑如获至宝。他立即打出“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一周内与博古先后两次联名写信给中央，指责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与国际路线不能兼容，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并撤销对他的处分。瞿秋白在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10月来信，他这才明白，王明写信是有来头的。他对共产国际出尔反尔、推卸责任的做法感到震惊，但认识到中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它的权威性是不容怀疑的。因此，瞿秋白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来信”，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没有充分揭露李立三“左”倾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在讨论王明等人的信时，瞿秋白明确批评他们在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以后，不向政治局报告，却以突然袭击方式向中央提出立三路线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周恩来也针对王明一伙的活动提出警告：“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但王明对此置之不理，丝毫未收敛自己的宗派活动。他按十月来信的精神赶写出《两条路线》小册子，并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小册子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实际目的是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王明写道：“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即秋白）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夺权之心溢于言表。

此时，党内一些曾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过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要求改组中央，这其中，有一直坚持正确主张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也有出于小组织利益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再加上王明的宗派活动，使反中央的风潮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关键的时刻，共产国际关于撤换瞿秋白，扶王明上台的打算已成定局了。

三中全会后，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去反省错误。1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讨论立三路线时，一致把主要矛头对准了瞿秋白。主席团7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道姓地指责瞿秋白，批判他“以两面派态度对待国际”，“无原则领导了三中全会”，库西宁甚至把早已作过结论的“中山大学风潮”又翻出来，指责瞿秋白在莫斯科就搞“小团体”，回国后继续搞。有人更为露骨地谴责瞿秋白妨碍了为“国际路线斗争”的同志加入领导机关，这个同志为何许人呢？会上有这样两段发言：

苦秋莫夫介绍了一封“被开除的人自己写的”信，他说：

“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立三同志今天也提起曾经把一些同志留党察看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为着什么而把他们留党察看。他们的被开除是为着他们不同意三中全会的虚伪——三中全会说中央和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这是被开除的人自己写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三个月到六个月。”

皮同志发言说：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

事情显而易见，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最终目的是使那些莫斯科一手培养起来的王明等人担任领导工作。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实际就是采取了换班夺权的重大步骤。到了1930年12月，王明距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位置还有一步之遥，就差一种组织程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米夫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了。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解决王明的上台问题。米夫十分清楚，把瞿秋白赶下台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可以办到的，但要把王明扶上台，还有个全党是否服气的问题。王明在中国从未做过实际工作，他在党内的形象又不好，要是提名让他直接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参加表决者举手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给他搭台唱戏，米夫煞费苦心。12月16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处分的决议。12月25日，他要求中央立即给王明安排领导职务，并提议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政治局没有完全接受，先是决定由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省委书记，归国前由王明代理；后在米夫进一步施加压力下，才不得不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至此，由于米夫的介入，中共中央事实上已被迫陷于瘫痪，处于无法工作下去的境地。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前米夫拟定了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地方代表外，要吸收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而且凡参加者皆有表决权，这就给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地方代表的王明开了特殊通行证。

四中全会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有的代表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更有甚者，候补中委、满洲省委常委唐宏经因与王明意见不合，到了上海竟无人通知他去参加会。会议吵吵闹闹从早上7点直开到晚上10点。在批判立三路线和中全会的错误时，由于李立三远在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受攻击的主要目标。会议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指责“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立场，造成纯粹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的可能，以及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的。”瞿秋白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会上，在米夫的圈定下，原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落选。王明却通过合法表决形式，不仅成了中央委员，而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成了政治局委员。自此，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

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某些人粗暴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是招致中共党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场大悲剧，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打击后，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辩解呢？”他回答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枝节的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瞿秋白对王明深知其人，这样的人上台，党会遭受何等损失，瞿秋白早已敏感地预见到了，但他没有回天之力。王明背后站着米夫，那个靠山是共产国际，谁也反不掉的。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都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是在共产国际培养和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他心目中，共产国际是神圣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许多中共党员对共产国际有不满情绪，认为国际应当承认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有错误。瞿秋白当时虽带书生气却顾全大局地为其辩护说：“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个责任。”当他虔诚地为维护共产国际不惜违心地忍辱负重时，不料共产国际一些人为了换上他们信任的王明，竟不惜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从崇高的位置上狠狠打下来。这种手法，对瞿秋白的打击以及所产生的震撼、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多余的话》中很坦白地表露了当时的心态：“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了。”这里流露的情绪，仅仅看成是消极的是不全面的，瞿秋白在王明、米夫大权在握的情况下欲辩不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以此态度来进行抵制。要求他在这种境遇下继续抗争、反击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瞿秋白并未就此消沉，他冷静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本来就没有将领导权与个人得失联在一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后，他依靠自己在文化领域的才华另辟革命事业，在文化战线上为党做出了不朽的成绩。

### 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第一人

1930年初，在寒风凛冽的莫斯科，流传着来自中国的一条消息：“毛泽东因患肺结核病逝世”。这一消息震惊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农村红色政权的创建过程中，尽管共产国际所持的理论与毛泽东的实践完全不合拍，但毛泽东在农村站稳了脚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因此，共产国际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行踪，对他十分重视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期望。共产国际总部专门在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上为此发表了一则评价很高的讣告：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篇讣告一千多字，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这是谁写的呢？有的人推测这是瞿秋白的手笔。因为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瞿秋白对毛泽东最熟知，且有关中国问题的重要文章大多由他动笔。但这毕竟只能是一种推测，由于这条消息是误传，几十年来没有人再提出它来作文章，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篇“讣告”肯定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之手，“讣告”中对毛泽东所作的评价完全代表了瞿秋白的观点。

毛泽东确实大病过一场，但大难未死。

1929年盛夏的7月，毛泽东染上了恶性疟疾，一天发作数次，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闽西山区缺医少药，毛泽东几度病重。幸亏闽西特委派出地下交通员历尽艰险去上海买来特效药奎宁丸，又在永定请了当地名医吴修山精心调养，才把毛泽东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自从1927年秋毛泽东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后，他一直在条件极其艰难的崇山峻岭中苦心经营着中国的第一块红色区域。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以及湘南起义的农军抵达宁冈砦市，与毛泽东部胜利会合。两支具有北伐战争光荣传统的武装力量聚集到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朱德是两位十分务实的军事家，他们立足敌强我弱的实际，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原则，凭借机动灵活的作战经验，在短短时间内，朱毛红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先后击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使割据地区迅速扩大。1928年7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以及遂川以北，酃县东南等地，总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时期。

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井冈山的军事发展余地已日渐狭小，军需供给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更为了粉碎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乘国民党“会剿”的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向广阔的赣南、闽西进军。隆冬腊月，天寒地冻，红军第一次远离根据地与强大的追兵周旋，沿途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红军衣单粮缺不说，连报信的也没有，深感孤立无援之苦。毛泽东、朱德及时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果断结束了单纯流动作战方式，采取走一处，开辟一处，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依托根据地，波浪式发展割据局面的战略方针。红四军充分利用蒋桂军阀交战，闽西、赣南空虚之机，避实击虚，灵活作战，3月占领长汀，4月进驻瑞金，5至6月，赣南的于都、兴国、宁都及闽西的永定、龙岩等地相继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并为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在红色割据区域内，毛泽东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尝试。井冈山地区《土地法》和江西兴国县《土地法》都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红色区域内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拥护中国共产党，踊跃参加红军，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摸索这条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毅力，在实践中苦苦探索，他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推

向农村，继而通过向赣南、闽西进军，萌发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思路。1930年1月，毛泽东将这一思路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与共产国际要把政权建在大城市完全不同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日后看到的经典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一直十分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除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和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校讲课外，余下的时间都用于翻阅国内报刊，并作出详细摘记。他尤其关心和重视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问题，反复强调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努力扩大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并多次谈到和称赞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

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瞿秋白处处留意这支部队的发展，红四军在井冈山反“进剿”的胜利，瞿秋白注意到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的进军，瞿秋白也注意到了。1929年7月，他在翻阅上海《申报》时，看到报上记载着朱毛红军占领了长汀、东固、龙岩、永定等县份的消息，十分兴奋，随后在撰写《军阀混战和汪精卫》一文时，特别赞扬了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发展，“朱、毛的游击队等，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定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间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边境又有一次的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些县份。”预见到朱、毛红军的发展和必将胜利。

1930年1月，瞿秋白热情洋溢地在《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一文，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他讲述了农民暴动胜利的地方，农民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扩大工农红军的情景，并逐一介绍了国内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九个工农苏维埃区域，指出这些区域的武装斗争，对中国反动派是极大的打击，对中国革命是极大的推动，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以至于反动派到处叫嚷：“现在的世界真是反了，一切都是‘反常’的了——这都是因为‘共匪作案’。”但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工人农民则高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

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瞿秋白就写了“毛泽东红军万岁”的口号，他是第一个把朱毛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这充分显示了他对毛泽东主张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的赞同，毛泽东走的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与共产国际固守的城市中心论背道而驰，瞿秋白多次撰文宣传毛泽东的实践，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地位，这都深刻反映了瞿秋白不是固守教条的人，他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读得很多，却并不奉若神明，他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学会以实际的眼光去认定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决策，他的书生气在一点一点地洗刷之中，如果不是王明宗派集团的残酷打击、迫害，使他过早地离开了领导岗位，瞿秋白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成熟的、具有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实际领导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在逆境中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将瞿秋白由政治上的巅峰推入谷底。但是王明并未就此罢休。1月27日、28日，王明逼迫瞿秋白两次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

—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再次诬陷秋白是以派别行动影响李立三对王明压迫，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等。他们还将瞿秋白的声明书和政治局的这一决议案全文刊登在《党的建设》上，以造成瞿秋白下台、王明上台的既成事实。这些举措正如王明在2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表白的：“阿秋现在在理论上不能领导人。必须有一个能领导阿秋的理论人。”王明之心，昭然若揭。对于瞿秋白的工作安排，在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议派他去加强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王明断然反对说：“阿秋是两面派的最好代表，要经一段考察后，再决定是否进去。”向忠发等也附和王明，结果，直到1933年底，中央没有正式分配给瞿秋白工作。这时期，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困难，政治上的打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肺病日趋严重，经济上也十分拮据。每月只发给他十几元生活费，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90元左右，最低工资8元左右。瞿秋白的这点生活费仅可以维持他和杨之华的最低生活水平，连温饱都说不上，更不要说治病和增加营养了。

面对这一切，瞿秋白安之若素，他是个党性非常强的人，没有向外人流露过对党内斗争的任何情绪，以至于夏衍回忆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指瞿秋白）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夏衍看到的是实情，但也是一种表象，瞿秋白是一个多感的文人，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革命者，是一个观察问题非常敏锐的理论家，他对党内斗争的不正常状况不可能无不平之气。那时，他抄送给鲁迅一首自己青年时代的旧体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应是他心情痛苦、孤寂的写照。后来他在苏区时，曾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中宣部干部吴黎平多次谈过对党内斗争问题的看法，有两点意见很发人深思：第一，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的，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勇气，决不能奴颜婢膝地听命于人。王明对俄国人奴颜婢膝，阿谀逢承，丧失了伟大民族的气节。第二，他说，中华民族有崇高道德，中国共产党人更应有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在党内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采用合乎中国人民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利益，合乎中国人民崇高道德标准的正当方法，决不应采取阴谋诡计、造谣诬陷、卑鄙龌龊的伎俩。这是不合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更不合乎中国无产阶级的道德的。这说明，瞿秋白对问题看得很透，但他在欲辩不能时，便不再抗争，大敌当前，他没有丝毫计较个人荣辱，而且，他对权力一向着得非常淡漠，这一点也制约了他的行动。他一直深感自己在领导岗位上力不胜任，自嘲是“以犬耕田”，因此，这次离开中央领导层，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

心理上的解脱。当杨之华受到株连被撤销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耐心安慰十分委屈的妻子说：“革命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多得很，不是没有工作做，而是做不完，要在受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在失去工作的时候，学会独立工作。”这话很能代表瞿秋白的心态。但是后来，当他意识到由于他的“不争”，使王明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夺了权，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时，他的内疚和自责感是非常沉重的，这一重负，一直背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1年到1933年，瞿秋白开辟了新的工作天地。他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左联作家结为挚友，全身心投入了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政府悬赏2万大洋缉拿他，他在特务机关的搜捕下经常搬家，生活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环境下，瞿秋白凭着渊博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写下了150万字涉及文艺理论、诗歌、杂文及苏联文学译著，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出自一个患有痼疾又身处逆境的共产党人之手，不仅显示了瞿秋白卓而不群的才华，也造就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当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旗帜，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瞿秋白也由此成为世人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就在瞿秋白的文学创作进入高峰期的时候，党内又一次残酷斗争降临到他头上。

瞿秋白靠边站后，出于革命家和理论宣传家的职业习惯，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密切关注国内外政治风云，撰写了30多万字的政论文章，先后发表在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布尔什维克》、《斗争》等杂志上。仅1933年，他以“狄康”笔名发表在《斗争》上的文章就有18篇。其中《国民党最近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从内债到外债》等文，简短犀利，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野蛮的武装侵略，揭露了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就是这样一批短小精悍的政论文章，又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无端攻击，指责他的文章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主持这次残酷斗争的是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此人是1930年夏由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追随王明后，不到半年，连候补中央委员都没当选过的他，一下子进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王明赴莫斯科后，他成为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李竹声在1936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很快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就是这样一个人，竟趾高气扬地横加指责瞿秋白。在一次会上，瞿秋白平心静气地申述自己的意见，他不能接受强加给自己的“右倾”的罪名。李竹声竟蛮横地冲他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无限上纲，批判秋白，并号召全党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次对瞿秋白的打击，严重损害了他身心的健康，他不得不搁下他的健笔。在离开上海之前的三个月内，瞿秋白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1933年冬，有人来通知他，中央有电报来，要调他去中央苏区，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想去很久了！”这时，他的肺病很严重，生活需人照料，谁都清楚，从上海到江西，长途跋涉，而且苏区条件极端艰苦，这对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显然不适宜。而且，上海中央局还以工作离不开为借口，不允许杨之华陪伴而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团在排斥异己，推行残酷斗争的惩办主义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瞿秋白这次蒙受不白之冤。并非空穴来风，它是与苏区的“反右倾”斗

争紧密相联的。在中央苏区，这种斗争已先于白区一步开展起来。矛头所指正是毛泽东。自1931年1月王明上台后，毛泽东的日子并不比瞿秋白好过，他们两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都是王明集团残酷打击的对象，同处于十分艰难的逆境之中。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奋力的抗争。

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粉碎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剿”，使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红色区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一点一点开辟出来的，正当它充满勃勃生机时，贯彻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团进入了江西。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上，将毛泽东创造的苏区工作经验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会后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建制，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也自然被免了职，由此拉开了排斥、打击毛泽东的序幕。临时中央碍于毛泽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表面上不得不决定让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却千方百计架空和限制毛泽东的领导权力。

1932年1月，临时中央要求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刚刚进入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状况认为不可。周恩来同意并电告了中央。但中央立即复电要求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决定攻打赣州。毛泽东极力阻止，他再次成为少数派。打赣州的队伍还是出发了。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猛烈的批评，“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又扣在他头上，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他坐在那里，任凭别人说什么，问什么，都不再发一言，使记录无法往下记，会议中途只好更换主持人。会后，他告病假住进离瑞金城约20余里的东华山古庙去休养。住在“与世隔绝”的山顶小庙里，毛泽东的心却实在放不下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果然不出他所料，一天，项英冒雨匆匆赶到山上，告诉他赣州前线失利，红军腹背受敌，周恩来请他即刻下山参加决策。毛泽东日夜兼程来到前线，大胆起用刚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部队，才使受围红军摆脱了困境。事后，在前线召开的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次军事方针的错误，明确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群基础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即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但是，毛泽东依然是少数派，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否决了他的正确意见。

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如此唱对台戏十分恼火，1932年4月4日发出指示信，严厉批评毛泽东，将“狭隘经验论”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并强调“这是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临时中央将日军占领东北视为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提出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消灭国民党武力，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当毛泽东在前线看到这封批评信后，他断然反对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党的任务的规定及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认为中央的指示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他马上复电苏区中央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是，苏区中央局没有抵制来自上海的错误批评，而是在毛泽东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作出决议，表示承认错误，彻底纠正。毛泽东从前线回来后，对这一决议十分不满，9年后他还提到此事说：“6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太文，

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1932年秋，苏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中央局才勉强同意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说服了主持前方工作的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作战，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三个旅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负责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周、毛、朱、王连电中央表示：“攻城打援部队无把握，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造成更不利的局面。”眼看这种争执还要无休止继续下去，为了不耽误战机，毛泽东等当即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按计划发布了工作训令。这样一来，更加触怒了“左”倾教条主义者。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从当时有关简报上，仍可嗅出浓烈的火药味，毛泽东再次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右倾”，斥责他犯了“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不让他再去主持军事。周恩来等试图将毛泽东挽留在前线，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会后，毛泽东不无讽刺地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对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军。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甚至强调：“对毛泽东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的名字，而是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1933年1月博古在上海无法立足，也来到中央苏区。他一到江西，就紧锣密鼓地先后将贯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扣上了“罗明路线”的帽子，将支持毛泽东的苏区地方干部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扣上了“毛派”的帽子，他虽没有点毛泽东的名，但矛头所向，大家都心照不宣。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那个时期很少与人谈话。多年后，毛泽东谈起这段历史，仍按捺不住心头的义愤：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就在毛泽东身处逆境的时候，1934年2月，瞿秋白来到了中央苏区。自从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瞿秋白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老朋友重逢，自然分外高兴。瞿秋白想起1927年八七会议开后，他曾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当时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转眼6年过去了，中国红军已经发展到十多人。这变化有多大啊，瞿秋白既感慨又兴奋。在苏区，瞿秋白处处有一种新鲜感，他感到在白区形成的许

多想法需要改变，而感受最深的是，中国革命要由毛泽东这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来领导，“我们这些人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理解和体验太少了”。瞿秋白到苏区不久即担任了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和中央工农政府委员，不久又担任了《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在物资匮乏的艰苦生活条件下勤奋工作着，常常忙碌到深夜。那时，王明路线在苏区已发展到顶点。瞿秋白的努力并未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他头上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与毛泽东都在党内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政见相同，话很投机，常在一起填词赋诗，互相唱和，以此表达对王明路线的不满。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一起，背靠着背，互相酬唱。毛泽东有时看到瞿秋白凝神深思的样子，还开玩笑地问道：“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了？”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开始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出的被博古聘为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来到了瑞金。毛泽东原以为他是一个有专门军事知识的人，可以纠正错误的军事决策，谁知他只会机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套打法，对中国战争的特殊规律一无所知，而且性格暴躁，十分傲慢，听不得不同意见，在这样的指挥下，红军伤亡越来越大，一个接一个的县城落入敌手。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的“永久性防线”被国民党飞机夷为平地，红军仅在一天内就伤亡1200余人。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危在旦夕。博古、李德仍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了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博古、李德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事前不仅没做任何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未开会讨论过。一些令“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被内定留下来打游击，瞿秋白是其中一个。中共中央局本来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那时他正在于都搞调查研究。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1934年10月初，毛泽东接到“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他立即骑马从于都赶回瑞金，接着，在瑞金附近的一座青山上召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定红军撤离苏区的消息。在布置转移任务时，毛泽东宣布了留下同志的名字，其中有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瞿秋白等。瞿秋白听到自己要留下来，感到非常意外，但他没有吭声。会后，吴黎平找到毛泽东说：“叫秋白留下怎么成？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怎么可以丢下不管？！”毛泽东说：“我也提过了，但这是中央局的决定，我的话不顶事呀！”瞿秋白找到张闻天，要求随大部队长征，张闻天表示同情，又去找博古商议，要求带走瞿秋白，博古还是拒绝改变决定。许多人对中央局的决定深表不满，何叔衡已年届六十，瞿秋白又身患重病，明摆着不适于游击战争，将他们丢弃在敌人重重包围的苏区，命运如何可想而知。

红军撤离前夜，吴黎平请瞿秋白吃饭话别，那天，瞿秋白情绪很激动，他一杯接一杯地饮酒，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10月10日，毛泽东随红军大部队的出发了。他是满怀对红军安危的忧虑走的，也是满怀对秋白等人的担心走的。1935年1月，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

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后，他当即从遵义拍电报给留在苏区的中央局同志，要他们妥善安排瞿秋白。此时，包围中央苏区的各路敌军，已开始对瑞金、于都各县苏区进行“清剿”，形势非常危急。负责中央分局工作的项英在陈毅的坚持下，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护送去上海。他们在转移途中不幸与敌遭遇，何叔衡英勇牺牲，瞿秋白被俘。在狱中，敌人从刑讯逼供到劝降，能使用的手段都用了，瞿秋白不为所动。在蒋介石的密令下，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沉静、安详、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从容就义，匆匆走完了他36年的生命历程。

## 毛泽东评价瞿秋白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抵达陕北吴起镇。他从窑洞土墙上糊着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心情非常沉重。他将这消息告诉了冯雪峰，对他说：“你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瞿秋白、何叔衡，以及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都是被“左”倾领导者丢弃在苏区而牺牲的。夺去他们生命的，是国民党的子弹，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则是罪恶的宗派主义。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慨，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纠正王明“左”倾路线。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道：“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瞿秋白36岁悲壮殉难，一个对党和人民始终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一个才华超群坦诚磊落的革命领袖，就这样英年早逝了。毛泽东每每念及此事，都不胜惋惜，流露出深深的缅怀之情。

1939年5月，诗人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萧三与毛泽东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一天，他去拜访毛泽东，两人在月下漫步，谈到朋友，萧三想到何叔衡、蔡和森、瞿秋白都已不在人世了，不禁叹息道：“和森、秋白正值壮年有为之时啊，他们不幸牺牲，太让人痛惜了。”听着萧三的话，毛泽东久久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是啊，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在延安，毛泽东手里有一本名叫《海上述林》的书，是瞿秋白撰写或翻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高尔基等文学译著集。这本书是鲁迅得悉秋白遇害的噩耗后，强忍着悲痛，抱病编辑的。当时国内不能出版，鲁迅多方奔走，拿到日本去出版。书印好后，他精心挑选出皮脊和蓝绒面的各一册，托冯雪峰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很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他仔细阅读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反复思考着如何确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文艺方针。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对周围同志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里，他又认真读了《海上述林》。

瞿秋白离去了，临终之际，他在汀州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他是一位死而未能盖棺论定的人，在王明宗派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的日子里，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始终没有推倒。就义前，瞿秋白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遗书《多余的话》，文中没有以往烈士的慷慨陈词，而是用平缓、伤感、甚至有些消极的言辞无情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坦然无私地进行自我审判，他把自己被推到领袖地位说成是“历史的误会”，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不掩饰、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头的压抑与矛盾和盘托出，暴露出真实的、没有丝毫虚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评是非。这份遗言最初发表在中统特务机构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党内许多同志读后对他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曲解，甚至

有人将其视作“叛变投降自白书”，从而又为瞿秋白的历史结论抹上了一道浓浓的阴影。

是毛泽东第一次为瞿秋白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七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了瞿秋白：

其一：“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其二：“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毛泽东在修改这份决议时，特别强调地批评四中全会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和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他认为瞿秋白是一介书生，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王明、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力。但他认为瞿秋白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毛泽东再次提到长征前夜，王明、博古故意与恶意地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一事，并指出：“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得到公正的评价。这时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已过去14年，瞿秋白从容就义也已经10年了。瞿秋白恢复名誉之日，正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之时，这场较量若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也经历了整整10年之久。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写下了本文开头那段话，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的第二次正式的重要的历史评价。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瞿秋白墓，位于任弼时墓东面，墓前立着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七个苍劲大字。周恩来作为主祭人，董必武、陆定一、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等作为陪祭人参加了迁葬仪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清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在革命战争年代，成百个党的优秀的高级干部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中央只决定迁葬瞿秋白一人到北京，由此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瞿秋白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 毛泽东与李立三

毛泽东与李立三，同前面讲过的毛泽东与陈独秀、瞿秋白比较又有不同的特点。他们都出生在民族灾难深重的 19 世纪末期。他们是湖南的同乡，一个家在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家在醴陵县阳三石。毛泽东虽比李立三年长六岁，由于上学较迟，所以差不多同时间进入湖南省城读书。他们同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求知识、交朋友中于 1915 年相遇。李立三响应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两人初次相识，但因年龄相差较大，知识深浅也不相同，使得互相交谈不起来。毛泽东后来同斯诺谈话中讲到，“征友启事”只有三个半人响应，所谓“半”个就是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李立三。

几年后，他们追求革命真理，选择了不同的途径。李立三于 1919 年秋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立足国内了解国情和学习翻译过来的新书籍。几乎在同时，他们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1 年底李立三回国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这时，毛泽东与李立三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李立三依据毛泽东的主张与部署，具体组织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中的一次成功的创举。这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随后中央即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调李立三到武汉工作。在国共合作形成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而李立三则运用安源工运的经验，在上海、武汉地区领导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由于总书记是由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李立三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此时，毛泽东与李立三则成了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李立三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大大促进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也正确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解决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问题，为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然而，1930 年 6 月至 9 月，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第一线，从实际出发，抵制了“立三路线”，不但没有使红军受损失，反而是大大地发展了红军的力量。随后，他又指挥红一方面军 4 万多人粉碎了当时国民党十万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为创建中央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他在与李立三的共同战斗中，既总结了正面的经验，也总结了李立三犯错误的反面经验，并且进一步升华，基本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以，毛泽东的成功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与李立三革命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分不开。本编就是研究与探讨这个问题的。

## 志同道合救国救民

### “征友启事”和“半个人”

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主要学校发出“征友启事”。人们对这一举动不甚理解，响应者寥寥，但李立三却前往和毛泽东见了面，这是他们之间的初次相识。

那时，毛泽东在长沙是小有名气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中国正处在动荡的年代。国际上，风云变幻，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南北各派军阀对峙，你争我夺，混战不休。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苦难，深深地刺痛着当时整个一代的爱国青年的心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勤奋好学，不断追求新的思想，具有了坚定的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他的政治观念，“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了。

毛泽东当时的重要活动是为研究学问、探索救国之道而团结同志。在1915年暑假过后，他感到需要突破校内这个狭小的圈子，向校外更大的范围去物色更多的朋友，于是发出了“征友启事”的广告，署名“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是毛泽东三个繁体字的笔画数。

“征友启事”的内容大意是：要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牺牲的青年。启事引《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毛泽东自己将启事刻蜡版油印，寄发长沙部分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有“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等字句。这年9月27日，他写信给同学萧子升说：“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他求友的心情甚切，是因为他认为要有渊博的学识和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必须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

在响应“征友启事”当中，有一个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浏阳人罗章龙（那时叫罗璈阶），他在该校会客室外墙端看到了启事。它“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罗章龙看后觉得启事的文情真挚，颇为感动，于是便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交朋友。过了三天得到复信，说“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并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见。据罗章龙回忆，他拉了一个同学一起去，当他们到达图书馆时，“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器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这次罗章龙和毛泽东的会晤，谈了三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关于治学问题，润之……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付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从毛泽东同罗章龙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知识相当渊博，思想颇有见地的青年了。

1915年，李立三也在长沙读书。罗章龙是李立三当时结交的要好朋友。经罗章龙的介绍，李立三也响应“征友启事”去拜访毛泽东。

李立三所以响应“征友启事”，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他在长沙求学时，

---

以上引文，见罗章尤《椿园载记》。

也是一个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的爱国青年。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他刚生下时，适逢在他家屋前一株凤尾蕉开了花，家里人认为是大吉大利，取乳名叫凤生。到了上学年龄，他父亲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为隆郅。李立三从小聪明好学，争强好胜。他父亲不喜欢儿子的性格，对他严加管教。在他幼年时就被送进蒙童馆读四书五经，但他常常偷偷阅读《水浒》、《精忠传》、《三国演义》之类的“杂书”。不久，蒙童馆改为醴陵县立渌江初级小学，李立三成为这所新式学校的学生，但每天还得遵从父亲的意旨，阅读指定的古书。在1906年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李立三在学馆结识了一位同盟会会员，听到一些革命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对反清烈士崇敬之情。辛亥革命后，李立三越级升入醴陵渌江中学。但不久就开始了连年的军阀混战。醴陵地处交通要冲，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这里是必争之地。少年时代的李立三，眼看国无安宁之日、人民流离失所，逐渐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情绪。他为自己起了个“忧国子”的笔名，写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和感想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围观的同学看了都颇为感动。

1915年，醴陵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长郡中学。于是，李立三离开家乡来到长沙读书。

青少年时期的李立三是个热情奔放的人，经罗章龙介绍后，他也没有深恩熟虑，就去响应“征友启事”。李立三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时，李立三才16岁，毛泽东比他年长6岁。这时的毛泽东正是风华正茂，志向不凡，他侃侃谈论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李立三觉得毛泽东已是一位大先生，自己则是刚从县城来到省城长沙的小学生。两人初次见面，知识面相差较大，互相交谈不起来。李立三一时语塞，又有些拘束，没有说什么话，就离开了。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的一张“征友启事”得到回答的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很显然，那时毛泽东同李立三相比，学识上更加渊博，政治上更有见解，以至使李立三无法同毛泽东交谈。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在这次会见后发展起来。

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后，有几个人来应征或来信表示愿意联系，这已使他感到高兴和快慰。这一年11月9日，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暑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 分途寻求革命真理

毛泽东和李立三分手后，继续有目的地去寻找革命青年，逐渐在自己周围聚集了20多个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在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一道，积极组织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那时，李立三是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员。

他于 1917 年春中学毕业后,曾经一度投奔程潜的护国军,当了一名士兵。1919 年春,他得到程潜的资助,来到北京读书,进了法文专修馆的留法预备班。这年秋天,李立三从上海启程出发,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此时,毛泽东与李立三,一个在国内,一个去异国他乡,各自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的。法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多次在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等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并于 1917 年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构。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将这个�息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和蔡和森。这时,湖南政局极为混乱,“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而且,新民学会刚成立,许多会员感到需要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觉得赴法勤工俭学是一条出路,于是新民学会在 1918 年 6 月下旬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这次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当尽力进行。会后,毛泽东提议蔡和森赴北京与有关方面联系,他自己在长沙负责发动和组织工作。

8 月,在蔡和森一再来信催促下,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接着,和蔡和森一起把湖南赴法青年妥善地安排到预备班,并为他们的出国作好各种准备工作。

1919 年 3 月,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在归途中绕道上海,在那里 20 多天中,接连参加了欢送两批赴法青年的活动。

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做了很多工作,深得大家的称赞。到 1919 年和 1920 年,湖南省共有 300 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是全国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新民学会会员中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有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近 20 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分子或骨干。

1919 年 4 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并主编《湘江评论》,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这时,作恶多端的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禁止爱国运动,并查封了《湘江评论》。这年 12 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发动湖南人民开展驱张运动,他亲自率领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

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到北京时,已经吸收了许多新思想,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在北京,又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密切的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而且他自己还热心地搜集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他思想上已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

1920 年 4 月,毛泽东离北京去上海。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研究了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还讨论了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向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信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而且又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称“南陈北李”。毛泽东第二次北游期间,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又得到他们的启迪和帮助,从此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后来他回忆时谈到:“到了一九二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

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冬至1921年初，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李立三在五四运动以后，怀着追求新思想的热情，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去探寻革命真理。1919年10月，他在上海搭船前往法国。在度过40多天颠簸的海上生活后，到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接着，经巴黎来到蒙达尼，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蒙达尼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一座风光美丽的小城镇，蔡和森抵达法国后，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活动中心也在这个地方。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共产党已经建立，各种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大量印行，工人运动也相当活跃。李立三刚到法国时，曾经一度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不久，他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在读了法共《人道报》等进步报刊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思想上有了变化。特别是，后来在圣夏门一家铁工厂做工，受到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逐渐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一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sup>—</sup>

1921年2月，李立三和赵世炎等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劳动学会在酝酿建立时，曾经准备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会员中意见分歧，有人当时还未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才叫做劳动学会。在这之前，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组织的革命团体已有以蔡和森为首的旅法新民学会，以李维汉、张昆弟为首的工学世界社等。这些社团的组成，为后来中共旅欧党团的建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劳动学会成立后不久，李立三、赵世炎等又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很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赵世炎和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而劳动学会则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

勤工俭学学会建立后，李立三带领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来到克鲁邹施乃德钢铁厂做工。赵世炎随后也来到这里，在巴黎成立的劳动学会移到这里来开展活动。克鲁邹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它和蒙达尼成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革命活动的两个中心。这里的施乃德钢铁厂是法国最大的机械工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部分当杂工，搬运钢铁和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被分配在翻砂、锻冶车间劳动。李立三当了翻砂工，劳动强度很大，每天要在熔铁炉旁搬动百多斤重的铸件和工具。劳累一天，所得工资仅高于学徒工，除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外，就所余无几了。李立三在这里亲身体验了工人的艰苦劳动生活，清除了头脑中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工人师傅是法共党员，很赞赏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常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讲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李立三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很明确的，但是如何革法，这是不太明确的”。

劳动学会成立时，李立三、赵世炎等明确提出：《学会》的任务是要革命。在旅法的条件下，怎样开展革命工作呢？他们当时的认识是：“第一步应先把华工组织起来”。

施乃德钢铁厂是华工的中心，在那里劳动的华工有两千多人。李立三、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

赵世炎在一天紧张劳动之后，不顾休息，利用工余时间深入到华工中开展工作。他们成立了华工俱乐部和工人夜校，还创办了油印刊物《华工周报》，在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他们规定，劳动学会会员每周要有一天到华工中去，找他们交朋友，为他们服务。一位劳动学会成员回忆说：“每星期日去他们住的工棚，谈谈生活工作情况，国内外时事，帮助他们写写信，或替他们办点临时托办的事”，这种活动深受华工的欢迎。李立三和赵世炎还为帮助一些华工解除包身合同而进行了斗争，使这些华工获得了人身自由。通过以上这些活动，他们同华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九十月间，李立三、赵世炎和蔡和森等联合起来，共同领导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

那时，华法教育会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在国内捐了一大批款并取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于1921年夏天，筹建了里昂中法大学。但在该校成立后，校长吴稚晖等人专门从国内招收官僚贵族子弟入学，而取消勤工俭学生入学资格。勤工俭学生闻讯后群情激愤。李立三和赵世炎等商议。发动一个争取里昂中法大学招收勤工俭学生入学的运动。李立三所在的克鲁邹施乃德钢铁厂的147名勤工俭学生于9月5日率先发出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次日，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200多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争回里大的斗争。

9月17日，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100多人在巴黎召开大会，一致决定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并提出了“誓死争回里大”等口号。大会原决定派代表赴里昂同校方谈判，但在得知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官僚贵族子弟将于9月25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后，决定采取直接行动，赶在他们之前，占据里大。

9月20日，李立三和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筹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的18名代表，率领由100多人组成的“先发队”星夜赶往里昂。次日早晨，“先发队”到达里昂中法大学，并立即派代表同校方交涉。但校方坚持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要求，同时勾结法国当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这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强迫他们离开。李立三同赵世炎等出面同警察交涉无效，“先发队”同学被强行押上囚车，送到一座兵营里囚禁了20多天。10月13日，法国武装军警又将李立三和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名勤工俭学生押上轮船遣送回国。赵世炎在同学们协助下机智脱险，逃了出来。

11月中旬，轮船抵达香港。李立三和蔡和森、陈公培等人经香港去广州同粤区党组织联系，当得知陈独秀已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后，又马上动身去上海。12月，李立三和蔡和森由陈公培（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介绍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向陈独秀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以及对党的认识和参加革命的决心。他们之间还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党中央当即批准他们两人为中共党员。蔡和森留在中央工作，李立三被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中共湖南支部于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李立三从上海到长沙后，立即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去见这位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6年前分别的毛泽东和李立三，如今，在革命的共同目标下又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在湖南建党以后，根据中共一大决议精神，把组织工人阶级、领

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李立三的到来，无疑将给湖南党组织增添一份重要的力量。这时，毛泽东已经想到，开展安源工运的重担将要落在这位比他年轻的李立三身上。他在清水塘这个办公兼居住的地方，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向他介绍了安源路矿的情况，希望他到那里开辟工作。

## 领导与被领导

### 李立三去安源

安源，是我国江南储煤丰富的矿区之一，位于江西省萍乡县，邻近湖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江西还没有党组织，而且安源又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这个地区受湖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在20年代初，安源路矿工人有17000多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和生活状况极其痛苦。工人每天劳动12个小时，工资收入低微，还经常拖欠不发。矿井内没有安全设施，常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断被压伤以至烧死、淹死。矿长和工头等可以对工人随意辱骂、罚工钱，直到关禁闭或开除，甚至还滥用私刑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这里流行着一首令人心酸的歌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这种悲苦的境遇迫使工人时断时续地起来反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这里的工人就已经多次进行过反对洋人和监工的自发斗争。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发动和组织工人为争取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而斗争，以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毛泽东当时既是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他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安源煤矿是湘区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工人群众很集中，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在李立三到来之前，1921年秋，毛泽东就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公开身份前往安源实地考察。他这次在安源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交了朋友，倾听了他们的血泪控诉。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工人讲了许多深刻的革命道理，使工人懂得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老工人还记得毛泽东在谈话时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经过这次调查，毛泽东亲自体验到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又了解到安源工人在历史上就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他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决心要亲手在这块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从安源回到长沙后，立即和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和安源路局火车房工人建立通信联系。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把各种书报和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传递到安源去，《工人周刊》等出版物时常张贴在工厂附近的墙壁上。一天，毛泽东对张理全说：“你告诉安源工友们，我们将会来看望他们。”张理全

立即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安源工友。朱少连等几位工友接到信后十分高兴。12月中旬，他们回信给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请求派人到安源来给予帮助和指导。

毛泽东当即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立三、张理全、宋友生（湖南一师附小教员、青年团员）等共四人，冒着隆冬严寒，专程从长沙再次来到安源。那时，李立三的原名是李隆郅，毛泽东想得很周到，认为这个名字难认又难写，不利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议改一改。李立三去安源时，按谐音把“隆郅”改为“能至”。

毛泽东和李立三等到安源后，住在一个小客栈里。第二天先去访问同劳动组合书记部通信的几位工友，请他们带领参观矿井，又到了内外厂和铁路机厂各处，详细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到了晚上，毛泽东邀请工友们来小客栈聚谈。他把李立三介绍给安源工友，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毛泽东这次和安源工人谈话，一再讲述要组织起来结成团体的革命道理。他还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工人当家作主的情况，引证说明，只要工人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能打倒。安源工人听后深受启发。

安源工人向毛泽东提到工人子弟不能读书的问题。毛泽东告诉大家：我们所以吃亏，是因为没有文化，我们不但要办工人子弟学校，而且还要办工人补习学校。多串连一些工友，先把学校办起来，然后组织工人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可以叫“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毛泽东和李立三等这次在安源活动了两三天，先后同几十位工人亲切交谈过。他们这次同工人谈话的中心，就是动员工人组织起来，建立革命团体，通过他们自身组织，为解放自己而开展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方法。当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的阶段，但它已深入到下层劳动群众中去，同自己的阶级奠定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经过湖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研究，决定在安源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并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李立三年轻有为，干劲很足，在法国时就做过华工运动的工作，而且他是醴陵人，家乡离安源不远，和安源路矿工人打交道很有便利条件。蔡增准和蒋先云等人随后也被派往安源。

李立三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

## “哀而动人”的口号

那时湖南省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负责人是李六如。李立三找到李六如后对他说：“润之派我去安源工作，要利用现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名义，联络地方士绅，争取合法地位，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要请你写一封介绍信给那边的熟人。”李六如满口答应，写了一封介绍信递给李立三，随后又到湖南省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去，另写两封公函给李立三带去。李立三拿了介绍信和公函，就以推行平民教育的名义前往安源。

从1921年12月到1923年3月，李立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一到安源就从办平民教育入手，很快打开了局面。

李立三首先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爱古文，于是就用“四六体”的文章写了一篇请求开办平民学校的呈文送去备案。县知事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函和李立三的呈文后，很赞赏呈文的文章，对开办平民学校甚为满意，于是很快批准立案。县知事找李立三谈话时，李立三提出要县政府出一布告，县知事也答应了，就在这篇呈文的前后添写几句话，作为县政府的布告张贴出去，表示当局的支持。这样，李立三取得了开办平民学校的合法身份，在安源这块蕴藏着中国工人阶级无限潜力的土地上，开始了革命的工作。

李立三先开办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然后经常访问学生家长，热心劝说工人来读书。工人们见他到处劝学，最初都叫他“游学先生”。1922年1月，除平民小学外，增设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因为补习学校是在夜间上课，所以又称工人夜校），开始时有60多人参加，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工人夜校主要由李立三讲课，对外用的是平民教育课本，对内用的是教员自己编写的课本。“无产阶级”、“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什么要革命”、“社会主义”等等，都是课本上的题目。李立三善于讲演，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过教文化，对工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以此逐步启发工人的觉悟。

工人夜校的工作进一步开展后，李立三着手在工人中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最早入党的有路局行车部总司机朱少连等几个人。1922年2月，在路局的火车房建立了6个人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这是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30多人。

安源有了党支部的坚强领导核心，工人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就逐步地深入开展起来。于是，李立三按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准备成立一个路矿工人的联合工会组织。

1922年3月16日，由李立三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决定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选出李立三为筹备会主任。4月1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知事公署立案并出告示保护。为了取得合法，呈文中写上了俱乐部的宗旨是“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几天后呈文就批准下来。在这次会议之后，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汇报工作。毛泽东当即召集会议讨论，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4月16日召开第三次筹备

会时，参加俱乐部的人数已有三百多人。会上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若干人。5月1日劳动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当天举行了大游行，路矿工人喊出了“打倒军阀！”“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更深入人心。俱乐部成立后，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工人解决困难，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兼经理。俱乐部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于是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迅速增加。1922年5月，毛泽东在李立三陪同下到安源检查工作、发展组织。在看到工人贴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者的标语时，毛泽东赞扬工人的革命热情，然后启发大家说：你们要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地来，打好扎实的基础。毛泽东还参加安源工人俱乐部干部会，同夜校工人谈话，访问工人家庭。他又对工人说：现在你们要加强团结，壮大组织。他告诫党员要注意防止暴露党的组织，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组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毛泽东这次在安源既鼓励大家敢于斗争，又教导大家要讲究斗争策略，对党员和工人们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1922年7月，湖北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工人们深受鼓舞。当时，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了工人的几成工资未发，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俱乐部乘此时机，向工人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这个宣言受到工人们的普遍拥护。路矿当局原先对俱乐部不甚注意，在汉阳铁厂罢工后，渐渐觉得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企图加以破坏。

这时李立三已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商量在安源进一步开展斗争的有关事宜。毛泽东请李立三暂时留下参加和帮助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8月10日，李立三以“能至”为署名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一文，公开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成立大会召开，李立三同易礼容、刘少奇一起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会后，李立三离开长沙返回安源，在途经醴陵时，顺路回家探亲。

路矿当局乘李立三不在安源的时机，一面对蒋先云等施加恐吓，一面又用笼络手段，诡称要津贴俱乐部经费和拨给俱乐部房屋。但蒋先云等没有被诱动，反而向工人展开广泛宣传，每日分几处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加入俱乐部的工人每日以数十计，斗争的空气逐渐浓厚。

俱乐部的力量在迅速发展，路矿当局决计扑灭。他们上书萍乡县署和赣西镇守使署，硬说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以武力封闭。同时，还威吓蒋先云、朱少连等人，如不速离矿山，就有杀身之祸。“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安源的形势日趋严重。

在关键的时刻，9月初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江赶来安源。他听取了安源党支部的情况汇报，和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立即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罢工，并在组织上、策略上做好各种准备。

据老工人回忆，当毛泽东听说：“五一节”游行喊“共产党万岁”的口

号时，他告诫大家说：我们开始做工作不能就招来麻烦。好比造栋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未砌墙架屋。要等房子做到有几成了，“共产党”的门才能透点风出去，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有了枪，有了军队，就可以大叫，门方始打开。现在先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联合一切支持我们的人，叫早了，他们会反对。等工友们知道自己的利益跟我们密切相关时，就可以叫了。

毛泽东对大家说：从目前形势来看，安源罢工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要使安源敌人屈服，非采取罢工的手段不可。我们共产党人要站在前面，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他又嘱咐大家，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

毛泽东还写信给正在老家醴陵探亲的李立三，要他迅速赶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信的大意是：现在安源工人群众已经起来了，情绪很高，可能很快要举行罢工，你赶快回安源。李立三接到此信后，第二天即9月9日就赶回安源。这时，毛泽东已返回长沙。

李立三在安源面对路矿当局的恐吓和破坏，他的态度更加坚决，向工人表示誓死不离安源，要斗争到底。不久，毛泽东为了加强领导，经湘区委研究决定，再派刘少奇到安源。刘少奇于1922年春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先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8月调到湖南长沙。这时，他正参与领导粤汉铁路罢工斗争，毛泽东把他从火线上抽调出来，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安源罢工斗争。

这时路矿当局采取强硬手段，呈请萍乡县正式出示，命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适逢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掀起罢工浪潮，安源工人更为激动，纷纷要求罢工。李立三等采取“先礼后兵”，争取社会同情的策略。

9月11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三条最低限度的要求：路矿两局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按月发给俱乐部津贴；从前积欠的工人存饱限七日发清。并限两天内圆满答复，否则，工人要作“最后之对付”，即举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作出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同时对罢工作了周密的部署。

这时，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信，信中说：“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这给安源工人很大的鼓舞。

在罢工前夕，毛泽东从长沙写信给李立三等人，对“哀而动人”的策略再次作了解释。信的主要内容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

就在9月12日这一天，安源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为了防止敌人用杀害领导人的办法破坏罢工，会议决定李立三秘密策应，隐蔽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常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这次会议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拟定了罢工宣言，提出了“从前是牛

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这个口号不仅可以激发广大工人的强烈感情，而且可以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会议还讨论了17项要求，作为复工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发清积欠工人存饷；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增加工资，改良食宿条件，等等。

会后，李立三还带了礼物去会见当地洪帮头子，争取在罢工期间，社会上有个良好的秩序。

后来李立三回忆这些事情时说：“安源罢工时，‘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当时是将口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争取洪帮头子的工作中，李立三写道：“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 鸦片馆关门；2. 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 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这三件事情的实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决的，工人罢工后就完全实现了）。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

### 席卷全路矿的大罢工

路矿当局在9月12日当天又作出第二次答复，只承认第一、二项条件，但仍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第三项条件。俱乐部在原条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并限期答复。

9月13日午夜，路矿当局仍没有对发清积欠工资的要求作出满意答复，而且，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到。于是，俱乐部在当晚12时断然发出罢工命令。

9月14日凌晨，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开往株洲的列车最先停驶，窿门口的电源切断，矿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煤的电车瘫痪在路轨上。工人们像潮水般一群群涌出窿外，手举斧头、手镐，不停地呼唤“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当天上午，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按照俱乐部的命令，为了供应照明、饮水和维护矿井安全，只有锅炉房一处和电机处的发电厂还在照常工作。

罢工开始后，俱乐部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还在各处墙壁上满贴标语、布告，同时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李立三、刘少奇和路矿工人一起拟定的罢工宣言，写得真切感人，简短有力。宣言写道：

---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李立三《看了 燎原 以后》。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在罢工宣言中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发清欠饷、改良生活待遇、废除封建把头制等复工条件的 17 项要求。

安源罢工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发来了声援电，电文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友公鉴：我们接阅你们底罢工宣言，我们知道你们已经鼓着你们底阶级斗争的勇气和惨无人道的资本家官僚军阀宣战了。我们非常佩服你们底奋斗精神与作战的力量。我们对于你们向铁路当局所要求的最初步最低度的条件，实在觉得万分正当而无可减缩丝毫。我们诚诚恳恳地愿你们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也很愿意竭力援助你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敬祝胜利！

对安源罢工的声援电，鼓舞了安源工人的斗争意志，增强了他们同路矿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着罢工，路矿当局惊慌失措，玩弄各种手法进行破坏活动。先是指使工头利用亲戚关系收买少数工人下井，但被工人纠察队劝阻或制止，结果再没有一人自行上工。路矿当局见此计不行，又悬赏银洋 600 元，秘密派遣暗探欲谋杀李立三。工人们闻讯更加愤怒，一方面警告当局：如果俱乐部主任被害，就要路矿当局全体不能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不让李立三外出，偶或有事出外接洽，不出 20 分钟，必有几百工人前往保护他们的领袖。路矿当局又改途易辙，电令当地军阀赣西镇守使，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派兵前往弹压工人。但由于工人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对士兵开展政治工作，许多士兵也就知道工人罢工是为了改良生活，逐渐对工人抱着同情的态度。

罢工期间，在安源共产党支部领导下，全体工人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俱乐部的命令如同军令一样，遇到了事故，一呼百应，秩序井然，社会各界都表示叹服。

在严峻的局势下，路矿当局请商绅界出来调停，9 月 15 日派全权代表到商会同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举行谈判。这一天，路矿当局办了桌酒席，桌子上还摆满了用纸包着的一筒筒银洋。他们一再提出“先开工后议条件”。李立三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把谈判的题目弄错了吧？是勾结还是行贿？如果要开工的话，就把工人提出的 17 个条件摆在桌子上来谈，不然，其他的请别开

口！”

9月16日，路矿当局派人到俱乐部，要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这次刘少奇作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参加谈判。戒严司令仗手中的武器，威胁刘少奇下令复工，否则就地“正法”。刘少奇一身是胆，临危不惧，仍坚持先谈条件，后谈复工。在谈判时，数千工人闻讯赶来围楼呐喊助威，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软了下来，不得不答应下次继续谈判，尽快解决罢工问题。

第二天，因锅炉烧煤快要脱节，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要害部门将面临停机危险，形势十分危急。路矿当局承认对付工人罢工已经“计穷力竭”，不得不改变“先开工后议条件”的主张，于当日下午派代表随同商绅代表与俱乐部代表李立三磋商条件。直到深夜二时，经过李立三的据理力争，才将17条商定为13条，路矿当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比原来提的“有交涉之权”更进了一步。13条和17条相比，有些要求没有完全达到，但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李立三在临走时一再声明：“此13条无可再行让步，可则立即开工；不可则听众工所为，我亦无法制止”。

18日上午，李立三代表工人俱乐部和路矿代表签订了正式条约。至此，从9月14日到18日历时五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

这天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工人到会有一万多人。几百工人手持小旗拥着李立三来到会场，顿时，掌声雷动，工人们高声欢呼。李立三登台演说，在宣布谈判胜利果实13条之后，接着说道：“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会得到最后胜利的。望各位暂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会上工”。李立三演讲完后，工人们三次高呼“劳工万岁！”接着，李立三为前导，群众后随，旗帜满天，爆声震地，在安源新街旧街举行了大游行。

当时，以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名义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的，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了出色的胜利，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李立三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依靠工人群众坚固的团结，注意斗争策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使这次罢工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取得圆满的成功。据《安源路矿工人

---

见《红色安源》，中共萍乡矿务局委员会宣传部编。

《萍矿矿长就安源罢工事致汉冶萍公司经理函》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俱乐部略史》记载：“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 120 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 弯弓待发

安源罢工胜利后，废除了封建的包工制，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工人说，他们在安源做了 20 多年牛马的工作，过了 20 多年的非人生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出头的一日。10 月，俱乐部重新改组，选出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罢工开始时，参加俱乐部的工人仅 700 余人，罢工胜利后，1.7 万多工人踊跃加入俱乐部。此后，俱乐部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对推动当时江西、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促进和帮助了湘赣的农民运动，并为后来建立安源工人革命武装，参加北伐，参加秋收起义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罢工胜利的当年冬天，毛泽东再次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一方面，他考察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指示安源党的组织发展一批党员，巩固和发展罢工胜利成果。另一方面，那时中共中央计划组织铁路、矿山、海员三个全国产业工会，以便成立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毛泽东这次去安源也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这个计划。随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做了大量的工作。

安源罢工胜利后不到半年，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残酷镇压，腥风血雨席卷全国，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政府的交通部、工商部向安源路矿当局发出密电：“俱乐部乃赤祸之源，应即相机封闭，勿使遗患……”但路矿当局考虑到“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因此不敢贸然下手。

毛泽东当即召集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安源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要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最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安源的同志找路矿当局谈判，指出他们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因而使路矿当局不敢有所动作。当时安源工人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路矿当局很快就答应了。

正因为安源党组织执行了毛泽东的灵活策略，所以，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安源工人俱乐部仍然红旗不倒，而且取得了新的胜利和进展，当时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邓中夏曾经赞扬地说：“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 农运领袖与工运领袖

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从 1922 年下半年以来，湖南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粤汉铁路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大罢工，以及长沙泥木、缝纫、铅印、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震动了全中国，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同时调李立三到武汉，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的党组织。毛泽东先从事国共合作工作，然后渐渐把注意力转到农民问题，正确地阐明农民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被瞿秋白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李立三后来继续从事工运工作，在上海、武汉地区运用安源工运的经验，领导了更大范围的工人斗争，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1923 年 4 月，毛泽东奉命到中央工作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合作工作。6 月，他出席党的三大，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报告，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推选他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他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1924 年 12 月，毛泽东因病离上海回湖南疗养。

1925 年春，毛泽东回到韶山养病。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家乡搞起农民运动，创办了农民夜校，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 20 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毛泽东到达广州后，不久便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时，他已经注意研究农民问题。

1926 年 5 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把主要精力放在农讲所的工作上。毛泽东亲自给学员讲课。在教学中，他注重对学员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8 月，毛泽东带领学员到彭湃领导农运的地区——海丰实习两周，增强了学员对从事农运的决心。这时，李立三在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聘请他来农讲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等课程，深得学员欢迎。这届学员在 9 月间毕业。随即分赴各地，成为当地农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有效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为了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期间，广泛收集了有关农民运动的材料，编辑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9 月 1 日，他为《丛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农民运动提到有关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同年 11 月，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农委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全国工农运动推动北伐军的北伐，而北伐军的胜利进程又推动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爆发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尤其在湖南，是当时农民运动最发展的省份。毛泽东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专门到湖南五个县作实地调查，历时一个月，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满腔热忱地支持农民运动，以大量“好得很”的事实批驳了“糟得很”的谬论。提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公开发表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农运骨干的热烈欢迎，大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从实践到理论，毛泽东真正成了如瞿秋白所称颂的“农民运动的王”。

在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的同时，1923 年 4 月，李立三也正式调离安源，担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二七”惨案后的武汉，白色恐怖严重，李立三在政治环境异常险恶的条件下，整顿和重建了一些基层党组织，恢复了党的活动。

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李立三以武汉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会后，他没有回武汉，被党中央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加强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那时，邓中夏已在上海，他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大学教务长。李立三到上海后，有意识地运用安源工运的经验去开展工作。他和邓中夏等从办平民教育促进会入手，进行公开的合法活动；然后又在上海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七个区办起平民学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工友俱乐部，逐渐地把工人组织起来。1924 年 9 月，党在工厂最多的沪西小沙渡首先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由项英任俱乐部主任。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沪西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在五卅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接着，在沪东杨树浦成立了工人进德会，由蔡之华负责；在吴淞成立工友俱乐部，李立三除了主持全面工作以外，还亲自兼任这个俱乐部的主任。

在筹建吴淞工友俱乐部的时候，李立三有一天和邓中夏坐火车同去吴淞。那时，李立三还用着“李隆郢”的名字，邓中夏对他说：“你这个名字，笔划太多，今天要选举，工人不好写，也难认得，改个简单的吧！”这时，正好迎面站着三个人，邓中夏建议他改名为三立。李立三笑了笑，说：“三立不大好听，就叫李立三吧！”从此，他就用了李立三这个名字。

李立三等领导成立了几个工友俱乐部，工作很有进展。不到三四个月，沪西俱乐部的会员就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到年年底，会员已近两千人。党组织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1925 年 2 月初，沪西区内外棉八厂因日商野蛮殴打女工和无理开除工人而开展罢工斗争。党中央和上海地委对这次工人罢工很重视，专门组织了领导罢工的委员会，由李立三、邓中夏、项英等负责；同时决定调上海大学学生刘华、杨之华、郭伯和等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工作，党通过俱乐部对斗争作了具体的部署。李立三等运用安源罢工“哀而动人”策略口号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既反映了工人的迫切要求，又唤起民族自尊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这次罢工斗争从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开始，不久，全市 22

家日商纺织厂 3.5 万多工人卷入了斗争，形成罢工高潮。罢工坚持了 20 多天，日本资本家被迫央请中国商人出面调停，基本上同意了不得虐待工人和无理开除工人等条件。2 月 26 日，劳资双方签订了复工协议。3 月初，罢工胜利结束。

二月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序幕。这次罢工胜利后，工人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工会的力量，工会组织迅速发展。不久，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拒不履行复工协议，无理开除工人，并借故宣布停工，引起了工人的再次反抗。5 月 15 日，内外棉七厂日本职员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余名工人，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成为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这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地委开会。当传来顾正红被杀的消息后，会议立即决定派李立三赴沪西小沙渡了解详情，指导行动。李立三一到小沙渡，就以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刘贯之、陶静轩暨全体 2.5 万多名工人的名义，起草了《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揭露日本资本家虐杀中国工人的新暴行。工人迅速将呈文印成传单，在全市广泛散发。

第二天，沪西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 7000 多工人奋起罢工。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斗争，5 月 18 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正式成立，选举了筹备董事会，李立三任会长。随后，总工会筹备会就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5 月 28 日，党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联合会议，研究当时形势和党应采取的策略。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罢工斗争的形势，指出“在这种形势下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工人的斗争，蔡和森同意李立三的看法。李立三等也支持蔡和森提出的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的主张。会议决定 5 月 30 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杀害顾正红和逮捕工人、学生，同时联合资产阶级反对租界当局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等法案，争取各阶层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帝国主义。

5 月 30 日，2000 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发表演讲，进行反帝宣传。下午，有百多人遭到巡捕逮捕，引起了学生、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愤怒的群众约有近万人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许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晚上，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建立各阶级反帝联合战线，发动全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会后，李立三立即召集各工会干部在宝山路开秘密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部署了三罢的斗争。

5 月 31 日晚，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会议推选李立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即秘书长）。上海总工会成立后，下令全市各行业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政策，实现总同盟罢工。

6 月 1 日，上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许多城市和县镇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也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为了加强对上海各界人民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各界团体共同组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6 月 4 日，上海工商

学联合会宣布成立，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四个团体各派六人组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拒绝加入。李立三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6月7日，工商学联合会根据中央的精神，在反复磋商后确定了17条向帝国主义交涉条件，内容包括取消戒严令、释放所有被捕华人、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等。当天下午，李立三等将这些条件送交政府特派员，要求据此严正交涉。

与此同时，在买办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的策划下，上海总商会成立了“五卅委员会”，另拟了向帝国主义妥协的13条交涉条件，取消了17条中属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内容和维护工人基本权利的条款。6月17日，在李立三的组织下，上海总工会等几十个团体在闸北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斥责总商会删改17条，对他们的“示弱退让”进行了斗争。

在五卅运动期间，李立三是活跃在斗争第一线引人注目的人物，而上海总工会又是领导各界人民反帝斗争的核心组织。因此，李立三和上海总工会成了帝国主义攻击的目标。据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载：工部局认为，要结束当前的紧张局势，必须将李立三等六人“严加惩处”，并将上海总工会等四个机构“封闭”。

在这种背景下，8月22日，帝国主义雇用了一批流氓打手包围了总工会，将工会干部八人打伤，屋内什物捣毁一空。他们还企图杀害李立三，但李立三受到群众的掩护，机智地脱了险，这个反革命阴谋遭到了失败。

这时，罢工斗争已坚持了两个多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有成果，准备长期斗争，决定有领导、有组织地复工。李立三、刘少奇亲临第一线，具体解决复工中的种种问题。工人在争得基本的经济政治权利后，在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复工。

当上海大部分工人复工后，9月18日，帝国主义指使当时统治上海的奉系军阀武力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这时，党中央已派李立三去北京工作。

这年10月下旬，李立三又受中央派遣，同蔡和森、向警予、李一纯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李立三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经过，吁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支援中国革命。随后，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到第二年4月下旬，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广州。

李立三的革命生涯是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开始的，1925年，他在上海二月罢工斗争和五卅运动中又作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赫赫有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后来谈到他在上海这段革命经历时，再次强调毛泽东当年在开展安源工人运动时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他说：“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1924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以后，李立三奉中央之命到汉口去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办事处于9月17日成立，由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直接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湖北地区和周围各省的工人运动空前活跃。这年12月中央召开特别会议时，李立三站在工农群众运动方面，不同意陈独秀关于限制群众运动的言论和政策。会后，李立三参加湖北

区委兼汉口地委，分工负责职工运动。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李立三都出席了会议。当时，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很不满意。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但大会没有采纳，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的地位已高于毛泽东。5月30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李立三任中央工人部部长，成立以他为首的七人组成的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同时，李立三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同年6月，李立三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7月12日，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经党中央决定，李立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奔赴广东，在潮州、汕头一带遭到强敌围攻而失败。李立三离开了部队，经香港到了上海。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被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在香港、广州地区进行恢复广东省委和党组织的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上，他在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上作了重要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李立三因为参加南昌起义，没能出席八七会议。这次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和李立三都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 被领导与领导

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李立三率领广东代表团出席，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和文件起草工作，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时他正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创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在党的六大上，毛泽东和李立三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毛泽东与李立三成了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毛泽东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共六大决议运用到革命实践，创建和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

## 认真贯彻六大决议

六届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是向忠发。

1928年9月，李立三和向忠发、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先期从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那时，李立三化名“萧柏山”，租了一栋房子，以古董商身份为掩护，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开始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六大以后，周恩来在莫斯科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苏兆征是第二年1月回国的，2月病逝上海。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因顺直省委所犯错误牵涉到他，被解除了职务。1928年11月，李立三接替了蔡和森，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还有一位政治局常委项英，主要负责职工运动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

李立三在六届中央工作了两年，在最后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他在六大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六大的正确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李立三回国工作后，新的中央需要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决定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那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了北京和天津，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讨奉战争取得了胜利。1928年年底，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表示服从南京政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只是表面上的，暂时联合的蒋、冯、阎、桂四系，在讨奉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卷入了新的分赃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趋向激化。但在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党政府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蒋介石决定实行裁兵、统一财政和统一交通等政策，力图巩固其大地主、大买办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各地

的党组织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民党区域的群众斗争，在 1928 年济南五卅惨案以后开始出现复兴的形势。尽管如此，但从总体上来说，反革命势力仍然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中国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当时的形势正如六大决议指出的，还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

李立三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他在广州起义失败一周年后著文指出：“英勇的广州暴动失败了，在革命形势上从五卅发动的革命高潮因此过去，但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始终没有解决，……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同时，他针对群众斗争出现的复兴形势强调说：“现在群众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的确有不少的弱点，需要我们有极正确的策略和极艰苦耐心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涨必然很快的到来”，“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那时，由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严重，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思想还未彻底肃清，一些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不少问题。消极涣散的状态严重存在，工作作风不够深入。不注意发动日常小的经济斗争，不善于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李立三注意到这些问题，并着力去整顿党的组织，克服各种不正确的倾向。1929 年 1 月，李立三发表了《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一文，逐条批驳了“革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党没有办法”、“现在的人（指党的负责者）没有办法”等等各种悲观消极论调。李立三满怀激情地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利害的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样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充分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同时，李立三又指出，以为白色恐怖大厉害，敌人很强大，因而产生革命没有办法的想法，只是看见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已经深入广大群众，无论工人农人或其他贫苦群众都知道共产党是拥护他们利益的，只要我们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运用得宜，便很容易团聚广大的群众”。要改进工作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反对命令主义的作风。李立三批评有的区委工作方法中的命令主义，“使党的组织一天一天缩小，使同志都渐次畏缩起来”。

为了大力争取群众，李立三还提出要注意发动日常的“小斗争”。他说：小斗争“是群众日常生活痛苦的斗争，如打人，罚工钱，在车间吃饭，放工不开大门，马桶不置盖……等。这些问题是群众时时刻刻感到的痛苦，每个人都感觉到的痛苦，很易为发动起来，同时也很易为得到胜利”。为了发动小斗争，他号召党内的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去，因为小斗争“不是我们脑筋中想得出来的，而是要深入群众中去，找出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在群众中鼓动他起来斗争”。李立三还进一步阐明发动小斗争的意义，他说：“我们不

---

李立三《开辟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1928 年 12 月 4 日《红旗》第 3 期。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 年 3 月 1 日《布尔塞维克》第 2 卷第 5 期。

李立三《每日的教训》，1929 年 1 月 18 日《党的生活》第 2 期。

李立三《每日的教训》，1929 年 1 月 1 日《党的生活》第 1 期。

李立三《每日的教训》，1929 年 1 月 18 日《党的生活》第 2 期。

是主张一个简单的去注意群众的小问题，而是要在这些小的问题中去训练群众，使群众明了他的总的政治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的涣散无组织现象有了改变，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肯定了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少数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走上右倾取消主义道路。党中央和李立三同托陈取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针对陈独秀等人的非组织的派别活动，1929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发展，一定会形成许多无原则的反对指导的集团，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央必需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

1929年8月，李立三为中央起草了《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大纲》系统地批判了托派思想理论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错误主张，并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驱逐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所以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那种不了解革命性质，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反对土地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完结，只有坐待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观点，就“无异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统治的延长”。为了挽救陈独秀等人，《大纲》写道：“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斯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但是，陈独秀等人仍然坚持错误，于同年9月成立秘密托派组织；陈独秀还在8月至10月间，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从托派的立场上，集中攻击党的六大路线，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10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系统地分析了托陈取消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并警告陈独秀等人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仍执迷不悟，拒不接受中央的警告。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决议案，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四入党籍的决定。

李立三在中央工作期间，注意到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经对毛泽东、朱德十分推崇，撰写过文章赞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并报导他们的战况。文章写道：“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便是农村武装斗争的先锋。……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1929年“4月初，朱毛由长汀退出，折古城，至瑞金，于是赣南的豪绅地主，大起恐慌。最近两月间，朱毛的大队，往来于闽、赣、粤之边界，国民党的军队，四面会剿，但终于‘劳师无功’。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1929年6月15日，李立三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等的指示信，介绍红四军的游击战术经验。指示信中写道。“根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的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

李立三《现在全国宣传工作的任务及其缺点》，1929年2月4日《党的生活》第4期。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据他们说，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这封指示信所说的红四军经验，就是这年4月5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央时所提到的有关游击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指示信表明了当时李立三是赞同这些战术原则的。

1929年春夏，李立三还和周恩来一起，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至古田会议期间，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中的正确领导，解决了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的争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红四军的发展及其内部争论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为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先后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

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湘赣边界根据地，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根据地。这年5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毛泽东为书记。

红四军成立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内部在军队建设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那时，反动统治在南方暂时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毛泽东等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湘敌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赣敌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由于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在1928年4月至7月的多次战斗中，红军都取得了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却有一个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中央认为，湘、赣、鄂三省暴动的发展形势，是沿着湘粤大道与赣边发展，一直到鄂南成为一个区域，并与广东北江相合。而湖南则是三省暴动的中心。这显然是对形势的一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估计。

中共湖南省委不顾当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的严峻形势，于6月间作出决议，并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求毛泽东“须随军出发”。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于6月底来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指示。毛泽东不满意省委的瞎指挥，对“钦差大臣”传达省委的指示力持异议。

6月30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

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省委关于红四军开往湘南的指示。会上，毛泽东等大多数认为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不与农民运动结合，远距离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会议决定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而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新的决定。

几天之后，毛泽东综合了永新联席会议的意见和决定，给湖南省委写报告，申述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的具体理由，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7月间，红四军分兵两路迎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杜修经乘毛泽东等远在永新之际，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官兵想回湖南宜章家乡的情绪，在湘赣边境的沔渡引导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朱德、陈毅未能说服、制止部队的错误思想，又担心他们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就决定第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毛泽东得知红四军主力开往湘南，立即写信并派人送去，说明必须按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行事，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要求主力经茶陵回井冈山，但军委仍未能阻止主力往湘南开。途中，在杜修经支持下，军委召集扩大会议，决定照省委指示将军委改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书记，毛泽东以军党代表名义指挥边界的第三十一、三十二团，前委指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往湘南，实际上撤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开往湘南的红军部队在郴州先有少胜后遭失败，结果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在红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乘虚而入，闯进根据地，占领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地带，因而招致湘赣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通常称为“八月失败”。8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得知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败，心急如焚，立即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直奔湘南迎接受挫的部队。8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城同朱德、陈毅会面，随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等人的错误，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这次会议还取消了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事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后在11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受毛泽东批评过的杜修经，在这年12月11日到上海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报告红四军发展和“八月失败”的情况时，也十分钦佩地说：在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

“八月失败”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湖南省委及巡视员杜修经，但红四军内部也有责任，它表明了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内部在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就已经有了认识上的分歧。

1928年底至1929年初，国民党又调集湘赣两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在这期间，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192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的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敌人封锁给根据地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以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

井冈山转战赣南，继而挺进闽西。

红四军在下山后的最初阶段，处境艰难，屡陷险境。2月11日，在瑞金县的大柏地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被动的局面。随后在吉安东固地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东固游击区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是秘密割据形式，敌军来了便于掩护，敌军走了马上可以开展工作。毛泽东十分肯定这种“游击秘密割据”的经验。红二团、红四团还很重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后来说过：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的领导，那时他们也帮助红四军加强了党的领导。

不久，江西敌军向东固进逼。这时，毛泽东得知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十团，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前委就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动不居的打圈子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随后，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撤离东固。

3月上旬，红四军趁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机，向闽西急进。3月14日，在长岭寨全歼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城。红四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初步开创了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这时，由于在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很大，同时，军内和党内又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织状况比较复杂，因而带来了思想状况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内部对党的领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的不同认识突出起来。

红军人员本来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式军队，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四军党组织又是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因此，在红军中必然要受到农民意识、雇佣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主要的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上，则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如何建设一支中国式的红军，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在部队中经常有各种争论在展开。这场争论涉及到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等问题。

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但是，红四军内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并且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他们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但又反对自上而下的军队内部民主制度，认为这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上，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他们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军队只管打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在前委收到中央2月7日的来信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4月间前委召开于都会议开始，争论逐渐发展到基层。

## 中央二月来信和红四军前委的复信

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后，国内形势有了变化，蒋、桂即将爆发一场战争。红四军前委分析了形势，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于3月20日给中央写了信，提出了红四军前委的一个战略计划，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红四军、红五军和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分兵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使之与湘赣边界根据地相连接。并且强调这一计划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封信还向中央建议：“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它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形成前进了一步。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在革命高潮到来尚远的时候，建立和扩大根据地是徒劳的，主张集中兵力，广泛游击，走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道路。

这时，中央也没有采纳红四军前委上述的计划和建议，却转来了指令分散红军的2月7日来信（史称“二月来信”），这同前委从实际出发计划割据20余县的战略方针，形成很大的反差。

中央二月来信是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演说的精神写的。布哈林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对农村苏维埃运动表现了悲观思想，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提出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而且，在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悲观思想也影响到了中央。在起草“二月来信”的前几天，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1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中央军事部长根据敌伪报纸报道作报告说，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在大余失利，遭到强敌尾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并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指示信（即“二月来信”）。李立三是同意写这封指示信的，他在会上发言说，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

中共中央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指示信还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央这时下了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一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以贯彻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央于2月16日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

队和“危险地”。为确保安全通过国统区，转移敌人视线，“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朱毛已经打死，或说朱毛已经（出国）的地方如南洋或安南”。那时，上海《申报》果然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及死者五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查中”。这个消息当然是个讹传，朱德、毛泽东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他们仍然在坚持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央为了调朱、毛出来，可谓费尽了心思。

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辗转送达的中央二月来信。两天后，即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认真讨论中央的来信。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精神给中央写了复信。复信一开始就坦诚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针对二月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观点，复信根据中国的情况说明“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并且进一步指明：“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复信明确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还从四个方面阐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离开理由，表现了政治上的极大勇气。复信最后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积极进取，采取“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

1929年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对二月来信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4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认为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在4月7日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毛泽东、朱德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实际上调朱、毛出来的事就此作罢。到了6月初，中央收到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复信，开始了比较彻底的转变。在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2月7日的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的”，“现不仅应主张集中而且应扩大，从各方面看，过去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是在中国，当然所谓集中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集中”。李立三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发言完全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军不能分散的意见。

尽管中央后来不再坚持“二月来信”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的意见，但来信中的一些悲观情绪和不正确的观点，在红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就使红四军内那些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有了依据，增加了争论的借口。有的同志还利用“二月来信”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于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有了发展。

中央所派的军事部长罗寿南，于4月11日在都出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二月来信指示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四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

## 外来形式主义促使红四军内部争论激化

1929年5月上旬，李立三、周恩来等派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又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虽然他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并在后来10月间的东江战役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党内这场争论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作报告、发议论。在中央已经对分散红军的2月指示改变了看法的情况下，他仍竭力贯彻“二月来信”精神，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长期存在，应该分散，他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的现实，从苏联带来形式主义理论，照搬苏联红军的一套办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本来，军委是前委的下属机关，现竟然作出限制上级权限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

这样，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为争论的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内部本已存在的有关党对军队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争论。5月底，在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说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不定的环境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如果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是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这种意见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6月8日，毛泽东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军委。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要不要军委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尽管白砂会议上解决了要不要军委的争论问题，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触及和解决本质问题，在党和军队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刘安恭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和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全都归咎于毛泽东。他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领导人有两派，把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不赞成中央二月来信关于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的指示的同志，说成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把执行中央指示甚至是错误指示而造成“八月失败”的同志，说成是“拥护中央派”。这样，在红四军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对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早有觉察，他力图纠正红军中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也力图解决红四军党内领导人之间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1929年6月1日，他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但当时党内的状况并未具备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因刘安恭等人的意见使前委无法继续工作，而写

了一份书面意见，其中说道：前委、军委成为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白砂会议虽然作出了决定，但是，“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毛泽东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最根本的是关于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问题。

复信批判了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的观察。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也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高度进行分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份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复信还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复信作了分析和批评：“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说明他仍请求离开前委，但并不是消极的，他会和大家一起参加思想斗争。他相信争论最终会得到解决。这封信具有深刻的意义，为后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争论问题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省龙岩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22日，在龙岩城一所学校内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本来打算这次大会要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但是，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会议由继任的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上，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于是，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争论，会场空气紧张热烈。大会开了一天，通过了决议案。这次会议有些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如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等。但是，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

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认为“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集权制领导原则”有“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这对以后的工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没有分清是非，正确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这次会议未经中央同意，在中央并没有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在选举前委时，原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偕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等地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打破闽、粤、赣三省敌军“会剿”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之后，红四军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弱，红四军内部的不良倾向更加严重。1929年8月，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失利。后来，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三个纵队进军广东东江，在梅县受挫，兵力损失三分之一，不得不返回闽西。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大会曾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毛泽东当时正发作疟疾，他坐担架赶到上杭时，会议已经结束。

10月下旬，毛泽东离开上杭到苏家坡休养，后来身体逐渐复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造谣说，毛泽东在闽西死于肺结核病。当时中共中央知道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指导工作和养病，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不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从别的渠道得到毛泽东“病故”的消息，信以为真，经过慎重研究，起草了一份评价很高的“讣告”，发表在第二年3月间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长达1000多字。

### 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的建军原则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陈毅认为大会的决议只是个折衷的决议，“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他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1929年7月下旬，因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陈毅去上海之前，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但是，双方意见未能统一。由此看来，解决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只有等待党中央的决断了。

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由福建省委转去的陈毅的报告和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等（还包括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信和刘安恭等人的信件）后召集会议，就中共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指出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不正确；刘安恭的争论文章许多不符合事实，有意制造派别纠纷，要立即把他调回中央。李立三在会上说：还有一点中心问题要指出，现在国内斗争很激烈，党内纠纷应绝对禁止。刘安恭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尤其不

应该在下面发展派别活动。前委不能解决的问题交来中央。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目前一定要比较集中一点，不然军事行动就没有办法。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起草了8月21日《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提出批评，认为大会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认为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以及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指出：“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在组织上“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这样才能便于作战；红军中“党的书记当然要更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红军“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的生长”。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

指示信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可惜的是这封信未能及时送到红四军前委。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后，很快同李立三接上了头。李立三和陈毅过去是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后来一起被押送回国。他们两人相见甚欢。陈毅先向李立三报告红四军党的七大的情况。李立三听完陈毅的汇报后，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这几个材料是：《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召开会议，李立三、周恩来等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会上，陈毅对毛泽东作了很好的评价，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再召开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

两天之后，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红四军党的七大争论的详细汇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汇报以后，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人委员会在中央八月指示信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并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这封指示信（通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发出。

指示信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指示信强调红军的根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应同时扩大等

等，就明显地改正了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

指示信对红军分散与集中的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经历了“二月来信”、4月7日指示信和6月12日讨论红四军前委4月5日来信的变化，“九月来信”在这个问题上既解决了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错误思想，又是中央在实际上作了自我批评。

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建军建党的基本原则，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党对红军领导的问题，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指示信还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了下列几点批评：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指示信要求前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

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决定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选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核心，这是“九月来信”极其重要的精神，也是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

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广东回闽西。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10月22日，陈毅在广东梅县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和朱德会面，简单地讲了一下中央指示精神，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当晚，前委召集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派专人将“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11月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长汀城后，中共红四军前委依据中央指示，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

在红军占领长汀城的第四天，11月26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偕同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到达长汀，与朱德和陈毅等会合，互相作了检讨，消除了隔阂。毛泽东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复职，陈毅向他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他的问候。

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出席在长汀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在团结民主的气氛下举行，一致认为要对红四军进行整顿和训练，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以及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

这时，毛泽东感到中央对他很大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后来回忆曾说到：关于红四军的问题，李立三处理得好。就在 11 月 28 日这一天，他接连写信给中央和李立三。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上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信中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外，还求购书一批，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毛泽东的复职，使中共中央放了心。1930 年 2 月 1 日，中央就红四军行动问题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到：红四军攻梅县的失败，在政治上的损失确比军事上的损失大，原因自当归咎于四军内部党和政治工作的破产。谈到毛泽东的来信时说：“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只是声明目前环境所限恐须先在闽西深入”。信中还讲到“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更是充满了友谊之情。信的全文是：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由于李立三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工作，正确地处理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昔日战友深切的怀念。

## 古田会议召开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以后，为了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同朱德、陈毅一起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对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和大家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9 年 12 月 28 日、29 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简称古田会议）。大会仍由陈毅主持，他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并有多次讲话。朱德作军事报告。到会代表

---

指陈独秀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

热烈地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核心部分。

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批评了不愿意做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寇思想，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

决议案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案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为此，决议案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并提出纠正的方法。

决议案在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指出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其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作出的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来做，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长时期的指导作用。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11 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由于条件成熟，准备充分，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会后，决议案印发到部队，供大家学习和贯彻执行，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四军随后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到：“全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对于各种工作路线都有具体决定，九次大会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次大会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的历史”。

红四军党的七大至古田会议期间，是中国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期。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建军问题艰苦探索，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最终在党中央正确意见的指导下，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在这段时间内，李立三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依赖和支持，以及中央九月来信的形成，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开好古田会议，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 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以及其他有关红四军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单靠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和陈毅的汇报，也很难形成中央的正确意见和九月来信。

在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关系中，李立三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是他们在安源工运中共同战斗之后又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 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古田会议决议作出后不久，毛泽东没有满足古田会议已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是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即如何从理论上回答中央二月来信反映的和红四军存在而为中央九月来信所明确指出的“红军中右倾思想如何取消”等问题。恰在1930年元旦，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要求进步，写信给毛泽东征求批评意见。林彪曾在1929年5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和一些同志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过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毛泽东当时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过批评。在这次收到林彪的来信后，毛泽东趁此机会，经过几天思考，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村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毛泽东在信中说：“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在信中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

这封信还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的观点，重申“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

这样，毛泽东集中大家智慧，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当然，这个理论在后来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趋于完善。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次日率队离开古田，向赣南进发。2月初到达吉安陂头时，于这月上旬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在赣西南进一步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5月，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攻克江西省寻乌县。这时，毛泽东深感党内和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而且进一步说明，要到群众中去作实际的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文章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

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实际上初步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

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到 1930 年，他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以农村为中心，并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和主张，为当时中共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领导所不赞成，并且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李立三本人的批评和指责。

## 毛泽东抵制立三路线

### 立三路线的形成与推行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至古田会议期间，李立三虽然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党内争论中的正确主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已开始出现分歧，在1930年以后，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李立三则脱离中国的实际，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动统治的危机，坚持城市中心论，并由此发展成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

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重新滋长不是偶然的。从党的六大起，这种错误思想就开始逐渐地发展起来。

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的分析，对党的任务和政策的规定，是基本正确的。但是，这次大会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六大决议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的作用，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而且认为全面实行武装起义的革命高潮很快会到来，那时就可以使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之内取得胜利。因此，大会虽然着重地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六大决议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依据。

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革命力量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却进一步地激化，1929年3月以蒋桂战争为起点，开始了长时间的各派新军阀的反蒋混战。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大城市的力量还相当强大，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也未临近崩溃，敌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可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起来。

当时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又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1928年7月至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次大会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已进一步地瓦解，它必然会引起一个新的冲突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在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间，共产国际又接连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和决议案。这些指示信和决议案都着重反右，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不断地推向“左”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发来的指示信，它改变了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正确结论，武断地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也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准备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和决议案对中国党来说，是带有指令性质的，而党内一些领导人存在着教条主义思想，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这样，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那时李立三是党中央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和党内不少同志一样，在党

的六大以后并未能从根本上肃清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长期以来，他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没有深入过农村，不甚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又缺乏调查研究，总想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观察问题片面，往往夸大某一方面的情况而忽视另外一些情况，不能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这些都使李立三容易接受和发展“左”的错误主张，也是他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思想认识逐渐地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在1929年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接连发来的几次指示对李立三有很大的影响。李立三在3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的危险。经他修改的第三十三号中央通告明确地说：“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这年秋，党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说中国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李立三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1929年11月间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第二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上阐发了这个观点。他在会上的讲话中，过高估计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完全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与主观力量没有关系；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而直接革命形势就是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主张目前就应该行动，布置各地武装暴动。

一个月之后，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更迅速的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并且指出“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显然，这是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的主张和策略，同毛泽东所实行的以农村为中心的主张和策略截然相反。

到了1930年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的战幕即将拉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那时，毛泽东、朱德等正在赣西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引起党中央的不满。这次会议批评了毛泽东、朱德，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李立三在会上作报告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他还说：“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目前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要注意全国的配合，采取更急进的策略。“对朱、毛亦应根据这形势有新的指示”，把各地的力量汇合起来，“便是全国总的暴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到十天，党中央于2月26日即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中央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决定红军在战略上与战术上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

1930年3月初，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李立三成了中共中央的主要决策人。在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李立三的“左”倾思

想急剧发展起来。

三四月间，李立三接连在《红旗》报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文章。5月，他把所写的上述六篇文章汇编起来，题为《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在《布尔塞维克》杂志重新发表。李立三在文章中，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并且指责毛泽东等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

最形象地表述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的，是下面这样一段话：“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为此，李立三在文章中认为要“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并且明确地指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同时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周恩来出国后，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3月10日开会，确定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城市。李立三明确指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争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上有人把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4月3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指出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猛烈的扩大”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信中肯定地认为“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这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相继攻克了江西南部的南康县、大余县，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李立三对这一行动很不满意，在这一封指示信中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这是“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并且严厉批评毛泽东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随后，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又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1930年5月爆发了酝酿已久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次军阀混战，历时半年多，双方投入作战的兵力多达100万人以上，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一次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国内的政治形势为革命力量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李立三的头脑更加发热。他错误地估计形势，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认为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从而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

这年5月中，在李立三主持下，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这两个会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和苏区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明显地反映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思想。如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而且这时的李立三已经改变了自己在去年6月间给贺龙等发出指示信的观点，认为“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苏区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并且明确指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前面，迅速地准备我们的伟大的武装暴动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

接着不久，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开头就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的前面”。在这种形势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而最有可能首先爆发这种革命高潮的地方，便是上海或武汉。李立三在报告中点名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立三批评毛泽东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而他认为游击战术是不适合当前战争的需要，现在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同日，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信红四军前委，要求红四军执行中央指示，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扩大政治影响，并帮助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

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李立三6月9日的报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为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并再次批评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决议中，还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随后，李立三又主持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间，李立三得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之后，兴高采烈，冒险行动又有发展，他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高峰。

6月15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之后，中央又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一开头就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这封信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把这些所谓“错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的“割据观点”；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最后，指示信严厉地说：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从这封中央指示信中所列举几个方面的问题来看，恰恰说明了毛泽东、朱德等所坚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却不顾实际情况，一再要红四军前委转变路线，也就是要毛泽东、朱德等把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执行他们的直接夺取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 红一军团佯攻南昌

1930年6月，红四军由江西重新开回闽西，在长汀休整。六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址先在长汀县南阳（今属上杭县），后移汀州城（这次会议称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会议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会议期间，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派特派员涂振农从上海来到长汀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会上作了两天报告，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对赣南、闽西的红军进行整编。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央关于各路红军的发展路线是会攻武汉的指示，把原决定向赣东游击、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进攻的策略，准备夺取南昌、九江。

这是李立三主持的中央驱使红军去攻打大城市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对这个计划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这是当时党中央的决定，而且不少同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没有认识，这样，就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意见，在联席会议上也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朱德后来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是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需要处理好这样一个问题：既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同时又要能团结争取受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的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使红军的战争顺利地向前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红军在进军南昌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灵活的方针。毛泽东当时和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说过：“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在汀州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样，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但是并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

红一军团开到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7月11日，毛泽东、朱德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今清江县城）推进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命令没有按中央的指示说要“夺取”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这就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表明打下樟树后将看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红一军团在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淦（今新干）。7月24日，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两个营，攻占樟树镇。这时获悉敌军第十八师一个旅坚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今临川）地区，一个旅在吉安北阜田地区，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向东攻打抚

---

见樊昊《毛泽东与郭化若》，载1993年第5期《人物》。

州，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向北夺取南昌、九江？毛泽东随即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军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决定既不向北夺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打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两处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于是，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毛泽东在8月19日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报告。信中说：红一军团攻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淦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

毛泽东、朱德率部西渡赣江后，向北前进接连攻下高安、上高等十几个县。7月30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离南昌城约30里处。8月1日派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南昌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敌军不还一枪，更不敢出击。红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撤离南昌近郊，转至奉新、安义地区，在那里休整待机，并进行扩军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这段战斗历程充分地说明毛泽东、朱德的决策是高明的。他们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既不强攻南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灵活地改变了部队的作战方向，以实际行动抵制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

红一军团在奉新时，前委获悉湖南敌军何键部向红三军团攻击前进，而红三军团曾经一度攻占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红一军团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歼灭敌军，决定向湖南西进。8月18日，毛泽东率队进到赣西万载县黄茅市时，从情报中探知追击红三军团之敌何键部第三纵队四个团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孙家一带。红一军团为了援助红三军团和消灭敌人主力，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奔袭该敌。20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进攻文家市，全歼敌军第三纵队三个团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这时李立三等仍坚持汇合各路红军进攻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一封信，指责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又说：“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信中要求“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

红一军团打下文家市后，8月23日，毛泽东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浏阳永和市，与由平江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两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两

个军团，共三万余人。

在永和召开的联席会上，就李立三关于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以及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讨论。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不少同志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坚持主张进攻中心城市，他们认为上次红三军团自身都能攻占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在一起配合作战，更有把握打胜。

红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确实取得了显赫的战果，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这次战争也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红军乘虚攻占某个城市是可能的，但企图固守大城市，则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后来对红军攻占长沙有过这样的评述：“如果第一次的占领（指攻占长沙——引者）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在永和市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攻下。朱德也表示怀疑，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要攻打敌人坚强防御的长沙、武汉，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被消灭。但是，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攻占长沙。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行动目标。8月底，毛泽东、朱德率部进抵长沙近郊。这时获悉长沙城内有敌军三十一个团，而我们的兵力共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敌人的兵力多我一倍多，而且敌有较好的装备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张诱敌出击，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进而逐个加以歼灭，然后乘胜攻入长沙。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六字诀：“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但是，敌军除9月3日由猴子石出击被歼两个团外，一直坚守不出。这时，我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军再次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红一、三军团连续多次向敌军阵地猛打猛冲，但仍未攻入长沙，而我军却遭到较大伤亡。后获悉国民党驰援长沙的桂军已进抵湘潭，形成对我军不利形势。毛泽东当即决定将红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时各个歼灭之，经过对干部的说服教育，毛泽东和朱德在9月12日下令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地待机，第二次攻打长沙就此结束。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1930年“9月13日（应是12日——引者）下午八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军撤围长沙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初步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并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这次会议决定回师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江西，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并先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同时开展群众工作。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1页。

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上）》，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

9月17日，毛泽东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报告分析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是：一、“未消灭敌主力于筑工事之前”；二、“群众条件不具备”；三、“技术条件不具备”。并且说：“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更明确地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了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

这次进攻长沙，从诱敌出击到强攻失利后调动部队到机动位置，再把部队分散到萍、醴、攸三县，最后决定一军团进攻吉安，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这样，毛泽东一步一步地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出，并把部队从湖南带到了江西。撤围长沙，也就是在战争的实践中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也有助于在随后的红军战争中继续纠正和抵制这种“左”倾的错误。

### 不打南昌打吉安

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在白区，两个多月内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党组织几乎被全部瓦解。各路红军奉命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也先后陷于失败。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的不满，也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指示，但是李立三又有所发展。他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有过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想法，但在形势有利时，他骄傲狂妄，所实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既造成了对革命的危害，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例如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取消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等，是共产国际所不同意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后来，经过酝酿和准备，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从而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这次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重视根据地和红军的问题，决定在会后派人到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全权领导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对以后事态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李立三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的的工作，实际上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和交通梗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直到这年12月间才传到在江西的红一方面军党内。在这之前，在红一方面军中特别是红三军团不少领导干部仍遵循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坚持要进攻中心城市。所以，自长沙撤围以来，在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上屡次发生争论，毛泽东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切实措施，以极大的忍耐心，继续说服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的意见，在实践中纠正“左”倾错误，使红军战争顺利地向前发展。

1930年9月28日，红一方面军到达袁州，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仍然是行军过程中争论不休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坚持按原计划先打吉安，但是，一部分干部却主张攻打南昌、九江，认为攻打大城市是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会议争论很激烈。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则无把握。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还是按原来的决定，红一军团攻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敌军的警戒任务。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在袁州发出命令，令红一军团于30日向吉安前进。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再打长沙。周以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同毛泽东、徐特立、何叔衡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农民讲习所工作过，与毛泽东很熟悉。周以粟一到袁州，就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他亲切地通宵叙谈，阐述打长沙与打吉安的利弊，说明没有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运动的配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依靠单纯的红军攻击，是很难占领大城市的。最后终于将周以粟说服，使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9月30日，在周以粟的支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再次开会。会议决定不再打长沙，也不打南昌，而是先打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吉安。赣西南重镇吉安是座孤城，长期被我江西地方武装围困，它周围又都是红色区域。打下吉安，可以使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扩大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进一步经营“江西”。当时，受“立三路线”影响，热衷于攻打长沙的干部不在少数，把他们说服到来攻打江西的吉安，是在实际行动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的一个重要成果。

10月4日，红一军团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守城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所部及江西警察大队约四个团的兵力潜逃，当晚红军攻占吉安。随后，红军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干等地，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大为改观。

### 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

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后，在这里停留了十天。这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刚刚收到中央政治局6月决议和中央6月15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要按照党中央原来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10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吉安签发红一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在沿途，毛泽东主持召开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抵达峡江后召开会议，讨论对时局估量、行军问题、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并相应地作出决议。

这时得知国民党军阀中原混战即将结束，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判断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会议对时局问题作出正确的估计，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红军的任务必须为打败敌人的联合进攻作好准备。毛泽东对时局的这些分析，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关于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可能转变成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的错误估计。

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军方向时，毛泽东针对有人主张继续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免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当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有揭开，有的干部还主张要攻打南昌、九江，进而夺取武汉。所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大家所接受。这次会议还没有根本解决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对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会议也规定了正确的政策。10月19日，毛泽东给湘东特委写了一封复信，简要地说明了峡江会议的各项决议。其中讲到土地问题时说：“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关于资本问题，复信写道：“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平均土地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以及要对资产阶级开展“特殊战争”、“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武器”的过左政策。

由于一部分领导人坚持要进攻南昌，所以在峡江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0月19日发出《进攻高安的命令》，但是，命令只说：“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取而占领之”。这里“待机略取”的提法，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

10月下旬，蒋介石在中原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迅速调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时，国民党军谭道源师已全部开到南昌，许克祥、熊式辉师到了九江，金汉鼎、毛炳文两个师也进入江西境内，公秉藩师扎在抚州，湘敌罗霖部在袁州。以上各部，蒋介石命令统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一指挥。

鉴于敌情的变化，红一方面军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以后，毛泽东于10月23日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延缓进占高安，将部队布置在袁水和瑞川河之间，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创造战胜来犯敌军的条件。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罗坊。这时，敌情进一步恶化，敌军先头部队已开到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必须刻不容缓地确定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

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军“围剿”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当前敌情，指出敌军正准备进攻江西根据地，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改变，因此我军不能继续按原计划去冒险攻打南昌、九江。关于如何粉碎敌军“围剿”的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还是后退打？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赣江以西？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东渡赣江，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采取“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方针，充分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优越条件，实行人民战争，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部队中仍有影响，会议在开始时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做了许多的说服工作。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绝大多数与会者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6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决议案。30日，在获知敌军已开始对我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之后，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急会议，确定对敌军的大举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主力红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广大区域作战。

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克服了李立三“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留下的影响，基本上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内部行动方针问题上的分歧，用正确路线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战略退却问题时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极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从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开始，直到罗坊会议，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上一步步地克服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部队中的影响。在这期间，袁州会议是个开端，峡江会议开始了转变，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解决了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决定的战略方针问题。罗坊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发布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向赣江东渡作战略退却。11月上旬，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随后又撤退到根据地中心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这时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已传达到红一方面军军内，所以，这次总前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李立三“左”倾错误，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认识。会议还再次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认为：进剿的敌军有10万人，但兵力分散，战线过长，有利于各个击破。在来犯的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围剿”的主力军，各约14000人，而红军有4万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红军可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军阵线打开缺口，使东西诸敌分隔为远距离两个集团，有利于红军各个歼敌，这样，敌军的“围剿”就可以打破。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正面迎击敌人，红三军团迂回敌后，地方则准备好担架、粮食等。

12月下旬，国民党军进至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带，但找不到红军的主力，相反，部队部署东西相距八百里。毛泽东、朱德决

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在12月30日至第二年1月3日的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在龙冈地区歼敌张辉瓒主力近一万人，并活捉张辉瓒，在东韶歼敌谭道源师一半，其他敌军仓惶逃走，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定和运用成功，是在同“立三路线”进行激烈而又曲折的斗争中取得的。正如朱德所说：“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这样说：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在一九三一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在革命局势好转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它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所以，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认识，既留下历史的痕迹，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失误，例如在他发表过的一些文件中，也有反映“左”倾错误的词句和提法等。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是一开始就怀疑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的，并且进而在实际行动中抵制这种错误。在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又坚持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现出具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斗争艺术。在以他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下，经过同李立三“左”倾错误所作的激烈的曲折的斗争，终于使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改变了王明对犯错误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开始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随后又提出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团结李立三一道为党工作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次全会对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全会并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会议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而这时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评却升了温。在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0年10月通过《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同时，又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扶植下，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这时起，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论对实行正确路线的毛泽东，还是对犯错误的李立三等，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一共不到四个月，但却被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再利用和无限夸大。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李立三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在这次全会之前，他于1930年11月就已经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继续检查错误。随后，他羁旅莫斯科达15年之久，遭遇坎坷，饱经忧患，直到1946年1月才返回国内。

李立三这次能够回到祖国，是毛泽东起了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多次提到李立三的错误。他说：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他还这样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

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在酝酿中央委员会名单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像李立三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的。

这时的李立三仍在莫斯科没有回国。自1931年起至1937年，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李立三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他多次作过认真诚恳的检查，但仍长期地反复地受到批评。他曾经这样说过：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但还是不免受到斥责。王明还不准李立三回国，以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李立三于1938年2月被诬为“日本特务”，由苏联内务部逮捕入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出狱后，王明不怀好意，竟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西伯利亚，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周恩来那时正巧在苏联疗伤，为李立三说了话，才留在莫斯科。李立三出狱后曾经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信。

为了了解李立三在莫斯科的情况，毛泽东向苏共中央发了电报，说我们正在准备召开中共七大，中央和部分七大代表提议把李立三列入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希望苏联方面告知李立三被关的原因和主要情节。不久，从莫斯科的回电中得知，李立三在苏联这段时间作了些具体工作，但在工作中有过缺点，等等。于是，中央决定李立三为党的七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

在七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他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团结他们一道工作。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应不应该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毛泽东提名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说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是并没有解决路线问题。又说：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

由于毛泽东一再地做工作，李立三顺利地选上中央委员，他当时还在莫斯科，但选举他的票数竟居44名中央委员的第15位。

直到1945年底，李立三才得到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消息。在这年的除夕，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热情地接见了李立三，说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在中国党的七大上，李立三已被选为中央委员，问李立三愿不愿回国？这对李立三来说是出乎意外的，给了他极大的振奋。

李立三后来对他的朋友讲起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当时事出意外，我以为我听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我惊呆了，一时万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10多年，突然听到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怎样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当时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到现在也难于用言语来表达。在这位部长一再催问下，我只连声地说：‘我要回国！’这位部长又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在苏联还是保密的，他能送给我看，这是表示信任。我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汽车送我回到家，家人都喜出望外。这一夜，我顾不得吃年夜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了。书中的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吸引着我，引起我对毛主席无限钦佩和

崇敬的感情。”

## 李立三为党的事业作出新贡献

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国内时，先到哈尔滨。经陈云的介绍，他读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延安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文件和著作，对毛泽东深为钦佩。不久，李立三担任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和处理东北地区停战问题。6月，他乘军调部的飞机经北平去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李立三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和自己的情况，并再一次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毛泽东这次会见李立三时，仔细倾听他的汇报，同时他像当年李立三在长沙第一次向他报到时那样细心，看到李立三身穿美国军衣，就嘱咐后勤部门的同志给他发一套延安式的干部服。

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使李立三深受感动，他主动要求向延安干部讲一次话，毛泽东同意了。几天后，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长篇报告。李立三是个光明磊落、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报告一开始他就介绍自己是在1930年犯了立三路线错误的李立三，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使许多好同志壮烈牺牲，很对不住他们，决心以自己加倍的工作来将功补过。李立三的真挚和坦率，使大家非常感动。

李立三是心口如一的，他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后就忘我地工作。1947年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部长，在争取、瓦解敌军和配合我军战场上的对敌作战作了很大贡献。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大会选举陈云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陈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提议由李立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他说李立三同志是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全总工作。陈云的提议得到会议全体代表的一致同意。

1947年至1948年，李立三还负责东北局翻译组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和夫人李莎一起，组织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及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的俄文版翻译工作。《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版后来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大量发行，李立三对向国外宣传、介绍毛泽东思想起了重大作用。

1949年3月，李立三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将近20年来第一次参加党的中央全会，他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再次诚恳地检讨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表示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毕生精力。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的指示，不再回东北地区工作，他随同中央机关来到北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大会，是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委之一。10月1日，李立三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在主持总工会工作并兼劳动部长期间，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工人运动方针，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还针对新形势下工会组织面临的新问题，如工会与党组织及国家政权的关系，工会如何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以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某些矛盾等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

李立三认为，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和劳动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说，“公私兼顾”，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利益应该兼顾；另一方面是在公营企业中，国家利益和工人个人利益也应该兼顾。在公营企业中，兼顾国家利益与工人个人利益，就产生了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两者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遇到不一致时，必须说服工人要看到长远利益，同时也要照顾他们的眼前利益。当然，也不能因为要照顾工人的眼前利益，就生产多少，吃掉多少，一点积累也没有。因此，李立三指出，必须防止过分强调工人日常利益和忽视工人日常利益的两种偏向，如果只片面照顾一方面，都会产生不好的后果，都将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进行的积极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同党内一些同志发生了分歧。1951年12月，全总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定的方针是：“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改进工作，以便进一步展开全国工人运动，迎接国家的新建设任务”，会议开始时，李立三对全总工作中的缺点，主动地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但在会议进行中，并非会议代表的陈伯达到会，宣称“是临时到这里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但却有准备地发了言，给李立三戴上许多政治帽子，说李立三是从分配出发，不是从生产出发，“这是立三的全部错误”，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工会工作中的方针路线错误，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购买力的”，是极右的错误等等。陈伯达发言后，会议由总结经验发展成为专门批判李立三。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犯有狭隘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会后，李立三被调离总工会。后来证明，全总党组的这次会议和决议是错误的，李立三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工作规律所作的探索是有益的。

李立三在这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仍然振奋精神，积极工作，他继续主持劳动部工作，后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部副部长。在工业部副部长任上，李立三在工厂调查研究和组织省市工业部长会议讨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管理企业的思想。这项经验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上，并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推行。毛泽东对这一经验的总结很重视，归纳成“两参一改三结合”，后来又把它规定为“鞍钢宪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工业企业管理的指导原则。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李立三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会召开前夕，他写了一个大会发言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觉得可用，只在文字方面作了点修改。9月23日，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一开头就说：在党的七大到八大期间，我们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在

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中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斗争中确立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能够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央始终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他还说，他是在1946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经过学习，“才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术语，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原则创造了并规定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才知道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原则如何深刻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毒害，并且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一整套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方针路线。特别是当我听见说延安审干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九条方针’以后，拿来和我自己已经过的事情一比较，使我深刻感觉到在革命运动的巨潮中掌舵人的作用何等重要，领袖的作用何等重要。”

李立三在发言中，还一再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他说在学习了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以后，知道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希望同志们对他今后工作随时给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李立三的发言十分感人，他回国后在各种场合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时，总是那样称颂延安整风运动伟大，毛泽东思想伟大。

1957年2月27日，李立三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十分钦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好的方针而感到高兴。但是，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报告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提，当作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时，有“一点不愉快”，觉得很委屈和难过。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直率地表达了他的这点感受，希望党能够看到他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是根本不同的。他在信中说，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泽东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后来在报告公开发表时，删去了有关的段落。

1966年，毛泽东在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发动起来后，又失去了控制，使林彪、“四人帮”一伙钻了空子。他们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无限上纲，乱批乱斗，完全背离了我们党和毛泽东本人所曾经确定的处理党内斗争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李立三当时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任书记，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3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仍然没有放过他，要从他那里“挖掘”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李立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于是，中央文革操纵造反派，对他的斗争不断升级，给他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宣布他“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对他进行了多次残酷斗争。1967年6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明自己在历史上虽犯过错误，但他是忠诚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的，那些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捏造出

来的。李立三坚信自己无辜，希望毛泽东会再次对他伸出援救的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这样的信件是不可能送到毛泽东手中的，而毛泽东本人也已经无法控制住当时的混乱局面。

这封信还没有写完，一群来揪李立三的造反派闯到了他家的门口，他赶紧把信藏到褥子底下，随即就被揪走了。此后，他连续遭受批斗，还不准回家，被关进一套房子里。李立三经不住残酷的折磨，于6月22日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后，写下最后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悼词说：“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 毛泽东与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比前面讲过的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有很大不同。在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之前，毛泽东与他素不相识，既没有共过事，又没有工作上的往来。在王明一步登天、掌握中共中央大权之后，毛泽东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成了他的被领导者。他们之间也仅仅是工作上的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关系。

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统治时间只有几个月，最长也只有半年。当然，这些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失败或严重损失。然而，毛泽东恰恰在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在农村艰难曲折地把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国际”招牌和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号，吓唬住很多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干部，得以在中共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王明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扶上台的，在向忠发（工人出身）担任总书记时是党中央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在向忠发被捕、被杀后担任了代理总书记。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白区工作日益艰难，加上中共没有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王明乘机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并得到了米夫同意。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博古负总责代替自己的职位，继续向全党推行以《两条路线》为纲领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离沪赴苏联前夕，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中共临时中央忠实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继续执行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互相联系的两项任务；通过文件、电讯和派人向王明汇报情况，并争取指示。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研究和决策，必要时派人回国传达。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决议、指示，都由王明传达到国内，这样就形成了王明代表国际向中共临时中央发号施令，博古在国内照王明命令办事的局面。王明当时在莫斯科曾对同仁自鸣得意地讲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外国，主要关键问题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是说：我王明虽在国外，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都是由我王明决定的。尽管博古在执行过程中有某些发挥，但“主要关键”确实是王明“决定的”。所以，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最恰当不过的。它比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严重。

毛泽东是30年代初最早认识并坚决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苏区领导人之一。他也因此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经常打击的主要对象。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竭力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及其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他们对毛泽东排挤时间最长，批判最烈，打击最狠，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一个好端端的中

央革命根据地被他们断送了；同时，白区工作也遭受严重摧残，造成了我党历史上的空前浩劫。直到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才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完成长征，奠基西北，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总结历史经验，从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上批判了王明、博古的“左”倾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积极倡导并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洛川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确立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战形势发展很快。不久，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拐弯180度，又从“左”转为右，反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这在局部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危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纳王明的提议，派由他指名的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路线和策略，并反映中国抗战中存在的问题。共产国际知道了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理解了中共在抗战中的路线和策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中央：中共政治局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一切问题。这样，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纠正了王明的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为顺利地进行抗日民族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后，对王明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甚至达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可是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支持，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检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最后堕落成为一个死不悔改的人。

## 匏瓜与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毛泽东比王明大9岁。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怀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最根本的不同算是人生追求的不同了。这影响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8岁才开始上学读书，上学后又三度辍学，可谓历经坎坷。他耳闻目睹的农民疾苦，饥民造反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他在读书期间接触过工人、农民，还作社会调查，接触过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王明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市镇的小商人家庭，6岁上学，一帆风顺，接触工人、农民较少，了解社会更少，接触社会各方面人物甚微。这些，都对各人形成不同人生追求有直接关系。

还有出国与不出国的不同。王明出国留苏学习和工作四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中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缺陷是不联系实际，特别是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没有出过国、留过洋。他并不是没有出国的机会，也不是不想出国，而是先积极支持了湖南青年出国留学，自己却暂不出国。对于先了解国内情况后出国学习的意思，他曾对周世钊有过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他还说，暂不出国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有三大好处：第一，看译本较看原文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似乎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自己如果要在当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去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以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以上列举几种“不同”，都直接影响到毛泽东与王明形成不同的人生观。而不同的人生追求，是影响一个人终生的。

一个人的人生观，一般在青年时期初步或基本形成。由于各人的价值观和追求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观。1924年夏，王明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校，面临前途抉择，同父母亲商量。他父亲说，越是人家开店抢我家生意，“叫你今年不能升学”，“我们就一定要升学”；“为人要穷得有骨气，要有硬骨头！”他母亲接着说：“禹子，你爸说得对，穷人要有硬骨头。你看芍药那样不如牡丹，就是没有硬骨头，所以经不住霜打。”王明倒是听从父母的“教诲”，学习牡丹，可他并不学牡丹的硬骨头精神，却学牡丹的红花绿叶、华而不实这一面，无论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还是回国工作期间，处处都显示出来。比如，他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很快找到了培养自己的园丁——米夫，凭借米夫这个园丁出人头地，结成了教条宗派，为进一步登天奠定了基础。又比如，他在上海工作期间，1930年初被敌人巡捕逮走，在狱中没有一点硬骨头精神，却只图个人早点出去，全然不顾党的保密纪律，很快泄露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好在党中央工作机关搬迁得快，没有造成

更严重的损失。直到 1942 年，他还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忆牡丹》。

毛泽东出生农家，上学几次辍学，还当过半年兵，养成一种务实精神。在湖南一师，基本上形成对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看法，即人生观。1915 年 8 月，他写信给一位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的同窗好友，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信中特地抄录了近期写成的一篇日记，题为《自颂》，以匏瓜（即葫芦）、牡丹相对照，说明做人要脚踏实地，不能华而不实。这是一篇富有哲理的古文，为阅读方便，不妨把其中几段译成白话文：

一位长者同我交谈说：你知道葫芦的情况吗？每当春天来临，土层变暖，它的嫩苗便冒出地面，伸展纤细的茎条，顺地缠来绕去，成为瓜蔓。这瓜蔓不能自行向上延伸生长，假若无人栽培管理，它便就近向荆棘丛上攀绕，或者向新近的杂草间躺爬。长到一定程度，瓜蔓上逐渐有间隔地生出一一个个小花苞，在荆棘杂草丛中时隐时现，极不显眼。过往行人看到后一定会指着说：“这不过是一种杂草而已。”可是，到了深秋时节，杂草叶子枯萎了，牧童过往其间，拨开杂草，便发现果实累累，大的像大肚酒瓮一般，这正是葫芦也。

反过来看看牡丹。它生长在由园丁栽培的庭园里，绿色叶子衬托着大红花，交生怒放，华贵鲜亮，争妍斗艳。无知之人一定会指着牡丹说：“这牡丹花结的果实一定大得不得了。”然而谁晓得，到了秋凉时节，牡丹花一下子枯萎了，果实却一个也得不到。

你比较比较，一个葫芦，一个牡丹，到底哪个值得你效法呢？我回答说：“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有的人像牡丹，“刚刚长出一根枝条，马上伸出来向人显示，一件好事还没有做完，立刻就想当众大喊大叫，喜欢招引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这显然是缺乏一种少说多想的修养，且有严重的轻浮喧哗之习气，恰像美女自我陶醉一样得意，真有点不知羞耻了。虽然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外强中干，没有多大作为了。当追名逐利还没有栽跟头的时候，心中的贪欲日益强烈，道听途说，损耗了精力，浪费了光阴，还自以为得意。“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纵观毛泽东一生，正是学“匏瓜”之所为，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不怕艰苦，不怕困难，扎扎实实，开小花，结硕果。在中央“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当中央负责人提议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毅然回答：不愿去上海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而愿去艰苦的农村，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建立革命落脚点。他奉中央之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去工农革命军的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抓走，在被押送途中机智脱险，死里逃生；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严重受挫后引兵井冈，在井冈山结交绿林，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围魏救赵”，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白天遭敌军追击，晚上还要受偷袭，弄得睡不好觉，吃不上饭，甚至还向女战士“要饭吃”。经过艰苦奋斗，虽然建立起赣南、闽西根据地，但由于缺医少药，得了一场大病，历时几个月，在闽西一位名医吴修山精心治疗下，总算过了鬼门关。也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不断地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土地革命路线和建军路线，艰难曲折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的中国革命道路。他同朱德总司令一道，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红军粉碎了敌军的多次“进剿”、“会剿”，直到打退敌军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挤、打击的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跟着战略转移——长征。在湘江惨败后，开始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逐步地团结了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在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和确定西进黔北地区的战略决策，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为甩掉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指挥红军在云贵川一带实行大迂回，用了四个月时间，成功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摧毁了大量敌军，捣毁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在继续长征中，历尽艰辛，抢渡金沙江，夺取泸定桥，跨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部消灭工农红军于安顺场一带峭壁峡谷之中的阴谋。工农红军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接着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通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通过了杳无人烟的漫漫大草地，奇迹般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指挥红军到达陕北后，以发展求巩固，奠基西北，成功地实行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领导军民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迅速壮大抗日队伍，经过8年抗战，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军。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自卫战争，经过3年，又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艰苦奋斗、硕果累累的开国元勋。

王明一生追求“牡丹”之所为，怕艰苦环境，总想在大城市的庭院中生活。从中国的武汉大城市到苏联首府莫斯科，在中山大学找到米夫这个园丁，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城市，怕艰苦，不愿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实际锻炼，甚至几次不服从组织分配，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而千方百计地赖在上海城市里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坐镇上海，扶植王明掌握党中央大权后，城市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王明仍不愿将中共中央转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而愿呆在上海，躲进郊区的疗养院，随后，搬进尼姑庵隐居起来。为此，他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诗：“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经过一段寺庙生活，还是决定再一次赴安全系数极大的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遥控指挥他一手操办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了错误。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设立在陕北延安，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王明又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在延安只呆了没有几天，就迫不及待地到武汉市去同蒋介石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果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以上这些，表明王明“日学牡丹之所为”，“一枝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将无实之可望”。纵观王明一生，确实确实是追求牡丹的人生——只开花不结果的。

## 艰辛开新路与靠米夫上台

毛泽东是我们党内首先主张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的人。他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在抵制和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艰难曲折地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这部分内容，本书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讲讲王明是怎样在米夫培养扶植下“一步登天”的。

### 王明在中山大学搞教条宗派

1925年秋，苏联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继办起黄埔军校后又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是年冬天，王明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却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对中国的工人、农民接触很少，对中国国情了解甚微。在学习中，仍用国内私塾和校园中养成的“唯书”、“唯圣”的学习方法，死记硬背，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加上，国际共运正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又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教员授课只讲书本知识，不联系中国实际。所以，王明学马克思主义不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成如同“四书五经”一样的一条条“圣训”，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成是一副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不研究中国国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生搬硬套，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这就深深地打下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基础。和王明一同陷入教条主义泥坑的博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

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在这个时期种上根。一方面由于自己小资产阶级出身，受过旧教育，以后也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在实际运动中锻炼过，到苏联后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态度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感到马列主义的精深博大、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二者一结合则成为教条主义。

半部《论语》治天下，读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自以为了不起。

王明进入中山大学后，被编在第一班学习。因当时学生绝大部分不懂俄文，教员也不懂中文，教学进度甚慢。学校决定先培养一批翻译工作者，在学生中选拔一些俄语学得快的学生，组成一个速成班，王明是被选中之一。这个速成班10多人，只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和列宁主义等4门课程。担任这班教授列宁主义课的教员是该校副校长米夫，他比王明只大3岁。

追求牡丹性格的王明，会耍点小聪明，在中山大学这个新的“花园”中，

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园丁”，才能“交生怒发”。他要找的园丁不是别人，恰是副校长米夫，于是乎就巴结起米夫来。他在学习的四门课程中，只在俄语和列宁主义课上下功夫。对米夫教授的列宁主义课，认真揣摩，死记硬背，在讨论时总是抢先发言，有关一些名词术语，现成结论讲起来也头头是道，很得米夫的欢心和赏识。在列宁主义课讨论时，每当发生意见分歧，米夫也总是指定王明发表意见。

更使米夫欢心的是王明对待中共旅莫支部一事的态度和表现。1925年12月，中山大学成立中共旅莫支部分部。中共旅莫支部有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其中规定：“我们必须完全摒除那种认为应该在学习理论之前先学俄语的错误观念”；“我们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样的规定，使得留学生不敢学理论和俄语，使得一些人谨小慎微。米夫对此规定不以为然，对旅莫支部很不高兴，指责“中国人开会太多”，指责旅莫支部不听话。于是，1926年夏，他在学生中挑起一场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归谁领导的大争论，一连开了四天会。有的同学主张应归旅莫支部领导，而王明报其米夫所重视，提出要归联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不分国籍，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到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经过争论，中山大学领导作结论，最后宣布解散旅莫支部，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原中共党员都变为联共的候补党员。

米夫也需要物色一个对自己今后发展有用之人，王明正是他所物色的对象。王明在中山大学种种巴结活动，不仅得到米夫的赏识，而且受到他的器重。米夫真正成了王明“交生怒发”、“争妍斗艳”的可靠“园丁”。1926年秋，在米夫的吹捧和举荐下，王明就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就把还没有毕业的王明选作翻译，带在身边，先到广州，后转到上海，随后又到武汉。米夫在武汉，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二是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王明既当翻译又帮助米夫工作。米夫又带王明参加中共五大，这是王明第一次以翻译工作者身分参加党的代表大会。6月，王明又参加米夫和陈独秀的谈话。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陈独秀既不愿接受，又不便推辞，就让他任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大革命失败前夕，王明惧怕环境恶劣，又对当宣传干事不满，想离开中国。7月初，王明又跟着米夫返回苏联，8月初到达莫斯科。

这时，中山大学第一班已经毕业，王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了支部局宣传干事、翻译和联共党史课教员。

当王明返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原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已被解职，校长一职由教务长代理。校内正在发生“教务派”与“党务派”的争论，中国学生也被卷入这场斗争。王明先到同学中侦察活动，然后向米夫献上一箭双雕的妙计：争取未卷入两派斗争的大多数同学作为自己力量，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以便全面控制中山大学权力。米夫采纳王明计谋，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不久，米夫荣升为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水涨船高，米夫所支持的王明，也逐步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

米夫凭着自己的权力，精心安排王明参加1928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翻译工作，并且作为重要的译员。在中共六大筹备工作期间，米夫指使王明等人编译了提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的小册子，王明并以“韶玉”的笔名为小册子写了长序。这

一个小册子受教条主义思想所支配，受城市中心论思想所驱使，编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等“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其中有中国四次，即上海三次暴动和广州暴动，就是不编入秋收暴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王明不懂中国革命实际，在序言中武断地说：“在武装群众的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这篇序言，大多抄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却被米夫看成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暴动的理论之作。王明主编的这个册子，不论对中共六大，还是六大以后的实际斗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米夫抓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机会，不仅安排王明编小册子、写序言，还多次向代表推荐这本书，吹嘘王明；而且安排王明担任一切重要活动，包括担任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时的翻译；还亲自出马，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公开推荐王明等。米夫、王明在中共六大一唱一和，没起好的作用，却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周恩来回忆说过：

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拔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

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不但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宗派主义者，他利用“园丁”米夫对他的宠爱，搞派别活动，逐渐成了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实际上形成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博古是支部局成员，也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的活动。

王明等教条宗派为巩固自己势力，在米夫校长支持下，捏造“江浙同乡会”事件，以压制中大学生反对米夫和他们的风潮。王明教条宗派诬他们为“反动组织”，对他们进行斗争和打击。激忿的学生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等，经过调查，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是属于经济互助性质的，其中虽有个别人与其他党派有些牵连，但不能说它是反动组织。于是，中共代表团在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同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的审理，作出的结论指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

然而，此事并没有完结。王明又转而把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之等人，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继续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活动。1929年夏，尽管王明已经回国，但他那个宗派集团的人和米夫，乘中山大学“清党”

运动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之等打击、迫害，诬蔑他们搞“派别活动”，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送去做苦工。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还收集、整理“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等是“机会主义”，要对李剑如、余笃之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仍然坚持原则，可是同在莫斯科的张国焘却倒向米夫一边。

1930年春，应联共的要求，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其中说：“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随后，中共中央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等陆续回国。这场斗争，是王明宗派主义挑起的，以共产国际支持的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获胜而告终。这为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打击瞿秋白、为自己上台打下了基础。

总之，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四年，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亲眼看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这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胜起了决定性影响。但是，他没有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只停留在书本知识上，靠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学习俄国中心城市暴动的十月革命经验，把它当作完全适合中国的固定模式。同时，他在中山大学依靠其“园丁”米夫，搞了一系列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为他上台大搞教条宗派活动奠定了基础。

### 从追随到所谓反对“立三路线”

王明1929年春回国，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写过一些文章。其中一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工人阶级和国内工农革命运动的，但多数是宣传“左”倾思想，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鸣锣开道的。立三路线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王明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当“立三路线”正式形成而遭到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为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了。

在园丁米夫精心培育下，执着追求“花中之王”的牡丹性格的王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对王明回国的车票、船票给予特别关照。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

王明到上海时，国内革命斗争很需要理论干部。中共中央对王明这样学过理论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寄予了厚望。为使他所学的理论能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连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都已派定。但是，王明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艰苦，总想留在上海大城市，在党的上层机关抛头露面，真正显露出在城市庭园中生活

的牡丹习性。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的要求，允许他留在上海，然而并没有留他在中央机关，而派他到上海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7月，王明调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10月又调任他作《红旗》报的编辑。

王明从回国到1930年1月被捕这段时间，参加过一些基层党的、工人的会议，做过一些工作，但他不主动深入工厂、深入工人了解情况，去做细致的工作，而是躲在秘密机关里看报纸、写文章，总共写了30多篇文章。文章主要宣传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在错误的东西中，也有他自己的发挥，其特点就是“左”。共产国际的错误部分是“左”，他的发挥比共产国际的“左”还要“左”。王明这些文章中“左”的宣传，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形势与党的任务。1928年7、8月间，共产国际六大确定“第三时期”理论，从当年起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王明作为会议翻译人员，对此心领神会，回国后写文章，把教条主义宣传国际理论和主观主义的个人发挥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世界战争“终将爆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也作了过高估计，1929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工人运动的新潮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正在复兴”。信还提出：“我们固然不能够预言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王明写文章发挥说：国民党压迫和欺骗群众的政策，“一天天的走向破产”，“直接的武装行动已成为广大劳苦群众所采取的斗争手段，加紧了党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此，党应当把党员军事化及武装工农的工作立刻实行起来。”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又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暴动，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工农大暴动才能完成”。他鼓吹：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日、反军阀战争周“均迫在日了，全中国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准备一个伟大的暴动预演——政治总示威”。这种普遍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总政治示威”，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为冒险行动提供了依据。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中提出了我们的政纲：“以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余孽，反对资产阶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使中国革命不仅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且使之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中，把反资产阶级问题讲得更突出：“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们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官僚、豪绅一样残酷。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791、792页。

《王明言论选辑》第47页。

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王明把资产阶级当成中国革命对象，与此相联系，他也把富农当成革命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指导下，中共六大制订的《政治决议案》正确提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六大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苏联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在集体化运动中解决富农问题。布哈林反对这一政策，于是进一步加紧了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米夫不仅故意地反对布哈林右倾，以示在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富农问题的表述与己无关，而且要把苏联的消灭富农、反对右倾的政策，不顾地点、条件硬照搬到中国来。米夫等人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于6月7日发出，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议农民问题”，指出“对待富农的态度这个问题”，“中国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并主张没收“富农的地产”。王明看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大加宣扬。他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一文中，主张坚决地、不动摇地、丝毫不放松地反对富农；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富农；谁不赞成反对一切富农，谁就是“农民意识”、“富农意识”；要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王明提出反对所谓“农民意识”，“富农意识”，比“立三路线”时用来批评毛泽东还要早一年。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道理问题，王明坚持城市中心论。他在《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在叙述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后说：“只有中国工农兵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指挥下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是唯一正确的手段！”所谓“唯一”，是排它的，除城市武装暴动的手段外，就是排斥了毛泽东等开辟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王明在《红旗》报当编辑时，于1930年1月12日，去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由上海工联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会议进行过程中，10多个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20多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房。到了老闸房，警方当即讯问被捕人员的姓名、住址。王明报了假名，却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党中央在鸭绿路秘密办公机关的安全。

被捕的当天下午4时，“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等人就同他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他表示同意。王明随即从被捕的工人中找到铅笔和几张草纸，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当时任中宣部秘书的潘问郁（后来成了叛徒），并对巡捕说按地址送到后给酬劳金14块大洋。他写信的目的，是通报他自己已被捕、关押地点和“简供”，请求营救。他还要巡捕向潘问郁要高介之的住址等。据当时在中宣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

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即王明）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

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王明为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政治纪律。

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后，于1月22日上午被解送到提篮桥监狱内特犯间。年关即将到来，一些工人难友因过年而想家、怕失业，有的怕引渡到中国的公安机关受酷刑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做过一些安慰的工作，教他们认字，也讲过一些反帝的道理。但在交谈中，他表示对上海工联会的极大不满，说在那么一个地点举行这样大的会议，文件一大堆，能不被破坏吗？这给工人造成对工联会的不信任感。王明还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并认作了乡亲。

2月4日下午，英租界当局宣布将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的上海警察局，下午7时解到。由于王明穿的是工人服装，个子较矮小，没有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敌人尚未发现王明的真实身份，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位安徽乡亲看守，让他随便添了一个名字，就算有了保人，叫他于2月18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那天，在街上行走，正好碰上在安徽农中的老同学王逸常（时任六安、霍山联合县委书记，来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王逸常回忆这段情景说：“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出狱后，王明写了给米夫和中共中央两封信。给米夫的一封信，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这封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在脑后。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和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指责李立三的领导不给陈（指王明——作者注）安排重要职务。”另一封信，是王明出狱后第三天写给中共中央的，长达29页。信中汇报了一些情况，同时也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又极力为自己开脱。

中共中央没有因王明为开脱自己而不执行政治纪律。中央审查了他被捕的经过和他写给中央的信，查明事实真相后，于1930年3月16日给王明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他这次被捕“犯了几种重大”错误：其一，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其二，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其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其四，指出他所说“‘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

王明因被捕泄密，不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而且被撤换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职务。他犯的这类错误是不宜在白区做秘密工作，应送到

---

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第141页。

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第142页。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9页。

农村革命根据地去锻炼，去学习革命实践经验。党中央本想让他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李立三鉴于他不愿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又考虑到他能耍笔杆、写文章，中央最后决定调他到党领导的最大群众团体——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到新的工作岗位后，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不认真地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好好工作，而是满腹牢骚，闷闷不乐，一有机会就发泄。他以米夫为靠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公开向党要权、要地位。有关王明这一段情况，当时全总负责人罗章龙有如下回忆：

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他认为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

王明一方面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另一方面又急于想出人头地。自己受处分对中央不满，而对李立三鼓吹“左”倾冒险主义，却认为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紧迫不舍。4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发动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后方兵力空虚，对革命发展极为有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红军，利用有利形势，分兵以发动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大大发展了革命形势，为大规模的军事反“围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李立三不是从实际出发，有效地组织进攻，而是鼓吹“左”倾冒险主义，王明也不甘落后，亦步亦趋。

5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同时发表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王明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两篇文章。两文均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各项决议为指导，夸大国内军阀战争危机，宣传“左”倾盲动。可以说，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

当时，李立三已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的文章代表着中央的观点和主张。他这篇文章14000字，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等六大部分，通篇充满着“左”倾错误观点，是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依据。王明尽管还是《劳动》三日刊的小编辑，但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发表比李立三文章还长三分之一的大作。他的文章分军阀战争普遍全国、武装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具体内容、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及加紧反右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等九大部分，虽然小标题与李立三的有所不同，但都是用“左”倾观点观察、分析中国的形势和革命问题，而且某些方面比李立三文章的“左”倾理论性还要强一些。

诚然，李立三与王明的身份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论述的侧重也不同，但这两篇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其主要共同点如下：（1）李立三和王明都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2）他们都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促使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目前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3）他们认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摆在党的面前，党就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他们都认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作为党的总战略和总任务。王明提得更具体，“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这一点，不久被李立三所采纳，并变成了行动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5）他们都鼓吹城市中心论，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这时毛泽东等已从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为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起劲地反对。特别是李立三反对更烈：“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观念。”（6）他们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李立三说：“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观念”。王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现在党内存在有各种右倾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王明掌握党权后把“立三‘左’倾路线”当作右倾来批的一条依据。

以上六点，是李立三、王明文章中的共同观点和‘左’的主张（6月，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回中宣部任秘书）。当然，也有非原则的表述不同，李立三文章中把革命高潮同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所谓“辩证关系”。王明文章未涉及这两个观点，尔后这竟然成为王明与李立三争论的重点，成为王明反“立三路线”时的资本。

此时，博古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与王明汇合，在上海又进行宗派活动。

那么，王明为什么又一下子变成所谓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事出有因，是事先知道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便正式进行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讲，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就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但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某些方面又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比如他主张近期内发动全国暴动，是共产国际所不同意的。首先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尽管中共中央再三要求，共产国际一直不批准这个决议。共产国际这些动向已为王明所获悉。当得知中央将于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后，就与博古一起，邀集王稼祥、何子述先开串联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在谈论中，逐渐把话题集中到6月11日的决议上，大家都谈了对决议的意见。王明最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

是非常必要的。”王明搞这么一次串联会，目的在于动员大家作好准备到会上发难，造成一个反对《决议》的声势。

在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上，李立三主持会议，说明讨论会是如何进一步贯彻《决议》的问题。话音刚落，既懂理论又了解实际情况的何孟雄立即发言，反对《决议》中的“左”倾冒险。王明以为时机已到，随即催促博古、何子述、王稼祥接连发言，对决议提意见。接着，王明长篇发言，慷慨陈词，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和反右倾问题，对李立三的“报告”和《决议》的一些提法提出批评，并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李立三急切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会上就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企图把他们压下去。向忠发还宣布给王明以撤销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的处分。但是，王明并没有被李立三、向忠发的高压所吓住，因为他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第二天，他给中央写了信，重申政治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

标志“立三路线”的6月11日《决议》和王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给中央这封信，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都“左”，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在基本问题上王明不可能“反对李立三路线”，并多次称《决议》及其报告人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等；两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区别，对有些问题王明的观点和主张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这是对的，但这是照搬斯大林的；两者在具体提法上有时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过讨论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找借口反对李立三，为自己上台打开通路。

政治讨论会后，李立三实行家长制，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给博古等“严重警告”处分，并决定他们分别下放，调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古暂留全总机关等。这说明，王明与李立三较量第一回合暂时受挫。王明从中也看到自身还不具备推倒李立三的力量，于是在受处分后再次给中央写信，声称：“我虽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新的较量。

从6月11日《决议》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间，王明很少在党刊党报上发表文章，仅查到的两篇——《什么是“流氓”与“匪”？》、《“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都没有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的内容。倒是他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后又转到省总行委工作期间，他对“左”倾盲动极感兴趣，很积极地投入编写快报、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工作，获得部门负责人的好评。

一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再次来信批评“立三路线”时，王明、博古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 从“拥护”到反对六届三中全会

王明对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先是“拥护”，后是反对，这有相当复杂的情况及各种因素。

周恩来、瞿秋白带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回国，于 1930 年 8 月后半月陆续到达上海。他们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做了大量耐心细致工作，及时制止立三错误在各地贯彻，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

9 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本人也在会议上开始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共产国际检查错误。这次会议对于停止“立三路线”的执行，巩固和发展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都起了积极作用。

王明一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准。他既知道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又知道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取得重大功绩，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把王明、博古等找去谈话，谈三中全会路线正确，你们不准反对。王明、博古等对三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拥护”。博古后来说过：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找我们谈分配工作，通报三中全会，“我说过同意三中全会，王明亦同意的”。

但是，王明、博古等又对三中全会极为不满。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同时，没有撤销王明、博古等因反李立三而受到的处分。更使他们难以容忍的是：瞿秋白不仅主持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会后还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因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小宗派，引起了王明等强烈不满。随后，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下，把此事歪曲事实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撤销了瞿秋白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正因为如此，王明、博古等有着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思想基础。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 8 月 3 日政治局会议记录，才发现李立三有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十分恼火，立刻把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指责他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接着，共产国际又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知道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又很不满意，于是在十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相对立的。

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上海毫无所知。然而，当时还留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何凯丰、陈昌浩等，从共产国际米夫那里知道了国际七月来信的精神。11 月上旬，他们陆续从苏联回到了上海，同时把共产国际确定立三问题是路线错误的精神，首先告诉了王明等。仅隔几天，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十月给中共中央来信（俄文的）又回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没有及时把信交中共中央，而是先给王明看。博古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沈泽民将国际来信原稿交王明看过。

王明、博古以为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时机已到，立即在他们那帮人中互相转告，到处串连，准备在党的会议上，以突然方式，捅出“立三路线”问题，同中央对着干。他们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后，11 月 13 日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尖锐地提出：“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存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他们看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原件后，经过策划，又于 11 月 17 日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侧重点是标榜自己为反立三

路线的“英雄”，还向党中央提出强硬的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同时，他们进行宗派串连活动，以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为借口，改变三中全会后曾经表示服从分配到苏区工作的承诺，仍然赖在上海城市里活动。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连续于18日和22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问题。党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予以批评。周恩来针对王明等的宗派活动，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瞿秋白在22日会议的报告中说：“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12月7日，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中也对王明、博古拒绝党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并且指出：“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的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王明）、秦邦宪（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博古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指示信的同时，电召李立三赴共产国际检查错误。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并审查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和新的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及党报的社论以后，给共产国际执委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其中指责李立三在犯了路线错误，不仅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积极作用，而且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反而对立三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报告还点名批评瞿秋白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小团体”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李立三出席挨批）讨论这个报告时，要改造中共中央核心组织的意图说得更明白。苦秋莫夫发言无理指责秋白同志说：“他在这里同意反对立三主义，同意国际一切指示，同意根本的当前任

---

《访问事初梨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4年11月4日。

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1931年5月10日出版）第66—75页。

务的一切措辞，他回到中国之后，在私人关系的空气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一切原则，而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皮同志发言，按“教条化”标准吹嘘王明、博古等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领导工作……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们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如果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报告全盘否定中共三中全会，对瞿秋白主持中央不信任、把他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的话，那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就是道出想让在莫斯科培养的、自己信任的王明等人上台，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为了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上台，共产国际还特地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华付诸实施。

### 米夫扶植王明上台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约于1930年12月10日突然来到中国上海。他到中国的重要使命，就是改造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份，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等扶上台。他一到上海，不见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却先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听取情况汇报，征询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并面授机宜。王明这棵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的含苞待放的牡丹，回国两年都不能开放，而且还惹了一身骚，这次见到苏联“园丁”——米夫，真是感激涕零，有望洗掉身上泥巴，竞相开放，因此积极配合米夫的活动。随后，米夫再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谈话，又会见罗章龙等。

米夫经过几天了解，为王明上台采取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四个实际步骤。第一步，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召开的紧急会议，未必能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还是以开六届四中全会比较有把握，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硬性建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不得不接受。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接受米夫建议，决定收回召集紧急会议的成命，改为召开四中全会，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要中央撤消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吹嘘他们是懂得列宁主义和布尔塞维克理论和实际的人，搞中国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在共产国际代表敦促下，中共中央于12月16日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初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第三步，22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又发出“第九十六号通告”，申明要“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表示要在“党内实行改造”，“必须引进积

---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15页。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60—61页。

载《党的建设》1931年1月25日第1期

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

第四步，在米夫进一步压力下，中共中央于 25 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管理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是米夫把王明等拉入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步骤。

在米夫压中共中央的同时，王明等在下面攻中央，百般挑剔中央的工作，破坏中央的威信，使中央无法继续工作，以造成逼瞿秋白下台的形势。他赶写、修改《两条路线》小册子，印发给江南省委管辖的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大造舆论，反对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前，米夫不仅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而且拟定了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扩大的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以外，还要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并且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王明通过各种办法向小宗派的人布置发言的内容。当米夫、王明经过一番策划后，采取突然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期限制一天，就是不让民主讨论，只让大家举手通过决议和选举王明上台。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委、候补中委 22 人，列席代表 15 人。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宣读了由米夫审定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王明作长篇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同志，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强调全党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和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 9 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 5 人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主席仍由工人向忠发担任。这样，六届四中全会改造了党中央成份，实际上批准了王明扬“左”反右的《两条路线》的总纲领。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仍留中国上海，一些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所以，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是由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接着，又改组了团中央领导机关，由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6 月，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被杀，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至此，王明这棵红“牡丹”终于真正成了“花中之王”了。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或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毛泽东抵制王明“左”倾路线反“围剿”取胜

在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不但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以极大的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不参加“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总暴动计划，而是不打南昌打吉安，使得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由不但没有受到积压，反而利用了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红一、红三军团由2万人发展为4万人，并且在罗坊会议上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从1930年底到1931年初指挥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10万大军的第一次“围剿”，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活捉了师长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它的前半阙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当时方面军总部警卫连长介绍毛泽东审讯张辉瓒的情景说：

毛委员审得可真带劲！一开始让我给张辉瓒搬了凳子。“胖瘟神”就夸奖起我们的俘虏政策来。后来，他还假惺惺地要参加红军。毛委员说，“你问问苏区人民答应不答应啰！”接着，毛委员又讽刺地说：“前线总指挥先生，你是怎么指挥的呀！你不是要歼灭红军于江西，去蒋介石那里请功领赏吗？没想到你的‘围剿’军反被我们围剿了吧？”——张辉瓒的嘴巴像贴了封条，一句话也说不出。

打破了敌军第一次“围剿”，红军乘胜追击，扩大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动了群众，为打破新的“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失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2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4月初，蒋介石调集十八个师零三个旅共20万人，投入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

正在这个时候，即4月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根据地，传达、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充实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毛泽东从此开始，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

## 青塘会议争论定决策

在四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之前，三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项英已于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1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项英到苏区后作过一些肤浅的社会调查，根本没有看到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强大力量，认为新“围剿”敌军20万，而红军只有3万多，主张不打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认为军民结合有可能打退敌军新的“围剿”，强调指出：“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没有决定第二次反“围剿”。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4月初到达宁都青塘，同苏区中央局会合，就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认为项英是贯彻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精神的，于是，4月17日又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只开一天，主要是新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五个文件。决议中虽然也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不顾事实如何，硬说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其实，红四军前委并没有执行中央打南昌的命令。这就毫无根据地否定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抵制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不打南昌攻克吉安的历史事实。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路线的开始，当然要完全贯彻下去需要有个过程。这次会议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第二次军事问题，即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问题。中央代表团先传达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因此，引起对战略方针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大多数人认为，敌军有装备精良的20万，而红军只有装备很差的3.5万，力量悬殊太大，对敌军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去；其中王明的教条主义者还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并且更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还有一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来打破敌军新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与中央代表团相佐，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的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继续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采纳了。

这次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训令，大要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江西红军可退到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毛泽东发言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

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红军高级干部发言，慷慨激昂，坚决主张就地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另创苏区。这样，毛泽东等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使得这些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既不大懂军事指挥，又缺乏对敌作战经验的中央代表，只得赞成打这一仗。

就在这个扩大范围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批驳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周以栗批得最为有力。周以栗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奉立三中央之命，于1930年9月下旬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带来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给毛泽东通宵达旦的摆事实、讲道理，周以栗尊重实际，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总前委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他参与了红军解放吉安的战斗，使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他出席罗坊会议制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以中共长江局代表身份去做红三军团指挥员的工作，把红军主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作战；他耳闻目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周以栗以由武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农村的亲身经历，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够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呢？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围剿”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毛泽东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提出正确决策，发展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完全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下车伊始”者的当头一棒。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

“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打法。从此时起，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主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毛泽东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第二、三次反“围剿”取胜

青塘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同朱德立刻在4月19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20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25天、隐蔽待机。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下了一步险棋。

在东固时，毛泽东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交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进而在军事上支持了毛泽东，任弼时也支持。他们转而对项英代理书记军事上的见解有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欧阳钦当时给中央的报告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士兵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么多弱点，我们有这么多优点，我们是完全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根据地广大群众实行赤色戒严、封锁消息，筹集粮食、蔬菜等支援红军。3万多红军雄居于东固山区，隐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没有走漏半点风声。为了解决部队粮食、蔬菜不足困难，红军官兵们还上山挖竹笋、野菜，下水捉泥鳅、摸螺蛳等。特别在夜晚，山上、水田里有万盏灯火在游动，显示出一幅美丽的图画。过了一些天，有些指战员沉不住气，求战心切；有些人提出，在东固山区逼敌而居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又做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正在这个时候，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5月13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第二天，毛泽东约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我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立刻决定：全军主力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在这样安排后，毛泽东还不放心，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赢得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清晨，毛泽东带电台和警卫排登白云山，朱德率总部后上白云山，并在山下同敌军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朱德命令总部的特务连在山坡上进行阻击，且战且退。正在上白云山的毛泽东，未见朱总司令上山来，又听到山下枪声急，非常担心总司令的安全，立刻指挥警卫排从山上冲下去，因敌军不知底细而撤退。这样，毛泽东和朱德一同登上白云山，同时进入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激战到下午5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的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告捷，给以后的战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紧接着，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接连取得白沙战斗、中村战斗、广昌战斗和建宁战斗的胜利。

从5月16日到31日，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军3万余人，自西向东横扫700华里，在五战五捷中歼灭敌军20万中的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红军乘胜追击，解放了赣东、闽西的一些地区，中央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狂妄气焰。在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声浪中，蒋介石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哭失声。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村战斗取胜后，苏区中央局不再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做地方工作，传达和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群众工作，重新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这样，毛泽东就既要对红军指挥战斗，又要领导战区的地方工作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于失败，而是依仗军事优势，从7月初开始，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军队共30万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他改变第二次“围剿”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中央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福建建宁一带做群众工作，远离老根据地，而且尚未得到休整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多人，只有国民党“围剿”军的十分之一。形势已很危急，加上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汇报军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了军事形势和红军对策，意见完全一致，但存在第三次反“围剿”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需要”，作出暂不去中央局驻地龙冈汇报工作的决定。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同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决定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红军部队在七月酷暑中，十分艰苦地回师赣南，月底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回师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这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情势非常严重。毛泽东和朱德新红军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围攻问题，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国民党各路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如何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就成为毛泽东、朱德的严重课题。他们经过调查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时，南北都有敌军，中间只有20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使“进剿军造成错觉，毛泽东和朱德派少数红军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指挥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敌军驻扎的20公里空

隙，于8月6日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敌军居然毫无察觉。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同朱德指挥方面军主力对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的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首战告捷。马不停蹄，他们又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取得良村、黄坡战斗的胜利。从8月7日至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这时，国民党进剿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分两路对红军主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攻。毛泽东则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命令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大模大样地开去，而指挥主力红军越过敌军重兵驻扎的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又返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国民党进剿军被红十二军牵着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时东时西，弄得疲惫不堪。正如当时被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当敌军发觉红军主力再向西时，红军已在兴国境内休息半个月。此时，战场上红军主动和敌军被动的形势日益明显。蒋介石鉴于参加“围剿”部队已十分疲惫，而反对他的国民党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只能下决心退却。

毛泽东乘敌军退却之机，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上旬在老营盘、高兴圩打了两仗，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又在方石岭歼敌一个多师。

这样，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艰苦奋斗，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打破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30万大军的“围剿”。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里的众多军阀没有一个斗得过他，但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指挥上来说，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名败将而已。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奉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之命，到瑞金叶坪同中央局会合，并从10月11日起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他们于14日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涉及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争取广大群众，并捉的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在根据地内，发动了群众，建立和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1.2万名群众参加红军。这些，都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尽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全盘否定中央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根据地的军民仍然热爱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本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内和国际共运中已有巨大影响，在创建中央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在根据地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得不安排毛泽东的行政领导职务。赣南会议前夕，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紧急协商，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

毛泽东是在遭受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611人。毛泽东为大会题了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回顾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开辟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中央苏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革命积极性开始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得到提高。报告根据赣南会议的精神，也不得不说到中央苏区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中共中央指出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定能够战胜反动统治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在革命战争胜利中去完成一省和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在这种新形势下，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

大会主席团在11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他们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讨论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于20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11月25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 15 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2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从此开始，毛泽东就被人们誉称为毛主席了。

### 指导宁都兵暴和红五军团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从内战开始以来未曾有过，这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12 月上旬，毛泽东得知第二十六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中央代表团一成员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1 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袁血卒回忆写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 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

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学过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光洋）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立，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都暴动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说明对支部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

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 毛泽东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

正当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蓬勃发展、粉碎敌军三次“围剿”的时候，城市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后，不顾这种严酷事实，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他既不愿将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央根据地，又害怕在城市里被捕被杀的危险，于是决定离开国内，再次去苏联。此时，恰好共产国际需要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王明趁机向米夫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批准。

为了确保四中全会制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能够继续下去，王明受宗派主义驱使，避开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精心挑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博古为临时中央负总责，总书记之名先以空额留着。

王明于1931年9月下半月离开上海，去到莫斯科，10月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如果说，他在国内时，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用外国人的东西吓唬中国人，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台阶，那末，他到苏联以后，又伪造历史，谎报成绩，用中国的东西去糊弄外国人，以图不断往上爬。例如：

王明出席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各国支部任务，总结失业者罢工斗争的经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王明在讨论中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讲了国民党的迅速崩溃和苏维埃及红军的重大胜利，连抵制他的路线而取得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及建立中央根据地都说进去，借以夸耀四中全会后苏区的革命成绩；讲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与在工作中的弱点，借以掩盖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还讲了反帝运动的高涨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组织（只要下层统一战线）问题。王明的发言得到会议的充分肯定；在他第一次发言的第二天，他被破格提拔担任了这次全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又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成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物。

王明狠批“立三路线”，借以抬高自己。他是靠反“立三路线”起家的，到莫斯科后，即使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已告一段落，也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据《李立三传》写道：“通常的作法首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

王明再版《两条路线》，伪造历史，篡改历史，为四中全会树碑立传。这次再版不仅将书名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加写了近5万字的《再版书后》，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以后“党内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继续鼓吹过左的政策，城市中心论。其中写道：“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1930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王明

写道：“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1至4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粉碎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是毛泽东、朱德抵制“左”的错误，指挥红军作战取得的胜利，怎么能把这些挂到四中全会的账上呢？

王明于1933年冬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反对法西斯主义，如何认识世界革命危机的新形势和战争危险，确定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主持过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他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夸大红军的胜利和成绩。他说：“红军在冲破五次‘围剿’（实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打破了国民党40个师的军队，其中18个师差不多完全被打溃了。红军俘虏敌人8万人……夺获敌人14万支步枪，1390架轻重机枪，20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门炮，6架飞机。此外，差不多有3万国民党军队的兵士投降到红军方面来。”事实上，消灭敌人和缴获武器的数目远远没有这么多。那么，王明为何要夸大胜利和成绩呢？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临时中央是正确的，讨好共产国际，标榜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王明、博古打着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达四年之久，反对、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人达到无情、残酷的程度。这完全是破坏党章党规的。他们不仅破坏了党规，而且也破坏了常规，逆“胜利者不受谴责”的常规行事，毛泽东胜利、成功一次就给打击一次，在毛泽东的党政军权全部抹掉后，还想给他以打击。

### 赣南会议受排挤

在赣南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战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反“围剿”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红军全部作战原则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导下形成的。完全可以说，红军的建军思想与作战原则相结合，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其他具体路线也都已形成。思想路线是在反对本本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他在广大农村的战争环境中，作了大量调查，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文章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土地革命路线是在农村

不断调查、总结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他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 1931 年初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止，形成一条“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的阶级内容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根据地建设路线是在反对流寇式的“只求扩大”、“不求巩固”的错误倾向中形成的。他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波浪式的“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无论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革命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国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正是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后，王明主持下的党中央 8 月 30 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信》到达中央苏区。这封信，对中央根据地的批评进一步升级，除原则上肯定中央苏区成绩外，着重指出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指责中央苏区和红军不够巩固、工人运动不发展，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还提出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中共中央这封信，是中央代表团召开赣南会议的指导思想。

11 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贯彻中央 8 月 30 日指示信，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提出要防止不顾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覃等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说明根据地现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群众是拥护的，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中央代表团不顾根据地干部的意见，坚决贯彻王明中央的“左”倾路线，围绕中央指出的中央苏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这一条，开展各方面的具体批评与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凭借中央路线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威力，通过了中央代表团成员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都“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照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

---

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决议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由各军政治部管理。”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都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是由于正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

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央文件变成为实际行动，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这是符合王明亲自起草的中央9月20日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精神的。这个决议，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大打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还很不够。在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时，临时中央常委认为：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中央区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是“民粹派的观点”等。接着，临时中央连续发出批判“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如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5月2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批评“赣南会议”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指出：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这就明显地预示着，中共临时中央要加强对毛泽东的打击。

### 被迫上东华山休养

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

会前，周恩来已到瑞金，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攻城技术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着重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但中央局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等多数成员“唯上”不唯实，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又一次成为极少数派，于是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 ）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以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当他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时，就被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打断，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也就此被免了。

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于是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和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毛泽东上东华山并没有真正休息，有两个大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一个是日本军国主义在践踏中国国土，一个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个宣言仍然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在东华山，毛泽东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军情。从前线送来的战报看，攻打赣州不顺利，自己也不能亲临前线，真是心急火燎的，3月初，见到中革军委《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得到中革军委已移到战斗前沿阵地，所有参战各军均由其直接指挥。军旅生活多年的毛泽东，深深知道“军委直接指挥”这个话的含义和分量，但也只能干着急而已，期盼着前方军情的好转。

### 下山急赴赣州解围

一天早晨，细雨濛濛，积极主张打赣州的项英，策马赶到东华山古庙，向毛泽东报告攻赣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地，并随手把前线拍来的急电交给他。急电请毛主席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军事决策。此时此刻，毛泽东没有去计较不赞成打赣州反被当做对“进攻路线”的右倾来批，而是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一心只想救几万红军的生命，满口答应停止休养，急赴前线。他请项英先走一步，自己收拾好行李紧跟而来。

毛泽东带着警卫班一部分立刻下东华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由于掌握红五军团的建设情况，先复电攻赣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立即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水路、旱路并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前来迎接的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解围脱险。当时在红五军团下面任团长的袁血卒，写回忆文章说：

“红五军团的第十五军开到赣州外围，恰遇敌军从城内出来，把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红十五军奉调，在董振堂同志率领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地，仓皇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三军团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从此，‘五军团的大刀’便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播了。”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3000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值得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再打赣州了；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当地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的这种主张，就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根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会议继续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

份率中路军北上。出席这次会议的朱德后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 率红军攻克漳州

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南行动。在率红一军团北上到宁都集中的途中，向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闽西南发展的主张，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他们于 21 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3 月 27、28 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建议和林、聂的报告进行专题讨论。会议经过讨论，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向红一军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他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果向南发展，必然会与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于 30 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周恩来接电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4 月 1 日召开会议讨论“直下漳州”的可行性。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还着重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组织好这次战役，争取早日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录写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坐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

准备。……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请命令五军团全部立即出发，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攻占龙岩城。次日，他致电周恩来，报告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红五军团奉中革军委紧急命令，昼夜兼程，在14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部署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命令红五军团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打漳州。

漳州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进行防御。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在4月19日拂晓，指挥东路军主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20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支、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还缴得飞机两架。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22日下午，毛泽东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除讲攻克漳州的意义和红军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外，还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可以说，达到“出击求巩固”之目的。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这对于他是十分迫切需要的。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自述》中写道：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

---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8页。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72页。

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东路军攻克漳州后 40 多天，发动了群众，动员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这次筹集款项 100 多万元，不仅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经费上的准备，而且派专人送美钞 10 多万给临时中央，解决了中央经费的燃眉之急。

赣州漳州同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竭力主张打漳州？原因在于这两个城市的敌军强弱、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是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攻克漳州、节节胜利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将中共临时中央 4 月 14 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电告正在前线的中央局委员毛泽东。该信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提出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信最后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坚定地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在 5 月 3 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划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

---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150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 193—201 页。

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

可是，改组后苏区新中央局只“唯上”不“唯实”，在讨论了临时中央指示和中央局委员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后，5月11日，在长汀作出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典型决议。其中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决议最后提出，“‘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6月初，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途经长汀，看到新中央局5月11日决议，非常不满。因为，这个颠倒是非的决议，是在他缺席情况下作出的，在中央批“右倾机会主义”前面还加上“极严重的”“一贯的”两个形容词。所以，他在9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唯独不给毛泽东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毛泽东带“错”随军工作，仍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但不能起决策作用。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7月上旬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虽然将粤军十五个团赶回广东，但由于兵力不集中，没有大量地歼灭敌人，而红军自身伤亡也相当不少，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但中央局致电前方，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鉴于此，周恩来写信给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前线出席中共苏区中央会议，鉴于苏区中央局遥控指挥水口、南雄战役的教训，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

军已经开始的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望所属各军一体服从领导。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8月8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的敌军。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秘密北上，经过一周行军，到达乐安附近，但敌军还没有察觉。

毛泽东同朱德8月15日在乐安县招携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决定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17日晨，指挥红军突然向乐安县发起猛攻，中午攻克乐安城；20日，又指挥红军攻克宜黄；23日，红军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的一次成功的进攻战役。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分隔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战绩，迫使敌军慌忙调整“围剿”部署，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开展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南城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到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又出来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了。他们批评前方中央局委员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他们并且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9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同日，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的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 宁都会议被剥夺兵权

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前方9月26日训令十分不满，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立即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没有留下记录，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宁都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以战备为中心创造战场，不同意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之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尽管如此，毛泽东没有被压服，在路线方针问题上仍然坚持了原则，所以会议《简报》说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

会议上，有人提出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之职，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同时指出后方项英等对毛泽东批评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因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于是，周恩来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他承认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后，于10月6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

---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88页。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中央来电，重新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12日，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发布了这个命令。同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个又被剥夺军权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是缺席裁判的，并且不通知他，很有意见。

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了上风，错整了毛泽东，又一次剥夺了他的军权。但是，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作检讨，从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问题的电报中知道，他仍不同意中央的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这份电报还说：“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这就引起了即将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以极大的关注。

### 反“罗明路线”意在整毛泽东

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同受“左”倾教条打击的先期到医院休养的周以粟、陈正人会合。周以粟是因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批判“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被整的。他们三人“同病相怜”，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我们党内的“左”派幼稚病。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在长汀福音医院，他还同在漳州战役中摔伤已被治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特别强调要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也称闽粤赣）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作出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

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临时中央，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方针，城市工作破坏殆尽，在上海也呆不住了，只得被迫迁至中央根据地。当最后一批临时中央总领导人包括负责人博古等途经上杭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去迎接他们，博古劈头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听到这里，就不耐烦地说：“不谈了。”在他看来，这不仅证实苏区中央局报告的地方上对进攻路线“未坚决执行”，而且还在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简直是难以容忍的。

博古等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这位年仅26岁的博古，高傲地伸出小手指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这完全是高做

的宗派主义，给毛泽东以一个“下马威”。这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博古一行于1月底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的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等会合，标志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在上海，临时中央组成时曾经明确过，搬到中央委员多的地方把总负责这个权交出去。然而，博古并不想把权交出去，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

博古他们通过批评、指责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的路线和政策，打击、排挤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干部和指挥员，有的指挥员因自己的领导地位，只好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中央苏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声势浩大地批判所谓“罗明路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罗明不执行“进攻路线”，而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抓住罗明1月下旬向省委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2月15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福建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销职务。尽管采取组织手段，高压政策，排挤打击干部，但下面各级党委仍然进行抵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影响这么大，是博古他们所远远没有想到的。于是，他们横下心在江西、在军队都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如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主要是批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为什么要批他们呢？是因为他们从实际出发，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几个中心县委书记曾在“赣南会议”上就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还反批评说：“中共中央领导是‘洋房子先生’，针对他们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反驳说，“我们苏区的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立三路线”等。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拚；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因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不仅开除党籍和军籍，而且还准备处以极刑。在毛泽东、王稼祥等的斗争下，仍被判为五年徒刑。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到：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

《遵义会议文献》第108页。

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 相忍为党却被剥夺最后的领导权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干预此事的电报：“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样，才使毛泽东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步履艰难，既要做工作，又要受批判。

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主要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发言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积极进攻路线”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所取得的胜利；于是对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毛泽东这种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斗争，为当场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毛泽东是个党性极强的人，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尽量做好工作，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当时，中央苏区面临着国民党越来越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人民生产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奇缺，价格一涨再涨，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生活和红军的给养。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先从健全各级政府机构着手，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同时设立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等。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好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

为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这是以前苏区从来没有举行过的。

毛泽东在《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阐明，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同时，他尖锐地批评指出：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谁要谈到经济建设就被骂为右倾。同时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也没有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只有在和平的安静的环境中才能进行，目前是谈不到的。同志们，这些意见是对的吗？

不对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服从战争，不知道取消经济建设去服从战争，不是服从了战争，而是实际上削弱与影响了战争。

他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把经济建设工作抓起来，动员群众加入到经济战线上来。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之出口卖得高价，同时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苏区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使苏区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苏维埃财政收入，使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确切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他明确提出，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不行的，并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农业发展较快，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是当时苏区经济工作的一项严重任务。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线，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过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等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必需品实行减税；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毛泽东对政权建设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一苏大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手段的国家”。1933年8月9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充分发动群众，要采取切实措施便于选民发表意见，要把选民意见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同一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对选举工作的原则和办法作出详细的规定。

9月6日，为了发动选举运动，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挤死同革命势力

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快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9、10月间达到高潮，11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在乡这一级。为此，毛泽东于11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长338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随后，他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等两篇调查报告，并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又领导开展以反对封建残余势力为目标的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进行的，他们想通过查田运动全面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所以，毛泽东的工作显得特别艰难，既要抵制“左”的土地政策，又要把漏划的真正的地主、富农查出来。

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少地区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土地已得到合理分配；有些地区因为工作比较匆忙，只靠少数人来做，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也没有把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向他们分析清楚，因而在划分阶级成份和分配土地中存在不尽适当的地方；还有少数地区，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政权和群众团体被一些改换面目的封建势力代理人把持，土地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临时中央已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1933年2月1日，毛泽东还在福建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县8月“重新分田”和“查田”，“限2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点好田”。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3月，他就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6月1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特别强调发动并依靠群众的问题：“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份，通过这些成份，没收这些成份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当然，训令中也有不得不说的“富农则分比较坏的劳动份地”等话。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工作是何等的困难。

为了指导查田运动，毛泽东于6月17日到22日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长汀等8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6月下旬，又在叶坪召开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这样，查田运动就开展了起来。

当查田运动在面上推开时，毛泽东十分注意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在新发展区域，中心问题是建立革命政权和没收分配土地；在斗争深入区域，中心问题是改良土地，发展生产；在斗争落后区域，也就是介于上述两种阶段时，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全面展开，取得很大的成绩，土地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革命战争。但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8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特别介绍了瑞金王田区的试点经验；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和行为”。

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纠正和防止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向，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加以公布。前一篇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以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后一篇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还有贫民、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等二十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等。

这两个文件，是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结果，具有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发表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2116家，10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1300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迳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35家，改划为贫农的有4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18家。

毛泽东恢复工作继续挨批，相忍为党，在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左”倾中央许可的范围内，领导中央苏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查田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相当程度地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改善了中央苏区人民的生活，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革命战争。

但是，在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这些成就并非他们“进攻路线”的产物，而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特别使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查田运动，他们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切，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他又一次要大难临头了。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他们，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中华苏维埃二大后，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继续批判、指责毛泽东。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并且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害。”这样，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并升级为追查所谓的“小组织派别活动”矛头对着毛泽东。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连遭厄运，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去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都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讲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逆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尿。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也能找到自我平衡，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经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博古、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糟。他们拒谏饰非，倭

---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过于人，并想把毛泽东以养病为名送莫斯科。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依靠德国人李德（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时，出现了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人闽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既无党政权又无军权的毛泽东，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立党为公，同“左”倾冒险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凡出席会议就发表意见，即使自己意见被否定也不屈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组织上服从，意见上保留”。但是，这一些使博古、李德很难办，战况越来越危急，于是，主张把毛泽东当作有病送苏联休养。

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赴莫斯科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泽东“想到苏联养病”。其实，毛泽东当时没有病，只不过是编一个借口，把他送出国外而已。这要威胁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所以他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安全“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博古、李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不让毛泽东同党中央一道长征。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尤其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打破，这危及到整个中央根据地的安全。心系全党和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再也不能在家里闲着了，于是向党中央提出到南线视察。党中央在同意毛泽东去南线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的同时，立即组织一支监视小分队前往，要他们随时报告毛的活动。

4月下旬，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前往南线，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等前脚去，监视小分队后脚就跟来。他坐冷板凳3个月后又得到一次工作机会，心情还是愉快的。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

“听其言，观其行”。毛泽东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把监视小分队调作他用（后来，分队长受到处分）。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退出筠门岭，正在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该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是何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何道理不能大量消灭敌人？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最后还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红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军事上，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在地方工作上，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在听取干部的情况报告后指出：要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在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那套洋办法，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毛泽东身处南线会昌，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防御。他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6月22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线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南线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同北线接连严重受挫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天清晨，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29页。

更加郁郁葱葱。

何长工和潘汉年 10 月初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初次进行了 3 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6 月下旬，毛泽东从会昌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 5 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从国民党军力配置的全局出发，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向另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而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 6000 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前线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大转移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急如焚，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这正符合博古、李德最后排毛的心意，于是获得了同意。9 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至赣南省委、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这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已决定不带瞿秋白、毛泽覃、何叔衡走，也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这大概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不该断送在王明、博古、李德这班人的手上吧！

## 毛泽东纠正王明错误路线革命转危为安

中央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是秘密进行的。毛泽东在于都，按周恩来长途电话要求，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于9月20日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在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这份电报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也或许是这份电报，促使中央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考虑对共产国际有个交代，才决定毛泽东随工农红军转移。

### 争取政治局多数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了这个信息。毛泽东立即向最高“三人团”提出，要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战略转移，并得到了批准，但是，其他政治局委员仍被分散到各军团去指导工作。如果毛泽东不争取到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那末，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挽救党和红军危机要困难得多。这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前的一个小胜利，为以后一步一步战胜博古、李德的错误提供了前提。

正因为红军战略大转移是秘密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尽管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0月21日夜，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里较顺利地通过，与粤军陈济棠达成“可借路”的协议不无关系，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中旬，中央红军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即部署重兵“追剿”和堵截，妄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招来了严重后果。

中革军委于11月25日下发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的命令，这就是国民党军重兵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了渡

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尽管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灭，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倭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10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直接出面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接着，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在这个时候，指战员开始思考问题，这惨重损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的《回顾长征》写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毛泽东见到红军损失过半的惨景和指战员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末红军将会被他们搞个精光的。于是，他决定公开出来提意见，纠正领导错误。他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因为，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报告过王明、共产国际的，所以博古、李德是非坚持不可的。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就准备同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了。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拨正红军的战略方向，经历了三个回合的角逐。也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战略转变前的三次预备会议。

第一回合，通道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争。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3、4道防堵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阵里钻。

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此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六神无主，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准备开会讨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意见后，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从红军电台截获敌台军令电报中掌握敌军部署，判明已经知道红军主力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从搜集的敌伪报纸中得知黔军“有派别”，是“双枪兵”（钢枪和鸦片烟枪），无战斗力。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

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追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在会上，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并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认为进贵州仍可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未固执己见，李德因自己意见被否定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李德看到这份电报时，怒气冲冲，向周恩来质问。周恩来很有礼貌地严肃地回答他：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有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但是，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属于少数，所以在14日中革军委指示又说：“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可见，红军继续西进与北上湘西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红军主力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发烧未参加会，但把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来工作。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因自己的建议又被否决，很不冷静，大为恼火，粗暴地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许多质问。在党内以涵养好著称的周恩来，已忍无可忍，用英语严厉地批评了他。两个人都用英语吵了起来。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着。”博古比较冷静，尽管自己意见被黎平会议所否定，但他还是服从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当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由此看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已开始分化。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讲过：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作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在党中央有了发言权，那些因执行他的路线而被挨整的人逐渐获得解放和起用，如被指责为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头头的邓小平就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且，对主力红军组织作调整，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起用被博古、李德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怕承，调回总部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将在红八军团任党代表的陈云调回任军委纵队政委；撤消红八军团番号，人员并入红五军团。这样，加强了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的领导。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挥戈西指，赢得了主动，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的部署，而且连战皆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 1937 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第三个回合，猴场会议实际否定了李德军事指挥权。

12 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现名草场）。军事顾问李德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军迫击的两、三个师。他在《中国纪事》中还异想天开地说到：“蒋介石的两、三个师，估计是周（浑元）的军队，急速行军从湖南边界向乌江推进，显然是打算在我们渡江时进行袭击。本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袭击并消灭这两个师，因为敌人必须从对岸渡过乌江，而我们可以江岸这边伺机行动。我认为，我有义务提出适当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却根本不愿听取。

---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第 64 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7 月版，第 17 页。

在这种时刻打了胜仗，好像是会破坏他的计划似的。”实际上，此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取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那么中央主力红军就渡不过乌江了，结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在猴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重申在黎平会议上阐明的红军应去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行动的正常秩序了。

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写道：“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主席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毛泽东认为，黎平、猴场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太大震动，王稼祥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很好，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1935年元月2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在瓮安县江界河架起浮桥，强渡乌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等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 遵义会议确立 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民党黔军必守之地。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各军团奉命分别进占以遵义，为中心的周围地区。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442页。

《红旗飘飘》第8期。

耿飏《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红二师进攻遵义。他针对黔军尚不知红军过乌江的实际情况，改强攻为智取，指挥红二师打垮守遵义城的黔军三个团。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侦察的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的报告，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休整和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提供了条件。

通过中央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毛泽东逐步地团结了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独立自主地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进遵义城，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一起讨论问题，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议是黎平、猴场会议的继续和扩大，不可避免地有一场激烈争论，会前开展了活动，以争取支持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他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即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

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凯丰在会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他自己教条主义思维逻辑，来武断地指责毛泽东照书本打仗。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3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

- (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 (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 (三) 常委中再行适当的分工。
- (四)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

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照会议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同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迫害的刘少奇，找博古谈话，要他接受同志们批评，承认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权力。博古此时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顶着不交权。凯丰还找人开会，说遵义会议是“宗派会议，宗派报复”，要博古不交权。当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就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军事也不成。他一面不交权，一面还要等着瞧。

遵照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再行分工。在酝酿过程中，周恩来认为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理所当然应归毛泽东领导；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常委会分工决定，

---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89页。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由洛甫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接着，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周恩来担任组长。

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政治路线问题暂缓解决，且在决议中还写着它“是正确的”。这并不等于说新的党中央仍要执行王明“左”的政治路线，并不等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没有开始。事实上，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就开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筹款扩军，建立苏维埃组织——革命委员会。并且根据新区特点，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纠正了以往的过“左”政策：在城市，仅仅没收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保护中小工商业，不乱派捐款；在农村，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分配浮财，而对富农则不动；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对少数民族头领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正确的，使得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就是说，遵义会议随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端正，正确的政治路线也随之开始了。如果说党中央的思想路线正确，而政治路线错误，那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也只有新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是正确的，才可能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重围，才可能克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才可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开始，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他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彻底纠正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如博古虽然不负党中央的总责，但仍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稍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领导职务；如凯丰，仍然担任原职，让他在工作实际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对那些被“左”倾宗派主义诬为“毛派”、受打击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安排工作。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为“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毛泽东同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各军团、军委纵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全军一片欢腾，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和欢呼。遵义会议像春天阳光一样，给红军带来了勃勃生机。朱德曾为此情此景赋诗纪念：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 长征胜利，开始批判王明错误路线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可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全党推行后，一直坐在苏联莫斯科遥控指挥博古等人的王明，对中共中央的遵义会议怀有刻骨的仇恨。他竭尽造谣、攻击、诽谤之能事，说“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还在臭名昭著的《中共五十年》中振振有词地写道：“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制订的这条红军西征的政治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那条政治和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正是这种情况，使红一、三、五军团遭受了可以避免的沉重损失。”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不仅为革命事实所击破，而且中共中央早已作出了正确结论：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法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 突破敌军重围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 40 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 3.5 万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严重关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一道，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这惊涛骇浪中杀出了一条生路，把革命引向胜利。

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 1 月 19 日开始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 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 27 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由于侦察有误、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只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在 28 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总部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 月 29 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但川军潘文华部 36 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这一带。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导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

区。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红军总部决定突然调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战役大捷，震惊了敌人营垒。黔军头子王家烈，因损失惨重痛心至极，向蒋介石负荆请罪。蒋介石暴跳如雷，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一方面乘机将王家烈拉下马，一方面写信给吴奇伟，勉励他“雪遵义失败之耻”，提醒他“对飘忽无定之共军作战要慎重”。

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各路军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这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中央红军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于3月16日至17日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赤水河西岸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中央军、川滇黔各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川滇黔各军大举向西的目的后，毛泽东和红军总部决定主力红军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秘密返回贵州。此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3月21日晚至22日晨，红军主力秘密、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他们随即挥师南下，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

“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被动状态，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实行大范围的迂回，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这是毛泽东一生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

红军主力继续大踏步南下，前锋直逼贵阳，弄得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心惊肉跳。红军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

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在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发生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4月28日，先遣侦察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人说，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滇，则有龙云献地图。毛泽东知道缴获地图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红军总部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龙云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抢渡金沙江。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是红军过江后的第7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中央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也使蒋介石的“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的电令付之东流。

红军继续北上，到达大渡河畔。此时，蒋介石又从贵阳飞抵昆明，急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绝壁。红军在此没有回旋余地，兵力无法展开，极易被敌军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17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但此处架桥极不容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5月2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经分析研究后决定，红军立刻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170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敌军，占领了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红军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这时，中共中央派出政治局常委陈云经上海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情况，并争取领导。

---

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8页。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3、186页。

接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一道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翻过了大雪山、通过了大草地，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

以上铁铮铮的事实，无情地驳倒了王明前面的诬蔑和以下的歪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党中央到陕北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展开。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革命的策略也必须跟着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党对日本进攻华北以来的国内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领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首先，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传达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战略报告和结论。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几年来经验和最近共产国际对我们指示的结合。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报告；张浩指出：“泽东同志将几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在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参加抗日问题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引经据典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而教条主义这一套很迷惑人，还有相当市场，少许人在理论上还是佩服他的。这涉及到政治和思想路线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了“中间势力是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马列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驳得博古哑口无言，坐不住了，在炕上一躺，不说话了。毛泽东在讨论中还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会议经过

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

会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一方面为了进一步解决瓦窑堡会议上的思想分歧，另一方面更为纠正长期存在党内而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这篇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是党的工作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的重要文献。报告强调指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总的特点是动摇，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的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报告提出尖锐的批评：“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总结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且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了瓦窑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时并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会后他搜集了一些所谓的“材料”，于1936年1月27日向中共中央书面提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即“对战略的意见书”。它分析敌我力量悬殊后提出，“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认为红军“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顽固坚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单纯防御路线，反对瓦窑堡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连续开会讨论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与会同志都明确表态，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并批评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会议批评指出：李德不分析具体情况，只有防御，否认进攻和反攻，完全是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他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的继续，并且在新形势下还有些发展，表现为进攻中的右倾保守主义。说明他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接受遵义会议决议对他的批评。我们在战略进攻时，他提出这种单纯防御战略具有更大

的危害性，要严肃对待。晋西会议决定：战略问题由毛泽东起草。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西征、统一战线和陕北苏区工作的同时，按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认真准备写“战略问题”（即后来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回敬这位洋顾问的挑战，他搜集《战役问题》、《战斗条令》等书籍，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军事战略这类书。他在写这本书时，不仅研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著作，而且研究资产阶级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还研究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等等。他还组织萧劲光、莫文骅等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讨论理论问题，以开阔思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莫文骅回忆道：

《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通过讨论、研究，他把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上升为理论，12月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这既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位洋顾问的挑战，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所以，它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一著作除阐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外，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着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党内军事问题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作了理论准备。

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战争的开始阶段，一般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

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书中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本书既是一部军事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又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如果说在1935年12月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明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那末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话，则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然而，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是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的，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批判。这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客观要求。“两论”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以提高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它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它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矛盾论》也是为了克服党内长期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它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它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矛盾论》在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认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

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失败的。

《实践论》和《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证了我们的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这对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针对王明教条主义者对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提出新的挑战，同时要回答他们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从事大量的思想理论工作，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些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剖析了主观主义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其思想根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战略与策略。这些，都为全党全军干部进入抗日战争新时期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 独立自主与“一切经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王明带着“尚方宝剑”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实行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一切经过”，就是说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纳入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反对放手发动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这是抗战初期，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一场严肃斗争，也关系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与命运。

### 力排王明右倾投降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路线、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争论。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党内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右倾迁就主义。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是否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只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方针。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 11 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转变军事战略。这为实现党对抗战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感召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和一二九师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9 月 25 日，一一五师首战晋东北平型关，歼灭日军坂垣师团 1000 多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仗。它打破了日本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乱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部署，树立和巩固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10 月 19 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毁坏敌机二十余架，歼敌百余人。为了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友军忻口战场，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又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后进入晋西北管涔山区发动群众，首先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着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后又不断发展联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以上这些事实已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937 年 11 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 8 月 10 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担心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王明在共产国际 6 年，同季米特洛夫朝夕相处，关系非同一般。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唯一儿子已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很喜欢王明夫妇在莫斯科生的大女儿王芳妮，常常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王明夫妇 1937 年 11 月回国，就把王芳妮留给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季米特洛夫针对王明“要权”“争权”的特点，非常诚恳地提醒他，要注意不要回去“争权”。在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季米特洛夫还特意约见王明、王稼祥（由延安赴莫斯科治病的）等。关于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王稼祥 1941 年 10 月 8 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到：“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

---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81 页。

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曾任任弼时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的秘书师哲，他的回忆文章写道，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共产国际虽然此时已经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共产国际七大把毛泽东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但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很担心。共产国际这种担心是不切合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的，他们举荐的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也并非成功的经验。那末，共产国际这些意图王明是如何理解的呢？请看王明回国后同王稼祥的一次对话。王明说：“对于国内的斗争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的局面很好嘛！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革命的力量。蒋介石能够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大好事，只要他愿意合作抗日，我们就可以听他的。”王稼祥知道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拙劣表现，并反问他：“你以为蒋介石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合作和积极抗日吗？我们党能全听他的吗？”王明甚至说：“我说过了，只要他抗日，我们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多么真诚的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呀！

可是，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李德看来，王明在到延安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按张国焘的说法是：“王明当时严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到达延安才10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举行6天会议。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

---

徐则诒《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师哲《我们党的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载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第363页。

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毛泽东在七大时总结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规定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任务和议程，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和秘书处成员。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因蒋介石急于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会后即去武汉，但应很快回中央（延安）工作。

追求牡丹之所为的王明，历来害怕环境艰苦，蒋介石邀他去武汉大城市是求之不得的。王明在延安只住10天，就去武汉了。由于王明会后立刻去武汉，只担负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的整个工作仍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之下，所以，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而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逐渐被广大的党员干部所接受。

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1）1937年12月25日，长江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未经中央审查批准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在组织上是不妥当的；1938年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3月24日擅自送交国民党。（2）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后应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蒋介石留他“在汉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汉；1938年2月他回延安后，毛泽东在2月27日到3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执意重返武汉，会议虽然同意他同凯丰去武汉，但明确指出“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去后未执行这一决定；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重要文献，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同年夏，他写了一首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错误”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还特别加注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套，在当时人们都是知道的，甚至连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是长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王明在武汉时仍然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根本不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看在眼里，搞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的错误，一度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人民革命力量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壮大，并导致了1941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 六中全会的会址和政治报告之争

会址之争，就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还是在武汉开的问题。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请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情况。中央政治局采纳王明的提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任弼时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知道较多的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他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此外，又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他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援，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9月上旬，王稼祥一回到延安，就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由苏联带回来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毛泽东，然后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等商定，由王稼祥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及时地电告仍在武汉的王明等。这时，长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已经回到延安。同时，王明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于是，他预感到共产国际新指示由王稼祥传达，可能传达不准确，于己不利。

王明左思右想，想出一计，马上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都到武汉去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他借口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王明想把中共中央全会拉到他所在的武汉国统区来开，一是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是想进一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任和积极投靠。

王明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断然拒绝。毛泽东见到王稼祥时，指着王明的电报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又给自己的安徽同乡和留苏同学王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去，与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先行单独商谈传达国际指示的问题。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写的《黎明与晚霞》一书说：王稼祥收到这份电报，一眼就看穿王明的鬼主意，他想先知道指示内容，后下决心对策。他立刻快马加鞭赶到了杨家岭，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报告道：“泽东同志，我特地送份电报给你看看，是王明从武汉专门给我拍来的，他简直异想天开！”毛泽东看完电报后，问王稼祥：“你对此如何打算？”王稼祥干脆地说：“不去，当然不去！不仅不去，还要批评他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黎明与晚霞》继续写道：“毛主席点点头说：‘对，很对！不过你准备如何答复他呢？’稼祥说：‘我准备回他个电报，让他立刻赶到延安来，电文也拟好了，请看行不行？’毛泽东接过一看道：‘好，我同意，马上发出，催他快回。’当天，王明收到稼祥给他的很不客气的复电，电文是：‘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中央的通知，稼祥的催电，已无法抗拒了。

王明两计不成，又生出第三计。他回电中共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一般来说，会议的政治报告谁作，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也很会来事，非力争不可。这也充分暴露了王明极高的权力欲望。党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党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党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强地来延安。

就在王明答应从西安来延安后，于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王稼祥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当时写的《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 六中全会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9月15日，王明等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欢迎，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

中央政治局再次在延安举行会议，听取王明准备的政治报告稿。

他的报告内容与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为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等。但是，这个报告继续坚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主张：如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传军队要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指挥；虽不贬低游击战，但仍突出强调运动战等。会议认为王明的政治报告结合实际不够，请毛泽东也写个报告提纲。

9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就报告提纲发言，讲了5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与会多数人认为，提纲比较符合抗战实际，既有经验教训，又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9月26日到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是极为重要的，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手画脚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进行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报告5万字，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

---

《王稼祥选集》第138、141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王明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他临时要求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并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另一方面，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工作方法和方式。”

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针对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在作结论中还讲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他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11月6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鉴于武汉已经失守，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

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随后，他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 1938 年 4 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特别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但是，王明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同对遵义会议一样，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因为，按他的逻辑来想：自己本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主要负责人，到共产国际后竭力宣传中国红军和根据地的胜利（注：扩大事实，虚报数字，直至回国前当着斯大林面还说，中国红军到陕北还有 30 万），扩大了影响，不仅成为共产国际执委，而且成了执委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次奉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六届六中全会理所当然地要恢复他的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位置，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政治报告捞不到作，反而还被批评为右倾投降主义。在他看来，这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不是在批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吗？所以，他对六届六中全会不满，在这年年底，在延安作了一首《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的诗，诗中写道：“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这是他反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诬蔑毛泽东、坚持错误的真实写照。可见，他在六中全会讲的所谓“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只是一种谎言而已。由此看来，王明开始耍两面派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从全局考虑和有利于工作着想，不调整中央政治局，仍以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争权夺利的王明之流比较，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从此时起，王明这棵赫赫

有名的牡丹花，也将开始凋零了。

## 耐心等待与王明反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共产党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但是，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继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具体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说毛泽东的好话；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且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很多报告和文章中，一反傲慢、自大的前态，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尤其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

受惨重损失，除 2000 人突围外，其余 7000 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 1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 1941 年 1 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于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领导整风与反扑挨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从 1939 年 2 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开始，学习运动逐步开展起来。1940 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 7 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办法，学习运动开展了

起来。但是，学习中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就在 1940 年春，王明趁大家学习理论、学习党的历史之机，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发行全党。在 3 月 19 日为此书写的“三版序言”中还特别说：“本书所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并且还用心良苦地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王明出版这个书的目的在于，想把所谓的“昨日之是”为“今日之非”辩护。其实，这本书并非昨日之是，而是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标本。他选在全党学习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重新出版这本书，不但说明他仍然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还在坚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企图以他的错误观点影响更多的人，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这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挑战。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就是作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王明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指出：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送给王明这号人一副对联，给予画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个报告，在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反响。

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动员后，整风的条件已经成熟。整风，是先从中央领导层开始。1941 年 9 月 10 日、11 日、12 日、29 日和 10 月 22 日，连续五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就拉开了中央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帷幕。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的还有李富春等，会议记录有胡乔木等。毛泽东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公开交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毛主席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毛主席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主席在报告的最后还宣读了稼祥同志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十六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毛主席的报告和稼祥同志拟的研究题目，为这次会议，也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检讨。博古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

个路线上来检讨。

在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尽管两次发言，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 1932—1935 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最主要是博古负责，与己无关。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 20 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唯独未说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以此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王明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集中批评。这次会议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共识：1.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2.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3. 王明到苏联的后期，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后的中央有些不同看法，但在形势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遥控领导给予很大支持；4. 抗日战争前期，王明在负责长江局工作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

为了帮助王明认识自己的错误，10 月 7 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不承认有错误，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扑。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 年 12 月会议前和 1938 年 10 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同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他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先介绍了 7 日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提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又鉴于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

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书记处会议后，他们准备3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最后概括地指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新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秦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但是，王明突然声称有病，逃避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原定会议未能开成。以后，他一直请病假不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

## 仁至义尽与死不悔改

在 1941 年中央政治局 9 月、10 月会议期间，党中央又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又在更大范围展开了。1942 年春党中央、毛泽东把整风运动向全党推开，继续帮助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期望他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共同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在组织上不断地给予适当安排，在生活上尽当时之可能给予照顾，以致做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可是，王明拒不承认错误，极力斥责整风运动，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曾一度承认过错误，但很快又继续坚持错误，直至最后躲在莫斯科改名为马马维奇，写文章、著书、作诗，诽谤、咒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成了中华民族的死不悔改的败类，遗臭万年。

## 诚恳帮助与坚持错误

毛泽东为把整风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于 1942 年 2 月 1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都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报告说：“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关于宗派主义，报告说：“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报告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2 月 8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特别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打倒党八股，就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没有藏身之地。演说列举党八股的 8 大罪状：第一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装腔作势，藉以吓人”；第三条，“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第五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六条，“不負責任，到处害人”；第七条，“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演说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全党的普遍的整风运动的开始。

王明生病，虽然住在延安中央医院，但政治嗅觉很灵。2 月他写了一首

口语体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诽谤整风运动和毛泽东，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

王明在诗后加注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同月16日，写了一首旨在抵制整风运动的诗，题为《忆牡丹》七绝，诗曰：

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侔。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在我们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之际，王明迅即作了这首咏牡丹的诗，以歌颂牡丹的“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谄不低头”的气节为名，行抒发他对抗整风运动之实。

王明在这个时候作《忆牡丹》，还有深层次的含义。本编开头已经讲到，他遵照母亲的嘱咐学牡丹之所为，开始了他的人生追求。纵观他走过来的前半生，的确很像牡丹的性格及特点：生长庭园之中，刚长出一根枝条，马上就要向人显示；一件好事未做完，立刻想当众大吹大擂；招引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缺乏慎言多思的修养，大有轻浮喧嚣之气。像美女自己欣赏自己，简直不知羞耻。即使外表显得强大，实际是外强中干。名利还未受到毁坏时，贪欲日益强烈……牡丹虽是花中之王，但它只开花不结果，从事业上说断无成就，他母亲教他不学芍药而学牡丹，是要学牡丹有骨气，家穷志不短，不向阔少爷们低头，将来好有出息。但王明对抗整风运动的“雍容傲骨”，是违背母意的，“不低头”表示坚持错误到底的决心，也是违背母意的。

延安整风运动，没有因为王明等人反对而停下来，而是相当扎实地开展了起来。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由于王明拒不承认错误，对抗整风运动，自此以后王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的成员。

###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与王明出尔反尔

在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这为党中央、毛泽东

独立自主地清算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作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于9月上旬到10月上旬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认为错误的实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概括了错误的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而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

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报告了时局与学习问题，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指出：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这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严厉地批评了王明宗派，指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1937年12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9月会议，提到抗战初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讲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发言后，由博古、洛甫等又作检查和总结提高，进一步揭发批评了王明的错误。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由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会也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你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你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由孟庆树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信最后表示：“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学习 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 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指示写道：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他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示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受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

从1944年5月21日起，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期历时11个月。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在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正在家里养病。党中央、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对王明的继续挽救，在组织最好医生给王明精心治

疗的同时，也经常派人做王明的工作，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历史决议》草案三次都送给王明看了。王明自己也说：“在4月初，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就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我看了，他两次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来和我谈话，他自己来过一次，他们都建议我写一个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承认要‘交代自己的错误’。”

王明在1945年4月20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一天，给任弼时写了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王明在信中表示：“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身份，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认识并不全面，检查并不深刻，但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基本符合的。而且，王明当时能够向党中央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和服从“历史决议”，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的胜利召开，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问题上，一些代表提出意见：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如王明、博古等我们就不选。毛泽东出面做工作，阐述了选举方针。他说：这是一种好的愿望和理想，也是有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他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正反两面经验，认为中共六大不选陈独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都是不成功的。他提出：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大会根据毛泽东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细致工作和耐心说服下，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认识错误较好的博古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是，王明在后来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攻击说：“臭名昭著的中共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那么，王明当时又为什么声明服从中央的决定呢？说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为了“保留党的真相和反毛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铁铮铮的历史事实证明，“伪造”历史的并非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非是毛泽东，而恰恰是臭名昭著的《中共五十年》，恰恰是王明自己。

## 仁至义尽与死不悔改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了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王明对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赞成，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要作深刻的检查。毛泽东等表示欢迎，除在中共七大上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外，会后还安排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研究党的政策，起草法律条文等工作。但是，王明给中共中央的信，只是一种表示而已，事实上并没有再写深刻的检查交给党中央。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王明出席七届二中全会，作了两次发言，从八个方面歌颂了毛泽东报告，同时，也作了一些肤浅的检讨，他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对毛发过脾气”；“我的确想当大王，逻辑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但心里并不那样想”，“我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许我当总书记”。在大家批评、帮助下，王明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中共中央深知王明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要他写一个关于历史错误的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他在会上口头上表示同意。会后第三天下午5时，毛泽东还亲自到王明家里诚恳地帮助他，劝他写好声明书，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把洛甫等人的认识材料提供给他作为参考。3月23日，党中央、毛泽东又派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再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从速写好声明书交与党中央。

可是，王明后来对党中央要他写声明书的决定一直采取拖延态度，最后否认二中全会上曾有这一决定，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耐心帮助加以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王明历史上犯过两次严重错误，而且对自己错误缺乏深刻认识，态度不端正，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他分配到政法战线的重要岗位上，安排很多的职务，期望他能够在政法战线上发挥作用，改正错误，为党和人民作出新贡献。

王明建国后虽然在政治法律战线上开始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对于过去的错误他却一直拒绝做进一步的检查，对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一声明的决定，一直拒不执行。这样，党中央和毛泽东必须采取新的办法来帮助他了。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又一次找王明谈话，批评他不尊重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拖延不写声明是不对的，催促他尽快写好声明交政治局审阅。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事项中第92页决定，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11月1日，中央办公厅把政治局决定通知了王明。

在这种情况下，11月6日，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说“现遵示声明如下”：“1.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我于1945年4月20日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历史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2.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王明想以给毛泽东的信来代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责成他写的声明书，并且给中央信中这种即使“有些意见”也“接受和服从”的态度，带有明显的抵抗情绪。

在这种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是不让步的。原则问题只有原则对待。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我国大政方针的同时，也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1950年6月9日通过），其中说：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犯错误问题，已在1945年4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他对于抗日时期的错误问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表明：王明出尔反尔、坚持错误已发展到难以容许的地步，成为党内分清路线是非的重大原则问题。他不执行中央全会决定，不写声明书，拒绝反省，为党纪所难容。尽管如此，党中央、毛泽东既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又没有给予任何组织处分，仍是对他进行诚恳的帮助。这完全是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已经达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

王明生病后，于8月17日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1.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理论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请示究竟要我在好多时间以内写成声明书？以便我将来计划支配时间。（但害病期间，请除外，如目前，照医生意见，至少还需半个月时间左右，才可能开始工作，因肠肿未消。）2.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要请人查出来还我，以便研究。其他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由于疏散时送到

---

转引自《王明评传》第456页。

转引自《王明评传》第457页。

瓦窑堡都遗失了，如中央存有，均请允准借我一用。”

毛泽东 18 日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 11 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杨尚昆及时地让孟庆树代转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通知了王明。王明的信强调写声明“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而毛泽东的指示则明确指出应在“11 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可谓“针锋相对”。

可是，王明所说的检讨错误及写声明书，并不是真心的，只不过是搪塞、拖延时间而已。在毛泽东批示以后，他没有检查、写声明书，而是在 9 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中央仍然同意他去苏联治病，通过电报先安排的。于是，他于 10 月 25 日动身到苏联去了。

以上事实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拒不认错写声明书抱有极大的耐心，而且为他的检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王明在后来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却写道：“我坚决拒绝写骂三方人士的交代材料后，毛泽东又搞了一些新的阴谋来反对我。例如，1949 年 10 月 26 日，他要求中央政治局把‘第九点’（关于王明的问题）列入政治局决议，而 1950 年在他请求下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这两个决定的基本思想都是要求王明写声明书，声明他承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所谓‘王明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事实上二中全会并没有通过要求我写这种声明书的决定。”“其实，中央大多数同志都知道，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是党内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的代表，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这两个时期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并且犯了许多原则性错误。因此，尽管中央政治局和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通过的，而且与事实和历史真相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继续坚持事实真相，驳斥种种捏造，不写声明书。”

王明于 1953 年 12 月 9 日，在苏联病情好转后回到北京。1954 年 4 月，他因病再度住进北京医院。党中央和毛泽东关心他的病情，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到医院和家中看望。10 月 4 日，王明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刘少奇写信，说明因病不能参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1956 年 1 月 30 日，王明再次赴苏治病，从此再没有回国。王明在苏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他们工资换成卢布每月都寄往苏联，对他们双方父母 4 位老人，国家都帮助，还送往苏联团聚，并每月给相当的补贴，生活还是可以的。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北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党中央曾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9 月 8 日，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虽然，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会议，在他身体好转后也没有向党中央写出声明书，但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错了的人共同工作的原则，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王明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

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成份，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中共八大选举结果，王明虽仍然当选中央委员，但在中央委员中得票是最少的。党的八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给他留下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为党工作的机会。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分别在两个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上签了字。毛泽东在苏期间，关心王明的养病情况，特意派代表团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和黄树则前去看望王明。

后来，王明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回国工作了。但王明却不想回国工作。党中央为照顾他，也没有催他回国，继续供给他全家生活上的一切费用。谁能想到，几年后王明却把党和毛泽东对他的关怀与帮助置于脑后，竟公开攻击曾经哺育他成长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不断关心和帮助他的毛泽东。

